

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阿多尼斯

○[以色列]阿里耶赫·西万/著

○戴惠坤/肖黛/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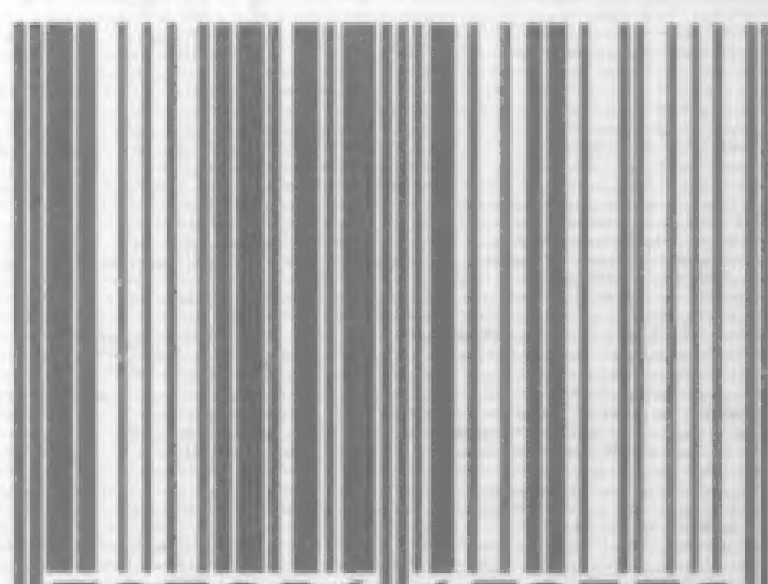
Y I S E L I E W E N X U E

以色列文学丛书

阿多尼斯



ISBN 7-80647-237-1



9 787806 472378 >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阿多尼斯

○[以色列]阿里耶赫·西万 / 著

○戴惠坤 / 肖黛 / 译



新平社
PD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多尼斯/[以色列]阿里耶赫·西万著;戴惠坤,肖黛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7-1

I. 阿… II. ①阿…②戴…③肖…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34 号

(本书原著版权归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有)

书 名:阿多尼斯

作 者:[以色列]阿里耶赫·西万 著
戴惠坤 肖黛 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75

字 数:15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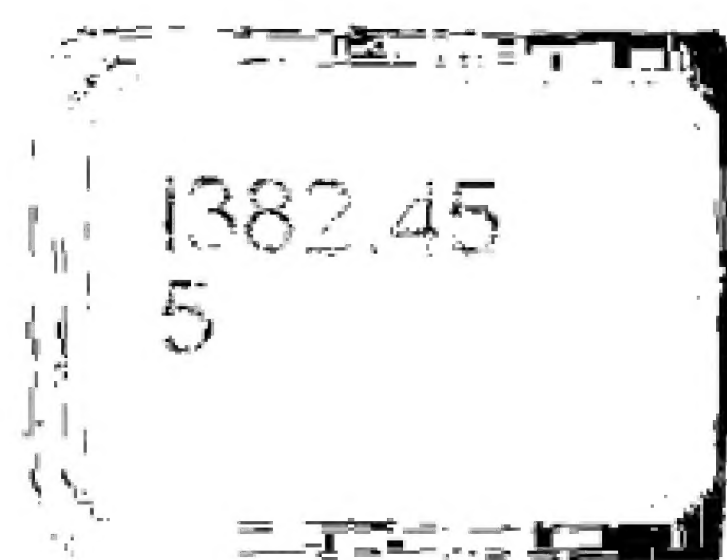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00 元

ISBN 7-80647-237-1/I·16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 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1982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年7月30日于北京新华园

引子

1991年2月12日，我在海湾战争爆发后首次来到特拉维夫。早晨的天空阴云密布，可是，我想是不会下雨的。我驱车穿过拉马特甘镇，沿着阿巴希勒尔大街前行，去比亚利克大街附近察看伊拉克导弹轰炸后留下的瓦砾。从那里，我又转向西行，向什卢穆哈迈莱什大街驶去。在这条大街的阿尔罗佐洛夫大道和本－古里安大道之间，我经常停车。这次，停好车，我就背上装着防毒面具和防化学战用具的纸盒出发了。上路之后我才发现，我本来是可以把车停在离迪津戈夫大街更近一点的地方。在这条林荫道上和道旁的胡同里，停放的一排排汽车之间还有许多空地方。

这天是星期二。可是，让人感到好像是星期六的早上。街上行人稀少。行人中，有的戴着防毒面具，有的没有戴。不少商店关着门。一眼望去，迪津戈夫大街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公共汽车在南北行驶，好像任凭什么都拦阻不住。这就提醒我，这还是个普通工作日。但是，公共汽车上也是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乘客。有的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

犹太国民基金大道过去通称本－古里安大道。走在这条大道上，我不由回想起三十年代中叶。当时，我们搬进迪津戈夫大街一百八十五号那座新楼房。我所在的幼儿园就在这条大道开始的地方，在从雅康大街数起的第二所房子里。

关于幼儿园,我所记得的惟一的事情就是那些节日:植树节、普珥节、哈努卡节、初熟果子节。^①我之所以记得这些,也许是因为我将它们用照片记录下来了,而这些照片至今还保存着。我现在实际要做的事,也许就是根据这些照片来重现当年的情况。

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的是一次庆祝活动的情况。庆祝活动的确切日期我已经忘却,但肯定是在冬季。照片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柑橘丰收。照片上有用彩纸做成的柑橘树,有用皱纹纸做的装饰性链条。现在也许不再使用这种纸了。从代表叶子的彩纸中,露出一些圆球,那是橘子。前面站着几个穿长袜的孩子。有点像骆驼脑袋那样的东西顶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在装扮成从柑橘林向海港运输橘子的骆驼。

这张照片现在已变成灰褐色。但是,我记得当时的真实颜色:纸做的叶子是绿色的,球状的橘子是橙色的。我也记得,我被指定扮作一棵树,而我争着要当骆驼。我已不记得这场争斗是怎么了结的。我只能猜我为什么愿意当骆驼,而不愿意当树。

另一张照片是在普珥节拍摄的。幼儿园的孩子们排成两排,一排站着,一排坐着。我在后排,头上戴着一顶带尖型的小丑帽子。我记得,当时,幼儿园的老师和她的助手极力撺掇我穿戴得像样一点,但我坚决不从。在我整个幼年时期,我一点也不喜欢化装的服饰,也不喜欢伪装的服饰。许多年之后,我还是那样。直到我的第二本诗集《四十张面孔》出版时才有所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在那漫长的假期里,我每天都在这条林荫大道上漫步,从我们家一直走到海边。那时,在迪津戈夫大街和本-耶胡达大街之间,已经耸立起一些高层楼房。但是,在本-耶胡达大街西边,大部分建筑物仍然是作为工人住宅的

矮小房舍。在那些桤柳树下，母亲们领着婴儿学步，老头儿和老太太坐在长凳上。战前经常坐在那里的失业者，已经离开了。没有参加英国军队的人，都到工厂里去做工。这时，开办了许多工厂，供应国王陛下武装部队的需求。有一次，在我路过的时候，鲍拉·本－古里安出现在她家的窗前，把我叫住。她掏出两个皮阿斯特，叫我去附近的文具店给她买一本厚笔记本。

我总是走到非法移民船的残骸附近就向左转，一直走到公共浴室和泰尔射击场。射击场是一个很大的棚屋。棚屋的主人有时让我们这些孩子走进去，让我们用那些小小的铁球打向靶子，不收一分钱。我还经常走进对面的救生小屋去游泳，一直游到远海。在那里，我躺在水面上，漂浮一会儿，然后再游回海滩。我边游边奋力捕捉转瞬即逝的浪花。

回家时，我走的是完全一样的路线。有时，我打着赤脚，人行道路面烫脚板，我就绕到桤柳树荫下去走。大约一点半钟，我就停在迪津戈夫大街拐弯处的赫舍勒报亭前。我不是要买东西，而是从放在柜台后边的那台收音机里收听新闻。我在跟踪这场战争的进程。战争的进程反映在“耶路撒冷之声”电台广播的官方声明中。

当时，我们家没有收音机。后来，在战争接近胜利时，我们才有了一台。那时，我已经学会英文，我主要是通过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学会的，而且能听懂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②我的父母讲俄语，他们每天晚上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每当听到苏联红军在反攻中攻克的城镇的名字时，他们就欢欣鼓舞。“他们是些混蛋，”父亲曾对我说，“斯大林杀了许多人，但他们却拯救了世界。希特勒的计划是征服高加索，进而派兵入侵近东。斯大林格勒一战拯救了我们。”

在那些年月,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特拉维夫似乎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空寂。我也注意到,桤柳树看上去很矮小,另有一行完全不同的树栽种在其间。我还注意到,那里只剩下两座平房,一座是本-古里安的住宅,另一座的墙面上涂着粉红色拉毛水泥。^③

阿塔里姆广场,比过去的穆斯林公墓还显得安静而无生机。在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我发现一个敞开着的手提箱,一个很厚的硬皮笔记本从箱子里露出来。我最初的反应是当即停下脚步。这毫无疑问是受了电视里反复强调的要警惕可疑物的影响。一时间,我甚至都想去叫警察。但是,好奇心战胜了小心谨慎。我摘下防毒面具放在地上,低头去看那个手提箱。那是一个旧的硬纸板箱,上面的金属钩子已经锈蚀。

除笔记本之外,手提箱里还装着其他东西,都和书写有关:一个干墨水瓶,一个吸墨用具,还有一些曾用于簿记的长条纸。这些纸上没有字,经过漫长的岁月还没有变黄。而笔记本上却写得满满的都是字。

我不知道,这个被遗弃的手提箱同当前的紧急状态是否有关。是否有人在为防备化学战而封闭一个旧储藏室时碰见它,就把它扔出来了?或者,某人决定清除家中过多的易燃物时把它扔掉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防当局曾经发布过清除所有易燃物的命令。1940年夏天,特拉维夫遭到轰炸。当时,意大利的一个战斗机中队突然从海上猛扑过来,轰炸门德勒大街和勃格拉绍夫大街之间这条轴线,造成人员死亡和建筑物破坏。此后,人们就开始认真对待民防当局那些警告了。也许,对面楼房里某个公寓中住着一位老人,飞毛腿导弹爆炸的轰隆声使他想起了许久以前的那次空袭。^④

按原来的计划,我本想到南边去兜风,走到这条大街的尽头,再经本－耶胡达大街和迪津戈夫大街返回。但是,这个被遗弃的手提箱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拿起笔记本,回到停车的地方,驱车向拉马特－哈沙伦开去,回家了。

笔记本上写的那些字至今也许已经几十年了,但一页页、一行行浏览起来,我并不觉得困难。墨迹虽已退色,但字迹清晰可辨。那是练习书法的人写的,或者说出自人们常说的一位“高手”。我用打字机把它们逐字逐句打下来。我发现,笔记本上写的是不同层次的语言的奇异混合物,具有当时日常希伯来语的用法特点,而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非常见。最后,令人不免半信半疑而又充满希望的是,我不能肯定这个笔记本上写的东西全部是原文;但我希望,那些读完本书的读者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认为值得将这部手稿出版。

以下是手稿的全部内容。

1931年,新年的第五天,但愿这是个好日子。这一天,生活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要选举代表,代表他们出席当选人议会。^⑤八万九千六百五十六人拥有选举权,我是其中之一。

我不知道我应该支持候选名单上的哪些人。

我家里的人大多参加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决定不参加选举。我不知道投谁的票,倒不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家的土地在瓦迪汉宁,也称奈斯－济奥纳,但多年来已没有我的份。我的政治观点接近,或者说曾经接近工人联合党。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大约六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我会投新成立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票,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它。

但是,对我来说不幸的是,那时发生的几件事,使我很难受地看到,在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存在着腐败。正如英国人经常说的那样,有人企图“操纵我”。我发现这种情况之后,那种受到侮辱和满腔愤怒的感觉至今还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

我要把这几件事在下面记录下来。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连同事事件有关的人都不知道全部真相。事件本身,或者说事件的蛛丝马迹,修正派是如何得知的,我并不晓得。^⑥也许,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前来争取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同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毫无关系。

我自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对魏茨曼粗暴的、毫无道理的攻击,不仅激怒了我,也激怒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们的民族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⑦比亚利克很敬重雅布庭斯基这个知识分子,但认为他的政治道路是错误的,是误入歧途的。仲夏,赴欧洲治疗肾病之前,他向我倾吐了他的肺腑之言。黄昏时刻,我们沿着海边散步。比亚利克凝视着渐渐落入地中海平静水中的太阳,他的话语和脸色都充满痛苦。这痛苦并非由他腹股沟那里的疼痛所引起,而是由那个将他的作品《悲痛与愤怒的诗》译成俄文的人给他带来的悲痛与愤怒而引起的。

“此人是一个十足的煽动者,”他痛苦地诉说道,“他现在正煽动犹太教士拿起菜刀去屠杀魏茨曼!本-霍林先生,你同英国当局有联系。你肯定能够作证,他们充满敌意的裁决同魏茨曼的行动毫无关系。难道修正派已经忘记,正是由于他,我们才有了《贝尔福宣言》?”^⑧他们的忘恩负义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几乎可以这样说:战争一结束,在这里的大门敞开的时候,有一百万,或者说,至少有五十万犹太人没有趁机移民到这里来。这当然不是魏茨曼的过错。我看到,比亚利克痛苦地咬

着嘴唇。最后,我想起来了,这位民族诗人也是在前一个十年的中期才来到“他心中的理想之地”。

假如我是东方犹太人,我也许会把票投给东方犹太人的工党,只要我能听到,我的朋友米里亚姆在那儿能得到拯救。但是,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犹太领导人,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同英国高级专员联手,已经做出决定:每个犹太人只投其同族同宗人员的票,即西方犹太人选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选东方犹太人,也门犹太人选也门犹太人。

我不否认,我恋着米里亚姆,恋着她躯体的温暖和心灵的温暖。从去年春天以来,我就未能直面看过她,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怀疑自己对她做了像 N 及其主人对我做的那种事儿。但是,也许我错了。我写出下面那些文字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澄清这个痛苦而烦心的问题。

注释:

①植树节:犹太历的舍巴特月十五日。普珥节:犹太节日。古代的波斯王亚哈随鲁(公元前 485—前 465)命犹太女子以斯帖为王后。她凭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挫败了波斯王朝宰相哈曼企图把波斯全境的犹太人斩尽杀绝的阴谋。她被犹太人誉为女子的楷模。普珥节是为纪念她拯救同胞而设,时间为犹太历的亚达月十四、十五两天。哈努卡节:犹太节日,又称净殿节或光明节,是为纪念公元前 165 年犹太民族反抗异族统治起义胜利,收复耶路撒冷,洁净第二圣殿并把它重新献给上帝的日子。节日从犹太历的基斯流月二十五日开始,延续八天。初熟果子节:犹太人认为,土地上生长的五谷的果实为上帝恩赐,故应将首先成熟的谷果献给上帝,以示感恩。

②阿加莎·克利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

③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 1948 年建国后的首任总理。

④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曾用飞毛腿导弹袭击特拉维夫。

⑤1918 年,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决定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团管理各自内部事务的权利。1920 年,犹太人社团利用这一权利在各党代表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自治团体“当选人议会”。

⑥指犹太复国主义者修正派联盟。这是一个由政治家、作家弗拉基米尔·雅布庭斯基(1880—1940)建立并领导的右翼犹太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1874—1952)所领导的犹太工人运动的主要反对派。

⑦比亚利克(1873—1934),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1873 年出生在乌克兰,1921 年在高尔基帮助下移居柏林,1924 年迁居特拉维夫。

⑧《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战时内阁通过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发表的关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全世界犹太人都认为这是哈伊姆·魏茨曼长期斗争得到的结果。



我在雅康大街拐角处的特拉姆波尔德街上租了一套住房。1930年3月初,我站在住房的门前,审视着我刚刚钉在门上的一个不大的招牌:阿夫纳尔·本-霍林,侦探和调查员。

牌子上的字,是根据我们的民族诗人比亚利克的建议书写的。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在发生阿拉伯人暴乱之前的那个夏天形成的。当时,我还在他家对面那个警察局当警官。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早晨,比亚利克耷拉着脸走进警察局。他摘下帽子,擦去眉毛上的汗水,带着忧郁的表情告诉我,他心爱的小狗“卡皮”不见了,他已经找了几个小时,但仍找不到。

“不要担心,比亚利克先生,”我对他说,“正如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经常说的那样,天遂人意,你的小狗会找到的。”半小时之后,我带着“卡皮”来到比亚利克寓所的门口。诗人喜形于色,真诚地感谢我,热情地邀请我进去喝杯茶。“如果‘卡皮’出了什么事,我是决不会饶恕自己的,”他说,“我怎么能向如此珍爱它的孩子交代呢?”如果是市场上的一个普通老百姓送还这只狗,他也许会要求诗人写几行表示感谢的诗句,甚至写一整首表达充满内心喜悦和欣慰之情的诗。然而,我同一些诗人和作家非常熟悉,我头脑中自然不会产生这种想法。

我们围桌而坐，曼雅夫人给我们送来茶点，叫我给她讲讲我的经历。我说，我出生在犹太人定居点奈斯－济奥纳，从小就不爱在田间劳作。而总是同守夜人为伍，看守犹地亚地区犹太人定居点里的庄稼和葡萄园。^①

一听到“守夜人”这个词，曼雅惊叹道：“啊，那些犹太男孩和女孩，总是打扮成阿拉伯人的样子，戴着阿拉伯头巾，背着枪！”从她说话的语气可以看出，她对这种职业评价不高。而比亚利克则满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天遂人意，一种新型的犹太人在以色列成长起来，你和像你那样的人就是这种人的先驱。如果诺亚来过这个国家，他也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守夜人。他骑马的技术比所有的乌克兰暴徒都要好。”

“足下所说的是小说《篱笆后面》中的诺亚吗？”我询问道。比亚利克没有回答。他抚摸着小狗。小狗因为刚刚回到家中而兴奋不已。我想问诗人，该小说的结尾有什么含意。这个问题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之间已引起争论。但是我知道，人们是不问作者写作的含意的。因此，我便说：“你是对的。守夜人本来是会伸出双手欢迎你的诺亚的。因为他生在乌克兰，不像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

“这只能说明，就连我们这些勇敢的守夜人，也没有摆脱犹太人在流散中形成的那种可恶的宗派主义。连以色列的景物都不能把这种宗派主义情绪从他们的心中根除掉。”比亚利克说。这时，我产生一个愚蠢的冲动，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每次文学讨论会上总有人提出来。我一直参加这些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有时在工人俱乐部举行，有时在咖啡馆举行，有时在读书爱好者的家中举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社团里，有谁不把自己视为读书爱好者呢？我提的问题是：民族诗人在以色列这片梦想之邦、心仪之地定居之后，为什么竟没有写过一首诗，描

绘这个国家及其山水,描绘他每天亲眼看到的一切,从东边那浅蓝色的山峦到西边那湛蓝色的海水?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一再表示歉意,请求谅解。尽管如此,诗人听到这个问题时,脸上仍掠过一种痛苦的表情。这时,钟声响了。我低声说了句“请原谅”,站起身,就走开了。后来我才发现,比亚利克患了肾病。他的两个肾中及通向肾的血管里积满了沙石,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的确,我给他把小狗送回去不久,他就赴德国的疗养地就医去了。

在比亚利克家中发生的这一幕,使我想起在本-古里安家中发生的类似情况。本-古里安当时担任以色列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为了就治安调查或其他什么事取证,我来到他家。而他却盘问起我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听到我是奈斯-济奥纳地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脸色变得严厉起来。他告诉我,他在里尚·齐翁葡萄酒厂工作过,当时的雇工和农场主之间关系紧张,还发生过冲突。说完这些之后,他询问我的政治倾向。听说我支持工人联合党之后,他很高兴。这时,他的妻子鲍拉端着茶盘进来,询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曾经结过婚,但我的妻子因难产和婴儿一起死去。她不禁咂舌。她询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再婚。本-古里安也许注意到我的窘状,就支开她,叫她去附近的文具店买一本新的笔记本。但是,本-古里安夫人走到窗前,喊叫在马路上玩耍的孩子,让他去文具店,给她买一本黑皮的笔记本。使我心安的是,她没有再回到我们坐着谈话的这个房间。本-古里安开始向我打听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我们同英国要员的关系等情况。

下面,我要讲述比亚利克参与在我家门口挂牌子的事。初秋,我不得已而从警察局退職。之后,我决定以我最熟悉的侦探

职业来维持生计。这时,我突然想到,我还不知道如何称呼我的新职业。我想找戴维·蒂德哈尔商量。在警察局里,他是最了解的人。可是,他已经去埃及好几年了。我想同语言委员会接洽。但是,我担心,他们在通过委员会会议把事情搞清楚之前,是不会回答我的。可是,幸运的是,我一走出我在特拉姆波尔德街上租的住所,比亚利克就沿着从他家去海边的固定路线走过来。

像往常一样,这位民族诗人被人们围起来。他们满怀尊敬听他发表讲话,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发出赞同的声音。但是,每当特拉维夫的儿童穿过马路,比亚利克就让他的听众安静下来。他把手杖从这只手放到另一只手里,抚摸着孩子们稚气的头,同他们亲切交谈。我不打算闯进他身边那些神魂颠倒的听众中间去。可是,他一看见我站在住所前的小门廊里,眼睛就突然亮起来。他招手叫我过去。“这是本－霍林先生,”他对罗尼茨基说,“他是警察局的警官。去年夏天,是他给我找到了迷路的小狗‘卡皮’。”

“请原谅,先生,”我说,“我已经从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辞职。”“已经辞职?”诗人吃惊地重复道。这时,我把他叫到一边。我告诉他,虽然我奉命决不能离开警察局,我还是带了两个警察去阿布－卡比尔橘树林,把一帮去特拉维夫搞破坏活动的阿拉伯人拦截回来。

“愿上帝与你同在。”这位《在屠城》的作者说。《在屠城》这本书描写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事件,对那些向屠杀者卑躬屈节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②“就是在你去的那些橘树林里,阿拉伯人在八年前杀害了作家布伦纳。”^③

“我的长官本来要对我进行刑事诉讼,”我说,“由于‘伊休夫’某些领导人的干预,他们才同意停止。他们提出的条件是,

我脱下警服，从警察部队退役，以后再也不捣乱。”^④

“既然是这样，”比亚利克热情地说，“我就指示负责建设‘奥海尔·舍姆’大厅的承包商，立即给你找一份工作。像你这样忠诚而又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对他肯定是有用的。”

“非常感谢你，”我回答道，“我已经有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我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谋生手段。”

比亚利克邀请我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们走下海滩。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领着我向水边走去。我将自己选择的职业对他说了。他一时没有说话，显然是在思考。思考过后，他说：“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给你这种职业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即‘调查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在希伯来语中一直在沿用。这个词可以变成动词，变化一下词尾还可以变成名词和形容词。但是，我听说，人们最近开始喜欢‘侦探’这个词。这个词也能找到其来源，开始在《密西拿》里见到，迈蒙尼德也使用过。”^⑤

这时，有一群人又聚集到比亚利克周围。我对诗人表示过感谢，就前往手工艺人集中的摩卡兹·巴雷－哈梅拉查大街，去找做招牌的人，让他把两个词都刻在我的新招牌上。

现在是冬季将尽的时节。我站在沉重的木门前面，端详着那块招牌，感到悦目赏心。除了平常的锁之外，我又给这个木门配了一个先进的装置，叫弹簧锁。不久以前，特拉维夫的居民有不锁家门的习惯。据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民族诗人宣称，只要我们中间还有操希伯来语的小偷和妓女，我们的民族就决不会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对这一传言，比亚利克强烈否认，但是无效。此种格言一旦同名人联系起来，他就同它们难分难解了。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有人甚至将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话也归诸于他。有人宣称，他听这位诗人说过，这位诗人不喜欢阿拉伯

人,因为他们使他想起了东方犹太人。我至今仍记得,这个传言曾使比亚利克无比愤怒。他断然否认说过那种话。他反问道,在所有的人中,怎么可能把这些传言都归罪于他,归罪于一个为西班牙犹太人的文学传统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谈到这里,我对他说,如果他就这一诽谤事件向警察局起诉,我会自告奋勇,除掉制造和散布谣言的这种可鄙的诽谤之人。但是,诗人犹豫不定。这时,我们就处理一些更紧急的事情去了。

如上所说,第一个传言并不比第二个准确。可是,这个传言不久就被几件事证实了:一些小偷开始在特拉维夫“工作”。其中,有赫兹里亚高中的一个毕业生,他以足智多谋出名,他凭此能潜入被盗人的家中。每个星期,我都被叫去处理两起报案的盗窃事件。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把钥匙,打开门,走进去。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大写字台,上面盖着一块黑油布。写字台后边放着一把椅子,高背、软垫,有两个扶手。写字台的前面,有两把比较朴素的圆靠背椅子,薄木头做的薄椅垫上,镂刻着像树枝条一样的图案。在靠近一面墙墙根的地方,摆着一个低靠背长沙发。那是在雅法一家亚美尼亚人开办的家具厂购买的。

这个房间不大,但天花板和窗子都很高。为了填满空间,我把我的一些照片送到摄影师苏斯金那里,请他放大成长四十厘米、宽三十厘米的规格。这些照片是我当警察时在以色列和大约旦各地拍摄的。在其中一张照片上,我骑着我的母马“巴希拉”,把英国式长枪放在马鞍上。起初,我想像阿拉伯人那样,把我的私人左轮手枪也挂在墙上。这支手枪是我从警察部队退役后被允许保留下来的。但是,到最后,我认为还是把这支手枪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更妥当一些。

通向我卧室的门,开在外墙和右墙之间的墙角上。这间卧室里的家具是房东的:一张宽床,就像我曾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里见到的床一样,床上竖着一个铜支架,无疑是为了支撑天篷用的。而现在却用来支蚊帐。但是,因为夏天还没到,我把蚊帐卷了起来,以便睡觉时不妨碍新鲜空气进入我的鼻孔。床旁边是个很大的衣柜。为庆祝我开始一种新的职业,我在裁缝那里定做了一套西装,买了几件衬衣和一条领带。但我把这些衣服都放进去,也装不满衣柜的一半。

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用橄榄木雕刻的笔插架,上边的图案是由驴子组成的一支商队,跟在商队后边的是一头骆驼。骆驼的一边是个像长套管一样的套筒,另一边是个开口的盒子。套筒里放着一支笔,而盒子里放的是墨水池。我有一只很好的自来水笔,但我总还是注意把这个墨水池灌满,以适应一些新笔尖的需要。这个笔插是贝扎勒尔艺术学院的一位女手工艺人的作品,是我已故的妻子送给我的礼物。

注释:

①指死海以西、耶路撒冷以南,以希伯伦城为中心的山地和部分沙漠地区,同其北面的撒马利亚地区一起被称为约旦河西岸。

②1930年4月6日,在俄国的基什尼奥夫发生摩尔多瓦和俄罗斯反犹分子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

③约瑟夫·布伦纳(1881—1921),现代希伯来文学家,生于乌克兰,1909年移居特拉维夫,1921年在阿拉伯人骚乱中死去。

④伊休夫是以色列建国前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被称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⑤《密西拿》是公元三世纪初年(约200—210)完成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共六大卷六十三篇。它是将历代一百多位卓越拉比的十三部法规文集加以分类、整理与补充,以希伯来文写成的法律巨著。迈蒙尼德

(1135—1204)是中世纪首屈一指的犹太神学家、哲学家。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名门,从其父和其他学者学习。他的重要著作有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密西拿评注》和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密西拿托拉》。鉴于他对中世纪犹太教的重要贡献,人们把他奉为继领导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之后的“第二摩西”。

二

很明显，冬季已决定多陪伴我们一些时日。我穿上雨衣，戴上帽子，锁上房门的双锁，就出门了。那把简单的锁，钥匙要在锁眼里转两圈才能锁上；而那把弹簧锁，一关门就自动锁上了。雨下得并不大，但风很大，把雨点甩到我脸上，就像针扎一样。云层很低，不管眼睛往哪里看，看到的都是深浅不同的灰色：天空和大海之间是黑白相间的灰色，罗森费尔德住宅区那些低矮的小房子和雅康大街上那些高楼大厦之间，则是带有花斑的灰色。

我走下海滩。我们的地中海，常年呈湛蓝色，水势轻柔，细浪微卷，而今却像大海一样在咆哮。海浪有五十米高，直冲上天际。从天际到海岸，整个大海浪花翻滚，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如果风暴继续下去，海浪就会冲上第一排房屋，甚至冲上位于悬岩上的“红房”。我站在“红房”偏南一点的地方。看到海上冬季的风暴，我不禁心迷神驰。

不知是谁轻轻地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吓了一跳。我着迷于海上的景色，竟忘掉在海滩上不只我一个人。你是什么东西，本－霍林，是侦探还是诗人？我责骂自己。

站在我身旁的是 N。他像通常一样穿着皮上衣。上衣的下摆直遮到大腿和马裤。我对他知之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位年轻

官员，一直积极从事工人联合党和青年工人党两党的联合工作。有一次，我听他向政治积极分子和工人听众演讲，讲建立新党——统一工人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什么好写的。他当然同卢巴绍夫和伊德尔松不属于同一档次。^①然而，他却用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话语使听众相信，如果两党联合起来，这个联合起来的党就会在当选人议会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选举中赢得大多数，资产阶级和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就会遭到重创。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小伙子在政治上有前途。后来，我听到一个传言说，N 讲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比他大的要人们的话，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上边指定的。

“告诉我，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对我说，没有做一个字的自我介绍或表示歉意，“你已经找到一位华生没有？”^②

有两个问题同时进入我的脑海。首先，他怎么知道我有了新的职业？其次，他是否在暗示，他心目中已经有个人，他想推荐给我当助手？他也许打算推荐他自己？对他直截了当的问话，我决定旁敲侧击地刺探一下他的真意。

“你怎么知道我有了新的职业？”我问道。

“《圣经》里是怎么说的？雁过留声……换句话说，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

“这次风暴中还有小鸟？我在天上连一只海鸥都看不到啊。”

“别担心，”N 笑着说，“我的信鸽在冬天也照样工作。你在哪儿听说过私人侦探不需要助手？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没有这种情况。”

“在美利坚合众国，在旧金山市，我相信是有一位侦探，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完全靠自己活动，没有任何人帮忙。”

“那些美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说，他们要在纽约盖一

座一百多层的楼房，一座真正的巴别塔……”^③说到这里，N 的话语中那微带嘲笑的声调消失了。他严肃地说：“本－霍林侦探、调查员，我们想给你派个活儿干。某位有权势的人物很赞扬你。因此，尽管你还没有找到助手，我们已决定把这个活儿交给你。”他的话语中又有了刚才那种嘲弄的口气。

我没有问他所谓的权势人物是否指本－古里安，也没有问他所说的“我们”指谁。听到这个建议，我尽量压抑住内心的兴奋。正如英国人所说，这个建议来得“恰逢其时”。这不啻是个小小的奇迹：正值我囊中羞涩之际。

“我们干嘛要站在外边的风雨中呢？”我说，“我有一个优雅的办公室，我们可以到那里舒适地交谈。”

我们爬上台阶，来到门前的廊子里。N 摘下头上戴的帽子。那是一顶布制的帽子，歪戴在脑袋的一边。这种帽子在以色列劳工运动中很流行，特别是在这个运动中精力旺盛的官员里很流行。那些人都已走下脚手架，放下手中的砖瓦和水泥，到其他行业干活去了。

我们走进办公室。我脱下雨衣，但是 N 仍然穿着他的皮衣服。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审视过屋内的每件东西之后问：“你认识扎哈利亚·犹林吗？”

“就像我认识特拉维夫市长梅厄·迪津戈夫先生一样。”我回答道。

“什么意思？”

“我看见过他，听说过他，但从来没有同他讲过话。”

说实话，特拉维夫的人没有不认识扎哈利亚·犹林的。他是个又瘦又高的花花公子。尽管他不经常在街头露面，但有关他的业绩的传闻，特别是他的桃色传闻，到处可以听到。

我用征询的眼光看着 N。他，或者说派他来的那些人，要这

个风流荡子干什么呢？

“扎哈利亚·犹林失踪了。”他说。

犹林失踪，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已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特拉维夫街头已看不见他了。如果是在平时，这无疑会引起轰动，人们会喋喋不休地大肆谈论。但是，现在，这第一座希伯来城市和整个犹太人社会，正在忙于弥合阿拉伯人暴乱及后来的政治事件所造成的创伤，早已把犹林忘到脑后去了。

“我们希望你能找到他，”N说，“并且越早越好。”

“警察部队倒是有个寻找失踪者的部门。”我这样说，目的是想考验他一下，摸清他的意图。“正巧，我同这个部门非常熟。”

“如果你不愿意接这个活儿，我们就找别人去，”N有点不耐烦地说，“因为你在寻找失踪人员方面声誉好，我才来找你。在我刚来到这个国家那一年，你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大家都认为那个贝都因强盗已经死了，但你却在大约旦地区把他找到了。”

这件事是我在巴勒斯坦警察部队里最成功的事迹之一。那个贝都因人不是强盗，而是一个强奸犯。他所属部落的人，害怕受害者家人报复，就到处散布谣言说，他躲藏在一个干涸的河谷里的时候，被野兽吃掉了。现在不是追忆往事的时候。只听N又重复道：“如果你不想干这个活儿，我们就另找别人，有人乐意承担这个工作，挣得一份工资的——”

这正是我一直急切等待要听到的话。我不是昨天刚出生的那种人，也不是从散居世界各地而刚来到这里的那种天真的人。我知道，这些工作人员，特别是工党的这些人，都有个出名的脾性：在你完成他们交付给你的工作之后，他们总是以民族和工人阶级的名义热情地感谢你。如果你竟敢提报酬问题，他们就会伪善地扬起眉毛，睥睨地看着你。好像只要一提到钱，就在你的

眉毛上打上了恶魔该隐的标记。

“我接受这活儿，”我说，“我一定找到扎哈利亚·犹林。”

我们站起来，握着手。N说：“我们刚才的话就算没有说，好不好？”

“当然，”我说，“你是否忘记了一件事？”

N假装审视他的衣服。“我脑子里还有一件事。”我说。

“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N说，“我希望，你的聪明才智能够帮助你尽快找到我们这个人。拿着这个——”他拿出十镑钱，一张五镑的，五张一镑的。“其他的钱在你交货时支付。”

“还有另一件事。”我说。

“还有什么事？”N不耐烦地问道。

“如果我还在警察部队，你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我，我就会询问你，你为什么寻找犹林这个人，他和你有什么关系？”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来找你，而不去找警察。”

“无论如何，我认为你应该给我一两个线索。这样，我就不会完全在黑暗中去摸索，能够更快走上轨道……顺便说一下，连书本中也总这样写。如果有人来找私人侦探，请他寻找一个失踪的人，来人就会把掌握的所有材料都提供给他。”

N奇怪而神秘地一笑，犹豫了一下之后说：“我们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本－霍林。我托你办的事不是在书本上写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我能告诉你的，全部是推测，没有任何根据。那样，我怕使你带上偏见，使你走上歧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不要靠别人帮助。”

他戴上帽子，离开我的办公室。我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溜进附近一个犹太人餐馆，美餐一顿。这个餐馆是“特努瓦”消费合作社开办的。

这时，雨停了，风也不刮了。雨后弥漫在空气中的清新气味

涌进我的鼻孔。我在人行道上的一個桌子旁坐下来，点了几片面包、一盘两个鸡蛋做成的蛋饼、一瓶酸奶和一杯咖啡。

长着红头发的店主罗森保，习惯以先付一杯茶和一片面包钱的方式招待失业的顾客。他慢慢腾腾地给我做摊鸡蛋。我在他手中放了一个先令，他才睁开他那半闭着的眼睛，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急忙把乌黑的平底锅放在炉灶上。他的妻子给我擦干净桌子，放上一份分量很足的黄油和几片乳酪，乳酪有白色的，也有黄色的。吃饱以后，我告别店主，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写字台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纸，拿起笔在纸的顶端写上：扎哈利亚·犹林。之后，我竭力写下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一切情况。

但很快证明，我对他所知并不多。根据一些闲言碎语，他同犹太人社团中的诸多女人有私通关系。特别是舞台演员 B，她同犹林的桃色事件已引起相当轰动。在他的女友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向警察控告他。同时，那些戴绿帽子的丈夫们，对那种事似乎也宁愿缄口不语。在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有关她们之中一个人的传言传到我的耳朵里。那时，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对消息的真实性半信半疑，我就没有太多地关注。

既然如此，我就去女演员 B 的住宅。她住在西尔金大街。路上，我在沙洛姆·亚雷海姆大街拐角处的花摊上买了一大束鲜花。

B 的住宅是平房。大门口没有写着演员的名字，而是挂着一张画着脸谱的剧照。在她的两间屋子中，有一间租给了一个房客。一条人行小道从大街直通到门口。小道的两旁，一些攀缘植物长在用绳子架好的格子上。这所住宅位于大街的拐角处，北边是斯塔夫斯基奶牛场。荷兰奶牛正在那里的围栏里吃

青草。

我敲门。没人回答。我再敲，听到里边有闷声闷气的声音。第三次敲门时，传来 B 的声音。那是一种与以色列的任何人都不同的、尖厉的声音。她回答道：“进来！”

我推开棕色的木门走进去。这房子比特拉维夫一般的房子低矮。特拉维夫大多数房子的天花板至少有三米高。这所房子的窗子，更准确地说是惟一的窗子，也比一般的窗子小。因此，虽然房间本身并不小，但却给人一种局促的印象。

看到房间里的家具，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最大的一件家具，是一个低靠背长沙发椅。沙发椅旁边是一些厚坐垫。据我判断，那是用大马士革皮子做的。女演员坐在桌子旁边。桌子后边是个大镜子。她穿着睡衣，头发蓬乱。我心想，看到一个舞台演员穿着如此随便，对我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她看到我时，脸上毫无表情。可是，当我向她打招呼时，她竟轻轻地颤抖了一下，本能地裹紧了身上的睡衣。

“我想你是剧院的信使，”她的声音像闷铃一样在房间里响起，“我在等待他们给我送来急件。”

“请原谅，夫人……”我嗫嚅着说，满怀迷惑不解，“我给你送来几束鲜花。”

“那么，这就是你不辞劳苦，前来寒舍的原因吗？”

如果我是个戏剧评论家，我就会写一大篇文章，论述她赋予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但是，我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嗫嚅着说：“实际上，我本想在剧院里给你献花。但是，我不能从人群中穿过去。我不得不送你这些花……自从我看到你扮演奥菲利亚……我就不能平静……直到今天，你在发疯中唱的那支歌，仍然在我耳边回响……”^①

“请走近些，”她说，“把花放在桌子上，过来吧。”

这时,我记起来了,B是近视眼,但拒绝戴眼镜。我走到仅离她一臂之遥的地方。这时,她两眼盯着我,我的理智几乎失去控制力。

有生以来,我看见过许多双眼睛,女人的眼睛。其中有德鲁兹妇女杏仁般的眼睛,贝都因妇女乌黑的眼睛,还有劳工营中的姑娘们的绿眼睛和蓝眼睛。^⑤而像这样的紫罗兰色调的眼睛,我以前还从没有看见过。这时,我惟一的愿望是,让这双眼睛永远盯着我。

B从我手中接过鲜花,放到花瓶里。她说:“你的面孔很熟。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我不能继续伪装下去。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新名片。她把名片举到眼前。

“本-霍林……你是那位追踪所有失踪者的警察——”

“我不再当警察了,但是我还在寻找失踪的人。”我说。

“在这儿?”

“我在寻找扎哈利亚·犹林。”

“在这儿?”她重复道。在她这句简短的反问中,我再一次感到那里有丰富的内涵。

在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她用一种单纯而又带嘲弄的语调说道:“请寻找吧。你可以尽情搜查……看看床底下……去盥洗室看看……你还得到了我的允许,可以打开衣橱。也许,你寻找的那个人就藏在那儿……说不定,你还会在我的衣服里发现他的死尸呢?”在说这番话的过程中,她的眼睛一直令人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尴尬地咕哝着。

“我不否认,我认识你寻找的那个人,”B说,“但是,我有很长时间既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如果你在

我搬家之前那几个月来找我,你也许会发现,在我以前住的公寓里,他留下过一两件小玩艺。如果你是一只警犬,你也许会从中得到线索。”说到这里,她改用并不委婉的讥讽语调说:“但是,现在,我这儿连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也没有。”

我在盘问证人和嫌疑犯方面有很多经验。但是,我以前还从未审问过演员,当然更没有审问过像 B 这样有才干的女演员。这位女演员说的每句话,都包含着二三层、甚至四层不同的意思,使你不可能猜测到她的话的真正含义究竟在哪个层面上。也许,这连她自己也不拿不准。

我准备向 B 表示道歉,离开她家,并希望最近能有一天在不同的情况下再约见这位女人。这时,她突然触摸起我的胳膊和我的头,好像在测量我的尺寸。她说:“对不起,你来我这里时宜不合……我必须研究我要扮演的角色,因为不久就开始排练……”

“说真的,实在对不起你。”我说。

“也许这会带来某种好处。”她说,向我发出热情的微笑。这种微笑几乎融化了我的心。“今天上午你到我这儿,也许是个好事……你也许能帮助我……当然,如果你不急于去其他地方的话……我决不会占用你的宝贵时间……”

“我很高兴帮助你,”我说,“我为你能干些什么呢?”

“你可以帮助我,为我扮演的角色做准备。”

“非常高兴。”

“请坐在这儿。”B 指着一个皮坐垫说。这时,她自己坐在长沙发椅上,靠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羊毛垫。从靠近长沙发椅的一个匣子里,她拿出两本硬皮的小册子,把其中一本递给我。封面的上方写着“欧里庇得斯”,中间写着:“酒神的伴侣,或疯狂的女人。”^⑥

“欧里庇得斯这个名字在你的心目中有有多大分量？”B 问道。

“我确实说不出那些古希腊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尴尬地回答道。

“这很容易弥补，”B 笑着说，“在准备饰演美狄亚之前，我也不大了解欧里庇得斯。当时，导演认定，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能够饰演杀害自己孩子的女人这样的悲剧，并把这个角色派给 H。”

我自己没有参加《美狄亚》的演出，但是我记得，人们对演出议论颇多。我还想得起来，一听说此剧在希伯来舞台上演出，一些评论家就感到震惊，而 H 的演出也没有获得多高的评价。“你也许是幸运地避开了。”我说。

“我要饰演美狄亚就会完全不同。”B 说。稍停，她又补充道：“你是知道的，犹太妇女也杀她们的孩子，当然，原因是完全不同的。顺便说一下，美狄亚的第一个打算是杀死她的情人，因为他抛弃了她，投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在这个剧本中，”她指着手中的脚本说，“也是一个母亲杀死她的儿子，虽然她不知道他是她的儿子。”

“一个母亲不认识她的儿子，这可能吗？”我质疑道。

“这里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如果我给你把这个剧本的主题说一下，你就会明白。当然，如果你不急于走的话。”

“我不着急走。”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酒神巴克斯，也叫狄俄尼索斯。”

“酒和陶醉之神。”

“也是激情之神。毫无限制或节制的欲望。顺便提一下，一些学者认为，这位酒神的名字，词根是希伯来文，或者说是迦南 - 希伯来文。”

“来自‘律法’这个字？”⁽¹⁾

“我指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巴克斯。欧里庇得斯剧本的名称《酒神的伴侣》就由这个字而来。酒神的伴侣,换句话说,就叫酒神的女崇拜者。”

“由‘玻璃’这个字而来?”

“我指的‘巴卡’这个词根。”

“哭泣? 酒和哭有什么关系?”^⑧

“正像在巴比伦那样,女人为塔木兹神死去而哭泣……为他哭泣和悲伤,好像他就是她们心灵上欲望的情人,或至少是身体上欲望的情人。他已死去……在夏季,她们悼念他;在春季,她们庆祝他回归人间。”^⑨

“在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人中间,我亲眼看见过类似的仪式。”我说。我正要描述在一个部族中的亲眼所见,B 就打断我的话说:“我必须做好准备,准备在导演面前第一次朗读这个剧本。如果你同意帮助我,你的帮忙是不会没有酬劳的。”

我不明白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可能在暗示那件事? 俄顷,她好像猜透我的心思,就说:“你很可能会得到你寻找的那个人的一些消息。一些侦探不是经常在一些根本意料不到的地方,发现他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吗?”

“的确,是那样。”我说。稍停之后,我又说:“你在扮演母亲的角色,我确信。”

“那么,你要演我的儿子了。”

“扮演你要杀的儿子。”

B 把剧本的第二份抄本交给我,打开来。“给你,”她指指剧本的某个地方说,“你要读两个角色的台词,狄俄尼索斯和他儿子本修斯。从第八百一十行开始。”

“狄俄尼索斯,”我开始念道,“这样,难道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山上的什么地方驻扎吗?”

“本修斯：呜呼！一睹可以值千金。”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奇怪的欲望？”

“我渴望看到她们喝得酩酊大醉。”

“现在，”B说，“狄俄尼索斯提醒他有危险。如果那些疯狂的女人发现他，他就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他像所有的悲剧英雄一样，固执己见，拒不听劝告。而一直阴谋策划诱捕他的狄俄尼索斯，告诉他穿上女人服装……现在，我们跳到第一千一百行。”她翻了几页后说：“试想，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像森林中的一块空地，周围是茂密的树木、鲜花、青草。在谷地的中央，有一群女人，其中有老有少，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还有做母亲的，她们都沉浸在对狄俄尼索斯的膜拜之中。我不知道她们究竟在做什么。在我看来，连学者也弄不懂她们崇拜酒与激情之神的秘密。在我的想像中，女人们是裸体或半裸体。”B一边这样说，一边开始做翻腾的动作。她的动作越来越激烈。“一群女人春情激荡，她们越来越激动。唉，你在等什么？念啊！”

我的窘迫之情不断增加。

“你就是本修斯！你坐在树梢头，女人们发现了你，她们就向你扔石头。这时，你母亲向她们喊道：都过来，站在树周围，你们这些疯狂的女人。我们很快就会抓住那个爬在树上的衣冠禽兽……她们拼命摇晃那棵树，而直到她们把你拖下来，掉到她们中间……你被那些情火中烧的裸体女人们包围着，她们知道你在想什么。一直到你恐惧地意识到，她们要把你撕裂！而你的母亲，就是那个生育你的女人，那个哺育你的女人，那个给了你血肉之躯的女人……你撕下了你的伪装，你乞求同情，但所有这一切都白费……你已经侵犯了你无权侵犯的地方。这儿。读！”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朗读的。但是，对我来讲，自从小学四五年级扮演哈拿的七个儿子之一那个角色以来，还没有这样

投入地读过剧本的台词。^⑩我好像真的在乞求生存：“我是你的孩子，你亲生的，我的母亲！我是本修斯，是你在埃齐昂的房子里生的，可怜可怜我吧，母亲！”

B放下剧本，拍手喝彩，用她通常的声音说：“我不愿意杀死你，阿夫纳尔·本－霍林。”我想起了传说中的安息日河，它性情狂暴，但霎时就会平静下来。^⑪这些演员也一样，从他们饰演的角色之中，一眨眼功夫就回到日常的自我之中。其转换速度之快，真令我难以想像。“我们简短的神酒节结束了，”B说道，“我感谢你在其中饰演角色。”当她看到我眼睛中流露出不可理解的神色时，就又补充道：“‘神酒节’这个词，用以特指膜拜狄俄尼索斯的庆典或崇拜仪式。”

B把手伸向我。我握着她的手，当然没有提醒她所作的许诺。她当然还没有忘记。“做好事自有好事相报，”她说，“我们的先哲不是这样说的吗？你从我这儿也得到了一个线索。我只能说这些了。”

我向她告别后走到大街上。天上的云彩稀薄，好像一张张薄纱，一团团棉丝。太阳的热度明显增加，而风儿却不见吹拂。我前往洛姆·阿雷海姆大街，仔细琢磨着这位大演员讲的话。难道这个希腊悲剧真的包含着有关犹林命运的线索吗？或许，她只不过是戏弄我一下而已？非常幸运的是，演艺界的大部分人是诚实的，正直的。否则，他们就会变成十足的恶棍，就会轻而易举地欺骗纯朴的老百姓。

注释：

①卢巴绍夫，不详。亚伯拉罕·伊德尔松（1882—1938），现代犹太音乐史研究创始人、作曲家。他以口述的传统方式收集了世界各地犹太民间的大量音乐资料，写有十册《希伯来东方音乐旋律宝库》。

②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塑造的足智多谋的侦探典型。他的得力助手是华生医生。

③巴别塔为《圣经》中所说的通天塔。

④奥菲利亚是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因失恋而发疯。

⑤劳工营是二十世纪初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建立的生产和自卫组织。

⑥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 485—前 406)，古希腊悲剧诗人。公元前 431 年和公元前 405 年，他的名剧《美狄亚》和《酒神的伴侣》分别上演。两剧的女主人公美狄亚是个异邦巫女，狂爱希腊英雄伊阿宋。后来，伊阿宋背弃了她，她决计报复，先杀死伊阿宋的新娘及其父王，后又杀死她同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使他绝后。

⑦酒神的名字巴克斯(Bacchus)和剧本《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nals)分别同希伯来文中的“玻璃”(kos)和“哭泣”(bacha)有相似的音节，而酒神的另一个名字狄俄尼索斯(Dionysius)，同希伯来文中的“律法”一字(din)也有相似的音节。

⑧巴卡(Bacha)在希伯来文中是“哭泣”的意思。

⑨塔木兹神为巴比伦人崇拜的生育之神，体现春季万物新生之力。

⑩哈拿据说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犹太教法典认为她是七位女先知之一。

⑪安息日河是犹太教传说中的河流。这条河水流湍急，河中所流不是水，而是乱石，只有在安息日才断流，可以渡过。

三

我盘算着应该到哪里去用午餐。离开警察部队之后,我习惯在工人食堂就餐,因为那里的饭菜便宜,几乎是免费。然而,喝同样的汤,吃同样的土豆泥,即使能填满肚子、减轻饥饿,一个人也不能总是这样吧?

今天,我要像资产阶级那样,尽情享受一番。我穿过本-耶胡达大街,走进一个比较豪华的餐馆,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背对大街。这样,那些面带饥饿之色的失业者去工人食堂时就不会看到我。我叫了一份烤鹅肉,一瓶啤酒。吃完后,我在桌子上放了三个先令的钱。老板要找钱给我,我告诉他不要找钱,每天至少两点半之前要把这张餐桌留给我用。从他对我连声致谢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满足我这一要求并不太困难。

离开餐馆,我走进莫各拉比电影院对面的“丛林营销处”。我经常来这家英国人办的商店。这里从不讨价还价,也不赊账买东西。我有时在这里买一袋干面包片,有时买一听利普顿茶。这次,我买了意大利式蒜味咸腊肠,还有一块很香的瑞士奶酪,一盒松脆的酥饼。我把所有这些吃的装进一个带拉链的包里,用一张工党出版的报纸《话报》包起来。然后,我先到约纳·哈纳维大街拐弯处,再往右拐去雅康大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家。

我坐在写字台旁,打算将上午得到的材料写下来,如果我确

实得到了什么材料的话。但是，肚子吃得太饱，容不得我这样做。我控制不住自己，只好美美地睡了一觉。一个人头脑清醒时，他倒是应该作些思考的。

一觉醒来，我把咖啡壶放在煤油炉上煮咖啡。这个制作精美的咖啡壶来自大马士革，是外约旦的一位伊斯兰教主送给我的礼物。我慢慢地吃了几片酥饼，啜饮又甜又浓的土耳其咖啡。喝完，我就进了浴室。

我以前还从未使用过这样好的浴室。浴缸是金属做的，包着一层闪亮的搪瓷。紧挨浴缸是一个现代化的马桶。在地板上蹲茅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可以像国王坐在宝座上一样，悠然自得地坐在马桶上办事。洗完澡，解完手，回到写字台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从记忆的深处搜寻出在雅法的布斯特罗斯大街上的那次巧遇。那是几周之前，在亚美尼亚人开办的家具店门前，我碰上了阿布－阿里。他是我在雅法警察局工作期间的老相识。

阿布－阿里是个阿拉伯黑人，是个块头很大、在港口卖苦力的码头工人，同时肩负有秘密使命。我给他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他向我提供犯罪和罪犯的情况，我付他两三个皮亚斯特。虽然他提供的消息大多是夸张的，有时纯属编造，但偶尔他也提供一点有用的情报。就在那天上午，阿布－阿里像个久违的朋友那样向我打招呼。他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向我表示祝福。经过这一连串繁文缛节的寒暄之后，他才压低声音问我，是否知道富裕的地产商 M 的妻子同犹林先生“发生关系”之后“失踪”了。他露出满口闪光的牙齿，暗示其中可能有诈。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用阿拉伯语问。

阿布－阿里没有回答，大概是在等待我往他手里放硬币。

过了一会儿,他用同过去一样的话语回答说:“我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 谋杀?”

我的沉着使这个黑人迷惑不解。他抓住我的手说:“有真主作证,警官先生! 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海滩上做爱。此后,那个女人就离家出走了。”

尽管阿布-阿里发誓说,他讲的是实话,但他的故事听起来仍然有点荒诞不经。假如我还当警察,我毫无疑问会指派手下的人去调查。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就简单地说:“愿真主与你同在,阿布-阿里。”说完,我就走进亚美尼亚人的家具店。

我拿出纸写道:B的神秘的暗示同阿布-阿里诡秘的消息,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无论如何,我下一步要在M身上做文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M还不知道我从警察部队退役。我一定要把这种情况加以利用。我要像他受到某种怀疑那样盘问他。当然,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如果M发现我欺骗他,那是会闹得不愉快的。我必须小心从事。

我知道,M习惯在设有赌场的咖啡馆度过傍晚时辰。我出发了,看他是否像通常那样在那里。太阳快要坠入大海。此时的大海几近平静无波。日落之后,星星无疑会在天空出现,而满天的云彩就会消失。

赌场坐落在特拉维夫海滩上。赌场坚实的支柱就栽在水里。在我看来,赌场是这座希伯来第一城中的一个奇迹。当然,毫无疑问,同这个新兴城市的规模相比,赌场是完全不合比例的。赌场是前几年在这个城市大发展的高峰期建造的。在那个时期,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壮观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当时,赌场生意兴隆。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些“新贵”,那些花半镑钱买一

块地,转手就卖五镑钱的人们。老式家庭中的一些人也成为这里的常客。在暴乱之前,雅法的那些阿拉伯知名人士也竞相来到这里。现在,那些阿拉伯人不再来这座希伯来城市。在赌场这座恢宏的建筑中,几乎空空如也。每天,不同房间的牌桌都摆着,鲜花仍插在花瓶里,但只有很少几个人来这里光顾。其中,有些是英国-巴勒斯坦公司和犹太代办处的高级官员,他们的薪水不受大萧条的影响;^①有些是古老东方犹太人家族的业主,M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偶尔,一个英国地区专员或其助手也来这个地方。

我走上通往赌场大门的台阶。在生意兴隆的全盛时期,守门人总是在那里迎候顾客,而今却没有在岗位上。于是,我自己就走进去。我顺着楼梯爬到最高层,走到伸向大海的阳台上。在远方几乎是清晰可辨的地平线上,悬挂着一轮即将沉入大海的红日。微波细浪懒洋洋地拍打着赌场的柱脚。

赌场里灯火辉煌,连无人的房间里也一样。在楼下的一个侧室里,我看见M同一个阿拉伯人围桌而坐。那个阿拉伯人来自雅法。我认识他,倒并不是因为M的关系。他们面前放着玻璃高脚杯,杯子里盛着彩色冰激凌。我急忙转过脸,匆匆走出去。这未免令那个侍者失望,因为他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招待我。我在心里对他说,别那样垂头丧气,你很快就会得到丰厚的酬金。

我回到我住的公寓,脱下外套,抽掉裤子上的皮带,系上背带。我把一顶翘边帽子戴在头上,站在穿衣镜前。我发现,我扮作美国旅游者看来并不难,至少可以瞒过那些从没有去过美国的人。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嘴唇上粘上一撮假胡须,戴上一副眼镜。经过这样一番乔装打扮,我就又回到赌场。

侍者看着我,两眼中充满热切的期待。这样的期待,他以前

还从未流露过。他急匆匆走到我身旁，一副讨好的样子。“我找 M 先生。”我用英文说。

“是，是，请，”侍者急忙回答道，“他在这儿，在屋里坐着。”他领着我走进 M 和那个阿拉伯人一起坐着的房间。他们面前的高脚杯已经空了。一看见我出现在门口，他们就用审视的眼光盯住我。

“请原谅，”我用英文对他说，“你好像就是 M 先生吧？”他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最后，他说：“是，正是在下。”他先用法文说，但随即又改用英文说：“是的，正是鄙人。我有幸说话的，又是哪位呀？”

“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说，“雅各布·希恩，纽约市人。如果我没有打搅你的话——”M 没有回答。那个来自雅法的阿拉伯人眯缝着眼睛打量我。“我想和你谈点生意。”

他面部一直流露着莫名其妙的表情。但是，我看到，他眼睛里却流露出感兴趣的光芒。我不知道他是否向那个阿拉伯人使过眼色。但是，那个阿拉伯人却从座位上站起来，瞅了一眼挂在一条很重的金链末端的怀表，惊叹道：“天哪！七点了！”他向 M 使个眼色，用阿拉伯语说：“把他带到沃劳津大街。”他很可能是要 M 把我带到他开办的一家妓院去。

侍者走来，满脸带笑。我要了一杯淡啤酒，然后说：“我有兴趣购买——希伯来语怎么说？——啊，买地基。”我用很重的美国口音说。

“我们可以用英文交谈。”M 说。

M 是个大约三十五岁的男子，胖胖的脸，脸蛋向下耷拉着。他的眼睛很圆，有些发泡，黯然无神。他微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但微笑中却蕴含着几分忧郁。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我知道，M 拥有好几块地，即我前面所说的“地基”。这些地基，他是

出高价买的。现在，他想卖掉，但却不想赚大钱。即使赚不了钱，因为有家族财产的支撑，他也不会破产的危险。因此，我想，如果我向他提出做一笔有吸引力的交易，他听后会立即跳起来，甚至邀请我到他在奈维和泽代克交界处的宅第，而不是到他在雅法至特拉维夫路上的办公室，就这笔生意签字画押。就我所知，每当他想软化那些重要客商的心，让他们乖乖地掏腰包时，他都习惯于这样做。

侍者把啤酒放在桌子上。我从兜里掏出一镑钞票，说：“不要找钱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向我道谢。

“现在，天太晚了，”M说，“如果你明天到我雅法路上的办公室……”

“明天我要离开这儿，”我说，“我买了‘阿波罗尼亚’号轮船票，明天上午从雅法启航。”

M上钩了。“如果你愿意到我家来，也许我们今晚就能成交。”

“非常感谢。”我说。我们站起来，离开赌场，向雅法方向走去。

“路远吗？”我问。

“我们乘马车去。”

有两辆四轮马车停在格拉大街拐弯处。其中的一个车夫显然认识M。他深鞠一躬，并向我们憨厚地一笑。这些车夫是暴乱之后第一批从雅法回到特拉维夫的阿拉伯人。

我们登上马车。车夫把鞭子一甩，马就开始向曼什耶方向走去。我蜷缩在座位上，拉一拉帽沿，遮住眼睛，生怕有人认出我来。我们穿过曼什耶狭窄的小巷，向奈维－泽代克地区走去。我一直假装是旅游者。我们走过哈桑－贝克清真寺附近那些小咖啡馆。对这些咖啡馆，对在那里抽水烟的烟民，我都了如指

掌。我说：“真是一幅东方的画卷！”

多么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巴格达。在我的想像中，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会突然出现在拐角处。^②

“但是，这是东方，”M说，“他们抽的是用印度大麻制成的海吸希。”

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讲起中世纪那些海吸希烟鬼的故事。那些烟鬼总是吸食海吸希，借以麻醉自己。麻醉之后，他们就出去杀人，主子让他们杀谁就杀谁。“杀人犯”这个词就由此而来。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是这样。听到这里，我独自大笑道：“这些烟鬼，耷拉着脑袋，闭着眼睛，梦想着在天国里等待他们的美女。只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或穆斯林狂热分子一煽动，他们就会出去搞暗杀。”就算是这样，我也注意到，M比我想像的更有教养。

我们进入奈维－泽代克地区。“现在，我们到了奈维－泽代克。”M说。

“我对这种居民区不感兴趣，”我说，“我想在特拉维夫新区，在北部，购买一大块地基。”

“我有一块很好的地基，”M说，“在贝尔福大街。你知道贝尔福大街吗？”

“医院就在那儿。”我说。

“地基在那条街的尽头处。空气很好。从二楼就可以看到大海美丽的景色。”

现在到了激起他热情的时刻。“我代表一个很大的集团，”我说，“代表的是一些犹太人。他们从华尔街的大衰败中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存款，希望购买一些土地，建设一个全新的住宅区。”

听我这样一说，M的眼睛像老式街灯那样亮起来了。“雅各布先生，我有一块你所需要的地基，在莫各拉比北边一英里处。

那是一个小区,那里都是带花园的小房子,就像过去在特拉维夫修建的那些。但是,现在都配备有现代化设施,你几乎可以说都是别墅。如果你那些犹太人不愿意住在那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可以把那块地皮卖给别人,赚一大笔钱。一个犹太人还会期望得到什么呢?”

马车停下来。M向阿拉伯车夫付过钱,我们就下车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进入M住宅的大门。M在那里过着某些东方权贵式的生活。难怪阿拉伯人称他优素夫老爷。

这座宅第有许多故事。然而,只有少数人有幸跨进其门槛。从大街上看,看不到什么。一道厚实的篱笆墙环绕着这座房子。人们看到的只有棕榈树梢和房顶。这座房子是一个富有的土耳其人给他的阿拉伯情妇修建的。M是在战后没花几个钱就买下来的。据传言,是他把它改造成一座小宫殿。

M打开沉重的大门。我们走进花园。甬路两旁是枝叶茂密的棚架,但因天气太暗,却很难看清楚。我们走近前门时,门打开了,好像是自动的。门前的台阶上站着穿制服的苏丹佣人。他以英国人所谓的“管家”身份替M管理家务。如果说他在这么晚的时候见到我感到吃惊的话,他的脸上却没有表露出这种神色或任何其他神色。他的两眼闪着光,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穿过一个小过厅,走进这所住宅中央的大客厅。客厅里的家具是东西方合璧式的。

在一块豪华的波斯、或许是阿富汗地毯上,放着一个沙发,几把扶手椅,几个坐墩,一个矮脚桌子。

M打开通到大厅外面的一个门。他带领我走进一个小房间。他显然把这里当做他的办公室。“这所住宅的第一个主人妻妾成群,就让最受宠幸的那一位住在这个房间里。”

M笑着说。然后,他示意我坐在一个雕花木椅上,旁边是大

马士革制的桌子。

我扯下假胡子，摘掉帽子，让他清晰地看我一眼。我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难道你不认识我吗，M？”

他的嘴像丢弃在干土地上的鱼一样张开了。他的眼皮上下抽动着。他把两眼擦了一次又一次。“你不是从纽约来的雅各布先生？”

“我不是从纽约来的雅各布先生。”

“你……你讲希伯来语。”

“我们可以讲地道的希伯来语。”我说。

M 伸手要拿沙发旁的铃。我抓住他的手。“我不准你那样做，”我严厉地说，“我不穿警服，你就认不出我来吗？”

他凝视着我的脸，吞吞吐吐地说：“你是……那位犹太警察……在雅法警察局供职的。”

“假如我是你，我决不会让任何人进这个房间。”我说。

门开了。那个苏丹人站在门口。“两杯茶，艾哈迈德。”M 说。

那个苏丹人关上门走了。我让 M 坐在他为我准备的椅子上，我则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M 坐得笔直。他的面部和手脚不时发抖。他的举止给我的印象是，他确实隐藏着些什么东西。

“你的妻子在哪儿？”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的妻子？”他吃惊地重复着，“我没有妻子。”

“可是，你有过一个，”我说，“那么，她已经不在了……”

“我的第一个妻子葬在老公墓。”

“那么，你第二个妻子呢？”这句话，就像英国人说的那样，等于“打了一暗枪”。

但是，这一枪好像是打中了目标。M 吃惊地盯着我说：“艾里舍娃不在这儿。”

“那么，她埋在哪个墓地？那个新的公墓？”

“不是在公墓！”

“当然不是，”我打断他的话说，“她埋在这儿！”

“这儿？这儿？”他重复道，好像不知道我在谈什么。

“这儿，这座房子的地下。你发现她对你不忠之后，就杀死她了。”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深感快慰的表情：难道我错了吗？“难道你否认你曾想杀死她吗？”我反问道，问后又感到有点不太明智。

“要是我的前任，毫无疑问，会在这座房子里当场把她杀死，”他说着，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即使我脑子里闪过那种念头，对一个人也不能凭他想干什么来定罪。如果你控告所有那些有过勒死妻子念头的丈夫们……”

“因为犹林的关系？”我漫不经心地问。

他点点头，说道：“我要告诉你全部情况。”

这段小插曲显然令他心烦。但他有机会倾诉衷肠，显然又很高兴。我希望，他要讲的故事至少能给我提供一点解开疑团的线索。

“我的第一个妻子患斑疹伤寒过世之后，我就被说媒的人们包围了。他们给我介绍的有处女、寡妇、离异者……有穷人、富人……有东方犹太人，也有西方犹太人。但是，我对媒约安排的婚姻不感兴趣。这次，我想通过恋爱结婚。我盼望有这样一个女人，她能把我的灵魂、我的感情引到满心向往之地，引到诗人和小说家所说的那种相互爱慕的佳境……如果他们所说的确实是真话。如果不感受一下全世界的人都赞美的那种崇高和美好的东西，我就死不瞑目。那美好的东西就是真正的爱情。”

“这时，你就遇见了艾里舍娃？”

“在阿里雅大街和阿伦比大街之间的莫沙沃特广场上，她站着拉小提琴。她是一个瘦弱而漂亮的女人。从传统的标准看，她并不美丽。但是，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我站着，听她演奏许久。最后，我从钱包里掏出一镑钱，放进马路上打开的小提琴盒子里，盒子里放的，都是一些值半个皮亚斯特的硬币。她对我迷人地一笑，又开始弹奏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心扉向她敞开了，带着实在的、切身的苦痛。

“第二天，我又来了。并且，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我邀请艾里舍娃吃午饭。

“也许，这是她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吃顿像样的饭。我邀请她去散步。她告诉我，她在这个国家是孤身一人。她是只身一人从波兰移民来的，到了一个基布兹。^③但是，她在那儿呆的时间并不长。基布兹成员无视她的音乐才能，派活的人根本不考虑她的手指。因此，她逐渐感到，她在丧失那种微妙的乐感。如果失掉这种乐感，她就再也不能继续演奏了。现在，我知道，这并不是她离开基布兹的惟一原因，显然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我知道，她向我隐瞒的不仅仅是……”

说到这里，他沉默下来。少顷，他又继续说：“我热诚地对她说，如果你是我的，我根本就不让你的手指沾厨房洗菜池里的水。听这样一说，我看到她的眼里闪出泪花。

“从她同意来和我同住那天起，我就像进了天堂，生活在欢悦的七重天里。也许我知道，她并不爱我。但是，我自己不承认这一点。”

“你家里人有什么反应？”我问。

他回答说：

“我家里的人自然是反对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出于偏见，出于忌妒。他们说，她之所以要嫁给我，是

因为另有他图。于是，我就质问我嫂子，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哥哥呢？是因为他眼睛里有魔力？还是他口袋里有魔力？这个家庭里有多少人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呢？我的亲属们把话都说尽了，其中有些话是肮脏的，听后令我血液沸腾，使我失去自制力，给了他们之中一个人一记耳光。

“现在我才懂得，正是因为家里人反对，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才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同艾里舍娃结婚。

“婚礼在远离家乡的亚历山大举行。我在火车上订了一个包厢，在位于悬崖盘旋道上的塞米拉米斯旅馆订了一套房间。我认识那里的犹太教区的一位教士。我找了两个证人，他就根据摩西和以色列法典，为我们主持了婚礼。

“举办完婚礼，我们就回到房间。艾里舍娃从盒子里拿出小提琴为我弹奏。她站在那里，全身几乎是一丝不挂。仅仅为了那一刻，好像舍弃一切都是值得的。后来，她放下小提琴，和我一起上床。她好像依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去开罗。我带她去参观埃及的古迹和动物园。第五天，她开始抱怨，说肚子痛。但是，所有在埃及的欧洲人都会肚子痛。

“回到家里，我就带她去玛尔卡斯教授那里，他给她开了药。她的身体状况有好转，有改善，但没有痊愈。说句真心话，我不得不承认，我有时不免怀疑，她肚子隐隐作痛，为什么总是在特别的时刻发作……”

他这句话没有讲完，就改换话题说：“我想给她点时间。我爱她。本－霍林，你是知道的。我像过去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那样爱她，我像过去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那样爱她，也许我将永远不再爱任何人！你来这儿，不是专门来听我诉说爱情苦痛的吧。”

很显然，他注意到我脸上掠过一阵不耐烦的情绪。“你利用

了我,现在我要利用你,把心里这些苦闷都倾吐出来。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感谢你的耐心和克制。我现在就来谈把你带到这儿来的那个问题。如果你仍想得到一块地皮,”他说到这里又笑了,笑得比以前更开心,“我确实为你操持了一桩令你吃惊的买卖,离海滩不远,在雅康海湾前边。”

这时,苏丹仆人走进来,送茶水和用杏仁、开心果做的东方式甜点。“喝茶之前,”M说,“我先给你来点烈性的东西。”

他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两只杯子,斟满酒。他啜饮了一口,说道:“是什么使丈夫开始怀疑妻子的?有些女人欺骗自己的丈夫好几年,除丈夫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显然,这些女人懂得怎样玩把戏,正如法国人说的,还要玩得‘很得体’。她们当然是这方面的专家。艾里舍娃倒不是那种人。我说这句话是抬举她了。”

“无论如何——”他深深吸一口气,又喝一口白兰地,接着说,“在天最热的时候,还记得7月底刮得很厉害的那场五旬风吧……”^①

对那些日子,我记得再清楚不过了。上午九点,我的警服就湿透了。这除了自然因素之外,还有人为的因素:第十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凉爽的湖畔通过决议之后,我们这里的阿拉伯兄弟激愤到了顶点。他们的领导人发表煽动性演说,煽动他们奋起反对政府、屠杀犹太人。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片刻都不敢休息。

“事情刚刚发生时,曾有人建议我们到黎巴嫩休假一两周,以躲避这里的炎热和混乱局势。”

“我们当时想,英国人会维持秩序……”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些在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服役的犹太人也没有想到,由于巴勒斯坦气候炎热,竟有这么多英国警察回到英伦三岛的草地上

休息去了。连英国的高级专员也同他们一起走了。我现在才明白,炎热的气候不是他们回国的惟一原因。

“我在雅法的几位朋友暗示我,”M 接着说,“要我最好离开办公室一两周,于是,我就雇了一个犹太司机……”

“司机叫什么名字?”在习惯的迫使下,我几乎是脱口就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立即意识到,没有必要调查这种问题。M 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的。经验还告诉我,他会讲实话的。

M 接着说:

“我一回到家,就向艾里舍娃发布了这样一个新闻:明天我们到舒夫山的一个旅馆去,坐在一个清澈山涧小溪上方的阳台上,去吃冰激凌,避开这里炎热的气候和动荡的政治局势。

“艾里舍娃听我这样一说,言行就立刻乖张起来。在这一段时间,她一直在舒拉密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听我说要租一辆车拉我们去黎巴嫩山区,她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就变白了。她大声说,学院翌日要举办音乐会,欢迎从国外来的一位重要客人。可是,我事前并没有听到举办这次音乐会的半点消息。

“我克制住自己,尽力使自己相信她说的话。但是,我却做不到。我心中疑窦横生。这使我身不由己地去调查她到底在搞什么鬼。第二天,她带着小提琴离开家,乘一辆马车,假装到学院去参加音乐会。这时,我跳上另一辆马车,让车夫尾随她而去。

“在格卢曾伯格大街拐弯处,她下了车,拐进波斯-哈绍埃瓦胡同。喜悦立即涌上我的心头:她确实是去音乐学院。但就在我要车夫送我回家的当儿,我发现她的行动诡秘。

“她东张西望,神情犹豫,好像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我下车跟踪她。她没有继续往学院方向走,而是走进波斯-哈绍埃瓦胡同里的一所住宅。”

“几号？”

“六号。她打开一层楼房的门，带着小提琴走进那里的一套房子。我绕到后院，发现这套房子后面的百叶窗仍关着。我悄悄走上前，通过一个窗缝往里偷看。几分钟后，有人敲门。艾里舍娃走到门口，问明来人是谁，就打开门，让他走进去……”

“扎哈利亚·犹林？”

M点点头，沉默不语。好像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谈下去。他又喝了一口白兰地，才继续说：

“我当即认出了他。从我站着的地方，我看不见屋里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在心灵深处，我为此而高兴。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因为窗子关着。我站在那里发呆。院子里长着很大一棵桉树，树的叶子和又小又尖的果实落在我的头上。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冲进去抓住他们。我不能那样做。我乘马车回家了。

“一小时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言行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显露出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她的衣服整洁，头发像通常那向后梳着，扎成小辫。我问她音乐会开得怎么样，她就描述节日般的盛况。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吼道：你在波斯－哈绍埃瓦胡同六号为那位重要客人演奏些什么？”

“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说：我没有给他演奏什么。他叫我去私下谈一下……谈一下我在拉小提琴方面的进步。你，你监视我！”

“我没有回答她。我只是说，我要去办公室。我乘一辆马车去雅法，去码头。也许你知道那里的仓库后边有间小屋，阿布－马赞的咖啡馆？”

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能凭想入非非才称得上是咖啡馆。那实际上是一个低矮、狭窄的黑洞，墙上都是油灯和蜡烛熏的黑烟。那些油灯和蜡烛想必从奥斯曼时代起就一直在那里

点燃着。顾客都是雅法港的码头工人，卖苦力的人。他们皱巴巴的裤子口袋总是湿漉漉的。他们的髭须上总是带着浪花。他们帮助船上的乘客上岸之后，总是坐着吸水烟，侃大山。在哈哈大笑声中，他们讲述如何将心惊胆战的犹太人从大船推上小船，他们竞相吹嘘各自用手掐和用身撞女人的次数以及她们受辱后嘴里发出多么尖厉的叫声。

“阿布－阿里是那里的常客。”我说。

如果说 M 闻此大吃一惊的话，他的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也许，他在全神贯注地讲他的故事，并没有注意到我说的话。他确实是在自言自语：“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人，有些我认识。他们一看见我就不说话了，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阿布－阿里总是坐在他通常坐的凳子上。我把他叫到一个角落里，给他半镑钱。只要今后几天他肯呆在我家附近的沃罗津大街一家妓院里，我家的男仆艾哈迈德进去一叫他就冲出来，我答应就给他更多的钱。阿布－阿里激动地接过我的钱，只是说，半镑钱连一天都不够花。我告诉他，我负责他的全部开销。我将把钱直接付给西科西科。西科西科就是你在赌场见到的同我在一起的那个阿拉伯人。”

我点点头。M 继续说：

“我并没有等多久。天一黑，她说要去见基布兹来的一位女友，就出去了。艾哈迈德叫来阿布－阿里。我让他快上出租汽车。我们尾随她去雅康大街，直到她停下来，转身走下海滩。她沿着海滩一直走到穆斯林公墓下边一个地方。她站在那里等人。我让这个黑人站在石灰石悬崖边上，指着艾里舍娃对他说，等待我打手势。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他做什么。对我来说，当时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对艾里舍娃的这种行动找到另外某种解释。而一看到他们两个人在石灰石悬崖脚下的海滩上

拥抱，我的心就像给撕碎了一样。我知道，在我的心灵深处，我依然非常爱她。

“我看见他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地向她走过去。他一走到她那儿，她就抓住他，拥抱他。她从来没有这样拥抱过我。她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不是亲吻就是在耳语。之后，他们相互拥抱，长时间地亲吻。他开始解开她的扣子。见此，热血涌上我的头。我向阿布－阿里吹口哨。这时，他的眼睛正盯着另一对情人，他们的举动显然已经超过了亲吻的程度。作为对我的回答，他哼了一声，随即跳到沙滩上。他把犹林像个口袋一样抛到一边，紧紧抓住艾里舍娃。‘逮住那个男的！’我冲阿布－阿里喊道。就在这时，我拽住这个黑人，叫他放开艾里舍娃，但犹林立即站起来逃走了。而艾里舍娃一挣脱，也就溜掉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你知道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艾里舍娃跑回基布兹。几天之后，她给我写信，请求我饶恕她。她还请求我将她的东西送到基布兹，告诉我她同意离婚，无需解决财产问题。”

“那后来呢？”我疑惑地问。

“我按她的要求办了。”

“那么犹林呢？”我几乎是喊道。

“他从此就不见了，好像大地把他吞噬了一样。我竭尽全力寻找他，当然是小心翼翼……显然，像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是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我四处散布流言说，他欠我的钱。我甚至作出承诺，无论谁帮我找到他，我就拿出他欠款的一部分作酬谢。”

“也许他离开了这个国家？”

“我认为没有。我花重金收买了一些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

他可能乘汽车跑到埃及或叙利亚去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得到消息的。”

“如果碰上他,”我有点过分狡黠地说,“你会怎么办?”

M 瞅了我好一会儿,深深地呷了一口白兰地,又奇怪地一笑。他说:“难道你还想给我使坏吗?”

我的脸红了。

“说实话,”M 说,“等我稍微平静下来之后,我不禁又想起海滩上那一幕,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真想问问他,他和艾里舍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假如他们的确是……但是,你肯定无意于探查我的心境。”

M 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我要探查的当然不是 M 心灵深处的活动。分析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我以往进行的调查活动中,我已经懂得如何揭示被调查者隐秘的愿望和焦虑。我在这方面的成功率并不亚于著名的法国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让-马丁·夏尔科及其维也纳的学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

我向 M 告辞。他说:“艾哈迈德为你准备的茶,你连一口还没有喝呢。”

“你也没有喝呀。”我回答说。于是,我们俩就将放凉的茶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

我走到漆黑的大街上。站在一个既能看到南边又能看到东边的地方。我在那一年第一次感悟到,在我心目中究竟什么是以色列的精粹。那就是橘花盛开的香味。一阵微风从东南方向吹来,带来橘林的花香。这花香也许来自萨罗纳的橘林,也许来自阿布卡比尔的橘林,也许同时来自这两片橘林,也许还来自沿海平原地带的橘林。

注释：

①犹太代办处是 1922 年由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确定建立的国际组织，负责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建立联系，以实现犹太人向历史家园移居。

②《一千零一夜》中记载有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流行的故事，特别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当政时期的故事。

③基布兹是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巴勒斯坦各地农村建立的集体村社。基布兹的成员完全平等，实行工作统一调度，各尽所能，生活物资每人一份，平均分配。

④从犹太树历七月十六日到九月六日的五十天称为“五旬节”。其间，热季风从南方刮来，天气干燥，风沙弥漫。人们称这种风为“五旬风”。此时，也是小麦等农作物相继成熟的季节，故《圣经》上也称五旬节为“收获节”。

四

第二天早晨,我烧了开水,冲了杯咖啡,就着一片面包干和一片脆饼喝下去。我在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纸,写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犹林是否活着,是否在国内。搞清这件事的惟一线索,据 M 讲,是找在 M 基布兹的艾里舍娃。

我在小手提箱里装好替换衣服,就走出门,去本-耶胡达大街。我从老远就看到,比亚利克站在公墓的大门口。我知道,他有时去那里,是为同那个做公墓看守人的犹太教法典学者消磨一天的时光。但是,施隆斯基集团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对他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施隆斯基集团亦称“凯图维姆”集团。《凯图维姆》是希伯来作家协会在 1926 年创办的文学期刊,但不久就被以现代派诗人亚伯拉罕·施隆斯基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接管。^①他们认为,比亚利克一方面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换句话说,是个有产者,甚至是个商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心不在焉的人,几乎天天办错事。他每天都去公墓。他岳母去世时,他在那里为自己买了一块墓地。他去那里是想看看那块地是否还在。

比亚利克总是被常见的那帮人包围着。他们之中有一个拓荒者,一个诗人,两三个特拉维夫的游手好闲者。^②这位民族诗人眼神很好。他一眼就看到我,从远方向我挥手。尽管我要乘

的火车在半小时左右就要发车,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朝他走去。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开始用意第绪语同我交谈:“那位犹太侦探怎么样了?”

“比亚利克竟在公共场合讲意第绪语!”一个年轻人突然跳起来,扯着嗓子喊道。

“在五旬节期间是允许讲意第绪语的。”比亚利克用阿拉姆语说。了解这位诗人的人都知道,他吃尽了本地五旬节期间热风的苦头。他不只一次地问我,这期间的热风是否要连续刮五十个白天和五十个夜晚。“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补充说,“这期间的天气,白天和夜晚哪个时候更糟糕。”

“不许比亚利克休息,也不许他睡觉。”那帮人中的一个说。他这是假装机智地在援引比亚利克那首著名的诗《一根树枝掉下来》之中的诗句。比亚利克神色严肃地看着他。

“明天会像火炉一样燃烧。”另外一个人说。

“我们不会在那个炉子里烤制面包。”比亚利克说。他擦掉脸上和秃头上的汗水,朝本-耶胡达大街方向走去。的确,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五旬风来临的迹象。这一点,我在夜间早已感受到了。但是,真正的春天的五旬风,特别是早春的五旬风,还是很惬意的。五旬风之说起源于埃及。那里的人把五旬风开始的第一天称作“闻风节”,举行特别的酒宴来庆祝。假如比亚利克不穿礼服,他也许会喜欢这种天气,至少不会感到难受。我告别诗人,跳上马车匆匆而去。

到达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阿福拉的火车票。阿福拉离艾里舍娃所在的基布兹并不远。火车一到站,我就登上一个车厢。车厢里的乘客大多是阿拉伯人,只有两个是犹太人。其中的一个犹太名叫A,在犹太国民基金会工作。^③我同他很熟悉。几年前,我在大约旦边境警察局工作,他刚从外地来到吉夫特里克,

想把犹太人定居点的边界向伯斯－谢恩山谷和谢赫－侯赛因桥方向扩展。对此，一些阿拉伯人很不高兴。他们同他发生冲突。是我把他从冲突中解救出来的。

我们相见之后互致问候。我眨巴着眼睛问他，他是否还在向学校的孩子们分发犹太国民基金会的募捐箱。“是的，”他说，“但不是收钱，而是发钱了。”他没有说下去，无疑是怕乘客中的阿拉伯人听到。

一听到“犹太国民基金会”这个词，另一个犹太乘客就跳了起来。这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留着长发，衣衫褴褛。他走到 A 面前，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犹太国民基金会只向一些著名诗人约稿，而这些诗人是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为什么不向那些正在挨饿的诗人约稿，只要基金会支付几镑稿费就能把他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对这些话，我感到迷惑不解，而 A 像是充分理解了。他回答说，他不是负责约稿的人。他看见我皱起眉头，就对我说，这些年来，犹太国民基金会在采用一些希伯来诗人的诗稿后，确实一直在支付稿酬。

火车站站长吹起哨子，挥动手中的绿色小旗。火车开始朝着利达车站方向缓缓向东驶去。

“施隆斯基和什莫诺维兹没有那笔稿费也能活下去。”年轻人激烈地争辩说。

在这里，我一字不改地引用了他的话，因为他是个诗人。他若一朝成名，他说的话也许会有出版商出版。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年轻人。

“雅科夫·本－拉菲尔。我是杰兹利尔山谷的开发人。我们的基布兹成员拒不承认写诗是创造性劳动，其重要性也许还不如挖土豆。”

“你们的基布兹叫什么名字？”我问道。他没有理会我，继续

同 A 高谈阔论：“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要他们给我时间进行创作，放弃种地。那样是天理不容的！我的要求只不过是，每当我感到诗神召唤时，我可以有几分钟时间，将诗句在纸上写下来。但是，那里的同事们却赶走了我的诗神！‘诗人，你可以在晚上写作。’他们总是这样轻蔑地对我说。他们不懂，灵感一过，万物皆无，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夜晚，面对一张纸，我可以坐上几个小时，即使我能想起一些词句，写一首诗，但那也算不上一首诗。你也不会理解我。只有相信灵感勃发的人才能够理解我……”说到这里，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他接着说：“他们迫使我别无选择，只有离开那个基布兹。现在，我是要回那儿去，取我留在那儿的一点东西。但是，我想，他们连两条裤子也不会让我拿走。我现在连买火车票的钱也没有。”他又小声说：“我希望能骗过乘务员。”

“你认识那个基布兹里一个叫艾里舍娃的女人吗？”我问道。

“当然认识，”他回答道，“艾里舍娃是拉小提琴的。她也离开了基布兹。当然，那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

他四处张望，想找到乘务员。可是，乘务员还没有上车。

“据我所知，她在特拉维夫。”

“在特拉维夫的什么地方？”

“我看你对她很感兴趣。”

“对我来说，同她取得联系至关重要。这完全是为了她。”

他惊奇地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就在这时，乘务员出现在车厢门口。“我给你买票，”我对这位诗人说，“但你要答应我，回城后，你去找艾里舍娃，把她介绍给我。”

“这是你付的媒婆费还是老鸨费？”他嬉皮笑脸地说着，显然很不高兴。这使我想到有关动物的一个谚语：你去喂它，它反倒

咬你的手。

“我并不是对她感兴趣，”我以冷峻的口气说着，把我的名片递给他，“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和她有染的男人。”

“如果你对他感兴趣，你就得去买一张去敖德萨的火车票。”

“扎哈利亚·犹林在苏联？”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犹林？”本－拉菲尔惊奇地重复道，“我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阿里耶·卢金。他率领我们基布兹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回俄罗斯去了。”

“什么时候？”

“大约两年之前。”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诗人盯了我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难道他就是她离开自己富有的丈夫而去追求的那个人？”

“正是此人。正是为了他，她才同丈夫离了婚，回到基布兹。”

“她在基布兹时间不长，”本－拉菲尔说，“一个月后，她又回到城里。”

“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必要去基布兹了。”我这样说，与其说是对他，还不如说是对自己。

“好一个精明的推论。”诗人说道，话语中也许隐含着一点讽刺的意味。

“有的基布兹成员肯定会知道她在城里的住址？”

“如果你仅仅为找她的住址而去基布兹，那你肯定会失望。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

“为什么没有人？我想帮她一把！”

“正是这样。”诗人说道。他觉察到我满脸狐疑的神色，又继续说：“不生活在基布兹的人都不会明白。”

我最后作出决定：“如果你帮我找到艾里舍娃……”

“我想你是在找犹林……”

“确实如此。如果你帮我找到他，你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乘务员隐隐约约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代诗人向他付了车票钱。

“谢谢你相助，”他说，“我用一个希伯来诗人的名义向你担保，这笔钱是会偿还给你的，给你的还有我所能找到的你正追踪的那个人的信息。这样做不是为了干掉他，我希望……”

“上天不容。没有人去损伤他头上的一根毛发。”

火车穿过雅祖尔柑橘林，向利达车站开去。柑橘花宜人的清香气通过车窗飘进车厢。犹地亚的群山越来越近，笼罩在山头的蓝色雾气正在消失，褐、黄、灰、绿诸色调的混合色开始出现。

“难道诗神不会乘这股熏风前来将你造访？”我问诗人，“假如我是诗人，我的笔早就会在纸上掠过，把这美不胜收的景色描绘。你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这样浓重的色彩和芳香吗？我当然也不会无视时间的跨度：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几千年来，许多不同民族的旅行者走过，一代又一代，从沿海平原去山地，都曾踏访过。”

“你希望在这方面也帮助我，我很感激，”诗人说道，话语中也许带点讽刺意味，“但是，不幸的是，你取代不了诗神的位子。”

谈话间，火车抵达利达，车轮旋转得越来越慢。掠过货场和停在岔道上的车厢和机车，车站映入眼帘。车站上人群熙熙攘攘，因为这个站是整个中东铁路的枢纽。这里有农民和来自城市的阿拉伯人，甚至还有一些贝都因人。在一个角落里，还有犹太人。他们之中，有拓荒的和经商的犹太人，也有来往于耶路撒冷的世俗的和信教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个地方可以

寄身，就有农家妇女和贝都因妇女蹲在地上，裸露着乳房给婴儿喂奶。在车站站长的办公室旁边，一些警察和持枪的士兵在站岗。但是，今天好像不会出什么事，使他们能摆脱寂寥。在这个美好的春日，看来并不会发生任何不愉快的、出人意料的事件。这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从来自不同部族和党派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到统治这块土地的英国人，都在散发着一种平静而安宁的气氛。而那些英国人，想必一定会感谢他们的幸运之星，因为它们是它们把她们从伦敦的浓雾和苏格兰的细雨中带到这个温暖而美丽的国家。

在我们站起身来下车时，我忍不住冲着这个年轻诗人挖苦道：“听人说，最伟大的诗篇是书写在辘辘饥肠上，不是吗？”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很显然，我戳到他的痛处。对说出这种讥讽之词，我立刻感到后悔起来。我掏出几个小钱对他说：“到小摊上买点吃的去吧。”

“我不是乞丐，”他说，“我宁可饿死，也决不接受别人的施舍。”

我们走下火车。A走过来向我告别。我祝愿他走好运。我说：“我希望，你这次不用打架就能收回土地。”

“我不会忘记那天在吉夫特里克你对我的帮助。”他回答道。

“你要对我那位年轻的朋友和诗人说些什么吗？”

“我将很高兴给他预支稿费，”他说着，递给本－拉菲尔一张面值一镑的纸币，“把诗写好后，就送到我们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然后去找克莱巴诺夫先生。克莱巴诺夫会支付其余的钱。”

“每首诗你付他多少钱？”我问道。

“四镑到六镑。”

“当一个希伯来诗人还真花得来，”我说，“即使一个技术高超的石匠，累死累活干一天，也赚不了五百密尔！按照那个开

价,一个月写两首诗就足以维持生计了!是否我自己也该练着写诗呢?”^④

“首先,”A说,“并不是每首诗都符合犹太国民基金会的要求,而我们的预算也是有限的。其次,假如我是你,我宁愿写回忆录。我敢肯定,回忆录读起来更令人着迷,使人受益。”

诗人拿起那一镑钱,但他脸上的痛苦表情依然未变,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悲痛都刻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他的诗神显然属于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诗神之列,只造访这个地球上的不幸者。

“很难说我写的诗一定符合你们的需要,”他说,“在我的一生中,从不遵命写作。我一直认为,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他说这话的时候,两眼黯然。这也许是因为他饥肠辘辘难捱。

“需要本是写诗的托辞。”我说。

“一个死去的诗人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A说。说完,他就向站台方向走去。这时,去南方的火车已经驶离站台。他那些从雅法来的随行人员还在站台上等着他。

这时,从耶路撒冷去雅法的火车进站了。我登上火车,返回特拉维夫。我毫不怀疑,本-拉菲尔讲的是真话。这倒并非因为他是个诗人。这些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作家和诗人都不是圣人,同其他人一样也会撒谎和骗人。只是他们有取信于凡夫俗子的“长处”。这样,造成的失望当然就会倍加痛苦和酸楚。但是,本-拉菲尔至今还没有变坏。我相信,他说话是算数的。

我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三点钟了。我的肚子在咕咕作响。我进了莫沙沃思广场一家价格便宜的餐馆,吃了一顿犹太饭:灌肠、肝片和鸡汤面。这么丰盛的一顿饭,只花了七个皮亚斯特。我觉得问题越来越清楚,犹林失踪的秘密比我想像的更为复杂。

我认为，N 预支给我的款项，使用的时间不会比我当初预想的更长。我很后悔，当初没有要求他把我在调查期间的花费报销掉。但是，这一切都是覆水难收了。

回到寓所，我产生了两种想法：要么去睡午觉，要么去海滩。我最后决定先去海滩。海水很平静，因为在五旬风期间，海水总是像大湖中的水一样蔚蓝和清澈。细波微浪拍打着白沙，就像嬉戏的儿童在玩耍。我自言自语道：本－霍林，你是个诗人！你一定会把你的诗作拿给犹太国民基金会办公室的克莱巴诺夫先生。可是，他们大概需要描写耕耘土地和沼泽地排水的诗歌，而不需要描写大海和沙滩的诗歌。

我穿上游泳衣，越过海滩，投入大海。这是我许多个月以来第一次下海。起初，我感到我的身体好像淹没在冰湖里。后来，我的四肢渐渐适应了寒冷的海水。我奋力向大海游去，一直游到同雅法岬角对面的地方。我在那里仰卧在水面上，我发现海水上层还有点暖和。我采用自由泳方式奋力游回岸边。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考虑是否有可能接触另外某个同犹林的名字有关的女人。最后，我决定还是等一等那位诗人。我希望他不会丢掉我的地址，希望他的诗神的双翼没有把他带到黎巴嫩山或者阿拉法特山去。

天擦黑的时候，N 来看望我。他穿着一件俄罗斯绣花衬衫，没有披他那件皮外衣。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他问。

“还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

“那有什么呢？”

“一点含糊不清的线索。”

“主要在哪方面？”

“我现在还不想说。”

“我现在倒想听一听。”

“也许，”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根据这么说。但是，也许犹林早已不在人世。”

“那是不可能的。我并没有对你说，无论犹林是死是活都要交给我。而是说，要把活的交给我。”

“如果这位先生已经入土或者下了地狱，还让我把他从那里弄回来吗？”

“在对付那个被认为已死的贝都因人时，你就是那么做的。”

我好像一下子得了法国人所说的“记忆幻觉症”：我几乎是确定无疑地感到，对这个失踪的人，N 了解的情况比他告诉我的要多得多。

“我建议，我们别再玩游戏，”我不紧不慢地说，“你还是把你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吧。”

但是，N 像个受审讯的嫌疑犯那样，并没有回答我。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打个比方说吧。我怀疑妻子对我不忠，她同某个男子有染，我来找你……”

“很简单，”我打断他说，“我将跟踪他们两人。几天之内，你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N 说，“那么，我们现在这样说，我感兴趣的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那个男子，而是那个男子的妻子。我需要她，而她却忠于她的丈夫，根本无意理会我的追求。”

“我不是为满足非分之想而拉皮条的那种人。”

“好，”N 郑重地说，“我来告诉你我想做什么：我要去找我属意的那个女人，悄悄告诉她，她丈夫同她的女友有染。作为证据，我会指着跟踪他的侦探，对她这样说：他是受她女友的丈夫雇用的。你明白吗？”

“如果那个女人追问下去,发现其中没有什么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那没有关系。这时,她心中早已生疑。如果我的把戏玩得好,她会像个熟透的果子掉进我的怀抱。你看,本-霍林,”他用很信任的语气对我说,“我们交给你的这项工作,我们自己的人本来可以做。但是,如果那样,人们也许就会说,他们偏袒这个人或那个人,代表他们行事。你很了解,在我们那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抱有政治派别之见。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在大的外部问题上,而是在一些小的内部问题上。这些问题不是不重要,也许很重要。为了绕开这潭浑水,我们才找到你。”

“那么,犹林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呢?”我当即问道。

但是,诱供 N 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

“这个问题,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少。”他故作无知地说。

“你简直是拖延调查,”我说,“也加大你们自己的开支……”

N 苦笑一下说道:“你错了,本-霍林。你不是索莱尔·伯内建筑公司的长期雇员,也不是犹太工人总工会劳工联合会的长期雇员。那些雇员可以将工作拖延一个月又一个月,而照样拿到薪水。你只是个私人合同工。正如你所知,那些人的合同中都有一小段话。这段话是:签约人完成任务用的时间越长,得到的报酬就越少。在某种情况下,延误了合同,他们还必须赔偿雇主的损失。”

他拍拍我的肩膀走了,这使我真想打他个嘴巴。

注释:

①亚伯拉罕·施隆斯基(1900—1973),杰出的希伯来诗人。生于乌克兰。他深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于 1922 年移居巴勒斯坦,先务农,后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

②“拓荒者”是指二十世纪初最早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移居到巴勒斯坦来拓荒的犹太人。

③犹太国民基金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 1901 年建立的在巴勒斯坦购置和管理土地的基金会。它设立了蓝白色彩的贮钱器，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捐款，用以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供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的犹太人使用。

④一千密尔等于一英镑。

五

傍晚,我决定去拜访米里亚姆,邀请她同我一起去看电影。米里亚姆早就是我的女朋友了。她希望进一步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却想使恋爱像文火那样慢慢燃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请她帮我布置新的住房和办公室。而这个疏忽很可能惹她生气了。由于忙于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她了。

米里亚姆在奈维-沙亚南地区的卢布里安斯基卷烟厂工作。她是一个热情而活泼的女人,满头乌发,面色黝黑。我还没有放弃同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性。这只能由时间来决定。

我步行去她在卡里舍大街的住处。我可以看出,她见到我时虽然假装生气,实际上却很高兴。我请求她原谅我。我告诉她,自开业以来,这还是我第一个空闲的夜晚。我邀请她去看电影,她很高兴。她建议去“伊甸园”影院。在那里,由巴勒斯坦歌剧院唱诗班伴唱,正在举办电影节。而现在正上演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又一个不忠贞妻子的故事。”我不假思索地说。说心里话,我本想放松一下,看看《人猿泰山》或巴克·琼斯的表演。但是,我想让米里亚姆高兴,也就同意了。“我们还有时间,先吃晚饭吧。”她说。她总是为我准备很多吃的。

她烧开水沏茶。我们边喝茶边吃黑面包和黄奶酪。之后,

她穿上她仅有的外套,我们去了“伊甸园”。我必须承认,在如此温暖的夜晚,坐在露天里,确实很舒服。而唱诗班的歌声像摇篮曲一样,使我在极度困倦中听起来极为开心。不一会儿,我就打起瞌睡来。歌声越来越大,我被吵醒。这时,我还以为安娜就是艾里舍娃。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米里亚姆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没有注意到我的表现。

电影结束,人们的掌声将我从睡眠蒙眬中唤醒。米里亚姆两眼泪汪汪的,脸上的泪痕犹在。我们默默而行。在赫兹尔大街拐弯处,我给她买了一杯苏打水和一个面包圈。从那里,我们转弯进入纳哈拉斯-宾亚敏。我问她是否愿意去看看我的新居。她热情地表示同意。

在新居的门口,我拥抱了她。我亲吻她,把她拽到卧室。而令我惊奇的是,米里亚姆从我的怀中挣脱,说有件要事相告。我想,刚看完电影,她说的要事可能指电影中那些罗曼蒂克的东西。也许,列文家婚姻生活中那些生动的田园画面使她感动。然而,恰恰相反,她开始热情地谈论起政治来。

米里亚姆向我讲述,她和她的工友们是如何阻止工头解雇一位女工。原来,一位女工得罪了老板,老板就把她解雇了。于是,她和工友们就威胁老板说,如果不让她复工,她们连一根香烟也不包装。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不开除那位女工,而是把她调到另一个部门。米里亚姆早就自视为争取女工和所有妇女权利的斗士。她问我知不知道当选人议会选举的情况。选举的准备工作刚刚开始。我知道,本-茨维、梅尤哈斯和所罗门征得英国高级专员的同意,已于2月15日签署了关于选举安排的备忘录。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毕竟,我之所以邀请米里亚姆一道去看电影,不是为了这件事。一个男人之所求,就是给予人和接受人一点点快慰。因此,人们不必向他打听公共事

务。正如最贤明的哲人所说,“万事有其时,万事当其时”。我就此巧妙地向她解释,而她却迷惑不解地盯着我。最后,在我发誓一定要投包括她的名字在内的名单一票之后,她才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此时,她比平时更多情。这不禁使我猜想,她的热情背后也许有政治。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生活,甚至在其最隐秘的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米里亚姆早已离家去工厂。我很感激她没有把我叫醒。我打开百叶窗和窗子,发现五旬风已经过去。那是一个真正的春日。在以往的岁月,这种日子总使我们的民族诗人感到赏心悦目,在他心中唤起复兴的希望。

我预感到某种神秘的兆头。自开始调查犹林失踪案以来,我一直在期待的某种事情,好像今天就要发生。但结果说明,那只是我的期待。天气的确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是,只要我们不做描写气候对白昼和夜晚之作用的诗人,天气对我们生命进程的影响就很小。

日子像嚼口香糖一样单调地过去。我毫无心绪去看米里亚姆。我怕她再同我谈论那些女工的权利和当选人议会的选举准备工作。我在城里的街道上漫步,考察诗人和作家们时常出入的地方,打探诗人雅科夫·本－拉菲尔的消息。但谁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两个人说,他的名字听起来倒熟悉,他也许是启蒙时代的作家吧。

第四天 我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我发现我寻访的诗人站在那儿。在我的印象中,他比我们在火车上见面时更加苍白,更加蓬头垢面。我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拿了点饮料。“你有什么吃的?”他问道。“饼干、薄脆饼、咖啡。”我说。“没有烈性的东

西？”他问道。我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瓶优质苏格兰威士忌，他的脸上放起光来。我给他倒了半杯，他一下子就喝光了。我不知道他是在 M 基布兹学会的喝酒，还是在特拉维夫居住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养成了这种波希米亚人的习惯。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薄饼，然后又喝了口咖啡。他说：“犹太国民基金会的官员拒绝接受我的诗稿。”

“哪个官员？”我问道，与其说是感到惊奇，不如说是好奇。

“某个叫科莱班斯基或巴尔班斯基的人。那里的每个房间里都坐着这样两个人。只有乌西斯金才知道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大概是在计算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每星期五投放在募捐箱里的那些小钱。”我说道，旨在使谈话继续下去。我真怕他的诗神突然降临，我不得不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你知道他们喜欢的那些诗，那些像妓女卖身挣钱一样的人写的诗！像施隆斯基及其‘凯图维姆’中的朋友们写的那种诗。他们用诗体词句写广告，从商人们那里得到优厚的报酬。比亚利克从不干这种事！菲赫曼和什莫诺维兹也不干这种事！而那帮人却依然敢……”

当时，我对希勒尔学派及沙马伊学派在犹太教经典解释上的争论感兴趣，对施隆斯基和比亚利克之间的争吵也同样感兴趣。^①“艾里舍娃怎么样了？”我打断他说，“你找到她了吗？”

“我找到她初冬时住过的房子，那是她刚从基布兹逃走后住的地方。但现在她不在那儿了。我向她的房东打听。房东是一对从也门来的老夫妇。他们讲起话来吵吵嚷嚷烦死人。他们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懂。但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我从他们那儿搞不到艾里舍娃的新住址。也许你会搞到。这是他们的地址。”

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边写着那两个也门人的

名字和住址。

“我想，若问你是否发现犹林的踪迹，看来也白搭。”

“我没有把握……”他有些犹豫地说，“但是，我想我也许已经找到。”

“在哪儿?!”我几乎要拥抱他。

“这儿，”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我相信，你会在这里找到你正在寻找的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犹林的住址写在一张这么大的纸上。我打开一看，不由喊道：“怎么是一首诗!”

“确实如此，”他说，“这是一首诗。在犹太国民基金会官员们眼里，也许不是。三天来，他们一直让我等着回答，而今天上午……”

我气愤地扑过去，抓住他。“你来这儿是想愚弄我吗?”

他生气地看了我一眼，向后倒退了几步。“当那个官员把诗还给我的时候，”他说话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声音，同我谈话好像是他最不想干的事情，“我仍记得，这首诗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那是我同艾里舍娃度过那个夜晚之后的次日，大约两个半月之前……我打算向你透露点秘密。我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纯粹是因为我在火车上一时软弱而答应了你。”

“比你的秘密更大的秘密，我都能严加保守，”我不耐烦地说，“如果你和艾里舍娃之间有什么事，你就放心好了。”

诗人的脸红了：“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诗人从不泄露一首诗产生的背景，除非通过诗的形式。”

我准备好接受他从口袋里再拿出一首诗。但是，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低声说：“那天晚上，我确实同她睡了。”

“我在听着呢。”

“即使我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愤然说道，“是个下流人，愿意把做爱的细节讲给朋友听，你也不会从我这儿听到什么。原因很简单，我当时给弄得酩酊大醉。”

我一言未发。过了一会儿，诗人又说话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我进入艾里舍娃的小房间时，她很悲观失望。她告诉我，她失业了，次日必须搬出这个房间，因为她没有钱付房租。她从丈夫那里逃走之后，基布兹成员们同她断绝了来往，她不得不回到城里。尽管我指责那些人无情无义，但她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这时，我建议喝点烈性的东西，因为房间里很冷。艾里舍娃没有反对。我去附近的咖啡馆，用我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瓶法国白兰地。我们俩喝起来，艾里舍娃让我拥抱她。她有好长时间没有同男人在一起了……”

说到这里，他沉默下来。

“当时，她同你谈到她生命中的那个男人，但你记不得了，是吗？”我说。

“很可能。”他说。

“那么，线索，伙计，找到犹林下落的线索在哪里呢？”

“我告诉你，在这里，在这首诗里。尽管当时喝醉了，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也许是因为它刺伤了我的心。在那个寒冷的夜晚，艾里舍娃不是同我，而是同他躺在一起。第二天，这首诗就写成了。我毫不怀疑，诗中包含着对我闪电般打击的一切，包含着几乎使我从酒中醒来的一切。为抵挡住这个打击，我不得不喝完那瓶酒。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你准确地理解其意，这首诗就会像一张地图一样，引导你找到他。你千万不要轻视一个诗人的直觉。”

我读这首诗。“但是，这首诗写的尽是树木和仙人掌啊。”我迷惑不解地说。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它符合以植树为己任的犹太国民基金会的要求,”他说,“但是,那个自满的官员……”

“不用理会那个自满的官员了。告诉我,哪个地方暗含着线索?”

“线索在诗的字里行间。”

我抓住他的胳膊,尽力克制自己。“请你同我一起读读这首诗,指出解开奥秘的线索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你看好不好?线索埋藏在一棵树下,还是挂在一棵仙人掌的刺上?”

他说话的声音颤抖起来:“你是要我解释一首我自己写的诗吗?!”他面带着一种奇怪而令人迷惑的微笑继续说:“侦探先生,你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审问我,包括拷打在内。但是,那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我对这首诗的理解,远不如你和其他读者。研究研究这首诗吧!向它敞开你的心扉吧!”

说完,他就走出房间。

我把这首诗稿展开在写字台上。我对着那短短的诗行冥思苦想,但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其意。

诗是这样写的:

仙人掌树

并非产于迦南,仙人掌来自墨西哥,
生长在大路两旁。

科尔特斯的骑兵曾从它旁边越过,^②
扬起阵阵沙尘奔赴疆场。

就像沙漠中出生的骆驼,
它把水分贮藏在叶片里,

然后退缩在针刺的保护下，
漂洋过海，走遍天涯。

来到橄榄、无花果和葡萄藤的国度，
来到水果累累挂满枝的国度。
看到这位不速之客，一些树木惊呆了。
怎么，它们想，荆棘又来把我们侵害？

昔日的荆棘，以其烈焰吞噬
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藤，
报复这些树木往昔对它的荣耀的践踏，
它们那时竟不屑于寄身在它的庇荫之下。

只有无花果树像古时的夏娃，
看到仙人掌的内心和外表并非一样，
认为入侵者带来的也许不是火焰，
而是会倾注给她的甜蜜和柔情
发自一个寻求拯救与变革的灵魂。

就像那个神话故事中的妖怪，
经人一吻就从野兽变成人身，
变成一个形俊心美的青年；
她吻过他的尖刺，使他完好如初，
他们之间还爆发过一场热烈而纯真的爱情。

“勇敢而有力，温柔而甜蜜，
快来刺穿我吧，”她神魂颠倒，轻声叹息。
“那时，我的汁液将从内心喷涌而出，
将向你喃喃低语：杜木兹，杜木兹。”

读完这首诗，有一件事我立刻就明白了：犹太国民基金会的官员为什么不想购买这首诗。他们也许不知道，诗人写出这首诗是由于同艾里舍娃过夜而产生的灵感。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征集诗歌显然是为孩子们着想。在孩子们向蓝色的募捐箱投币口投放钱币时，那些诗可以谱上曲，高声而热烈地唱诵。而就这首诗来说，即使某些段落很适合配曲，即使孩子们会热情地唱诵，而对他们的老师来说，听到某些词句出自学生之口，他们肯定会感到异常震惊。

当时，我所关心的不是希伯来儿童。我早就听他们唱过比这更加露骨的淫猥歌曲。如果这首诗中确实隐含着犹林形迹的线索，我是相信诗人的直觉的，那么，线索又藏在哪儿呢？

我喝了一杯浓咖啡，又回过头来看这首诗。我天真地认为，寻求犹林去处或命运的线索，想必包含在我记得的语法课本上的专有名词里，首先是包含在在我来看对这首诗是无关宏旨的那些专有名词中。

愤怒涌上我的心头。难道诗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呢？假如他在我身边，我会运用美国人所说的“逼供”的方法审讯他，迫使他供出由于某种原因而一直藏匿在心中的秘密。但是，我立刻想起在安息日集会上听到的一次讲座。这种集会总是由比亚利克主持，每周六的下午举行。那次演讲的是希伯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讲的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当他讲到一些诗人不知自己所写为何时，场上人群骚动。“那怎么可能呢？”听众中的一个人提出疑问说，“你当真认为诗人都是无知的白痴吗？”

这时，所有眼睛都注视着比亚利克。他像往常一样坐在讲台上。演讲者说：“你们面前就有个诗人，不是普通的诗人，而是个大诗人。毫无疑问，他对这种事知道得比我多。”我说不准他

讲这番话是否运用了委婉的反讽语调。反正他以前发现过，苏格拉底在同法官的对话中曾运用过这种语调。比亚利克显然感到，他应当向听众作出回答。他总是对演讲者的话语作出机智的评论，深令听众高兴。他首先评论说，《圣经》中的先知也不都明白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因为他们向人们传达的话，都是上帝塞到他们嘴里去的。他这话一说完，就从大厅后边传来一声高喊：“比亚利克先生，你真的也自视为先知吗？”我没有看清提问者的面孔。但是，我猜测，他肯定是“凯图维姆”集团的成员。大厅里的骚动愈演愈烈。大部分听众都想使提问者住嘴，有一两个人甚至想把他抛出大厅。

“我们大家都知道，圣殿被毁后，预言的才能被赋予谁了。”^③那个人叫道，有点不服气，也许有点歉意。显然，他不断发表充满感情色彩的言词，实际上是想为这位诗人辩护。他叫喊的目的，不过是要人们听到他的看法。他认为，为比亚利克赢得不朽者地位的，不是他那些“民族的”诗歌，而是那些“个人的”诗歌。听众逐渐平静下来。他们普遍希望比亚利克发表讲话，就已经提出的问题，就诗人作为先知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是，他谈的却是一些批评家们对其诗作提出的一些假设。对那些想根据诗作为他作传的人，他在讲话时着重进行了挖苦，态度当然是温文尔雅、充满善意的。“早在中世纪，据说一首诗的精华部分就是造假的部分，或者说是撒谎的部分。”他面带微笑结束了他的讲话。

我还感到不明白的是，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或者说，他是否在为天真的听众设下陷阱。这时，有一位刚刚在德国结束学业的教师插话说：早在《我凭赌注没有取胜》一诗中，比亚利克就指出，诗人写的诗，在读者脑海里会再创作。由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脑海，每个读者都会为自己构思这首诗，都会根据自

己的特点和爱好对这首诗作出解释。这在外文中称为诗的“再创作”。这些话在听众中再次引起激愤。“换句话说，”有个人气愤地说，“难道克劳兹内尔教授写的所有作品都只是胡扯，没有任何用处？”^①比亚利克笑了。“所有那些有见地的文章和长篇诗评又怎么样呢？”另一个人喊道，“如果每个门外汉都任意对一首诗进行解释，那又会怎么样？那我们不就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一时间，气氛又相对平静下来。一个“凯图维姆”集团的成员乘机起哄，从门口那儿喊起来：“《我凭赌注没有取胜》那首诗，暴露了这位民族诗人的真面目！且看，他在诗中是如何向读者说话的！”

“对！”另一个声音从大厅的另一边附和道，“他把读者描写成小偷，专从他那儿偷窃诗人的财富！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典型表现！”

我认识这个讲话人。他不是“凯图维姆”集团的成员，而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这时，有人开始唱歌，庆祝安息日结束。比亚利克也唱起来，全体听众都跟着唱起来。

我重新审视这首诗，努力在我心灵深处“重新构思”这首诗。然而，在我仔细研读时，很快发现这里不仅没有结构，而且词句和字母本身在我眼前都是七零八落。于是，我决定将本－拉菲尔这篇“杰作”暂时搁置在一边，通过现实生活而不是艺术去寻访犹林。换句话说，去寻找艾里舍娃现在的居住地。

从事物的表面看，这不应该是太困难的事情。毕竟，特拉维夫不是像伦敦或柏林那样的大都会。在那些大地方，一个人消失在千百万人中，要找到他不啻是大海捞针。可是，令人尴尬的是，我竟找不到艾里舍娃的任何行踪。许多人都记得，她是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无论婚前还是婚后都拉小提琴。但是，没有任何

人知道她住在哪里，好像地球张开嘴巴已把她吞噬掉一样。我找到了本－拉菲尔拜访过她的地方。那是也门人居住区尽头的一间破烂房子。房东夫妇坦率地告诉我，因为她几个月不付房租，他们就想赶走她。此时，天下雨了，他们又同情她，又同意让她留下来，到雨停了再走。岂料，她竟背着他们偷偷走了，失踪了。“失踪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失踪了，”女房东用也门人唱歌一般的大嗓门说，“一天夜里，来了个男人。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

我从房东夫妇说话的口气判断，即使她付了房租，他们也会把她赶出门，使她再也看不到钉着羊皮圣卷的门柱。通过简单的询问，我还得知，正当他们准备拍卖她留下的几件东西时，一个男子前来认领，说是她派他来的。“他就是那天晚上来看她的那个男人吗？”我问道。“不是，”男房东说，“完全是另一个人，从穿着看像个法国人。”

“我对那个男子说，如果是她派你来的，”女房东插嘴说，“你先把她欠我们的房租付了，再把她留下的破烂货拿走。”

我问他们，她是否把小提琴同其他东西一起留下。男房东坚决否认，而他的妻子则尖声尖气地附和他。我不完全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询问下去了。

“一无所有，本－霍林，你必须回过头来再看看那首诗。”我自言自语。

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一个人病了找谁？找医生。一个人要打官司去找谁？找律师。那么，我该怎么办？只有拿这首诗去找人们所说的专家去解读。说实话，我很难同意人们在那天安息日集会上说的话，什么所有评论诗歌的文章、声明和书籍的作者都是骗子，什么他们发表的那些既有见地又有激情的言论

都不过是无稽之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用教鞭和考试强迫儿童阅读这些文章的老师,简直就是在搞乱他们年轻的心灵,给他们灌输乌七八糟的废话!作出这种判断的可能性太荒诞,太不可思议。想到这些,我不由松了一口气。我决定去雅夫内大街,在那里至少可以找到一位文学批评家。

布伦纳大街上熙熙攘攘尽是失业者。他们在赶往设在布伦纳大厦的犹太工人总工会办公室。在重新就业之前,他们在那里可以赊账喝到汤,吃到土豆。他们之中的家长,甚至可以领到相当两天工资的钱,每周四十个皮亚斯特。靠劳工联盟的这点接济,他们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苟延残喘。我转过脸,走进阿尔特舒勒餐馆,叫了一份足以供国王享用的饭菜:一点精肉,还有面条、米饭和豆蓉汤。那里的厨师最善于烹制这些食品。同这些食品一块下肚的,还有一瓶红葡萄酒。最后,我吃了一份冰激凌,抽了一支“选手牌”香烟。我付了十一个格鲁什,就去格丹斯基咖啡店。^⑤虽然这家咖啡店最近在赫兹尔大街起始的地方开了一个现代化的分店,作家们还是喜欢他们的老去处。

的确如此。就在这家老咖啡店附近,我遇见了G。他是教师和文学批评家。他光秃的头顶在很长的头发中间闪耀,无睫毛的眼睛隐藏在边框很厚的眼镜后面。他的衣着很随便,就像巴黎蒙马特高地上那些画家们的穿戴一样。我向他打招呼,而他好像是要回避。也许这只是我的猜想。我问他,我能否邀请他和我一起喝杯咖啡。他盯着我,用的是怀疑的眼光,或者说是忧虑的眼光,好像我是叫他去犯罪。最后,他不情愿地说:“我可以同你去喝,但是不是在这儿,不是喝咖啡,而是喝茶。”于是,我们沿着蒙蒂菲奥尔大街向前走去。直到走到犹太大教堂对面,G才不再回过头去往后溜着看。

我们走进拐弯处的一家咖啡店。我为他叫了一杯茶和一份

苹果馅饼。为了化解他脸上冰冷的表情,我开始谈论文学上的问题。他默默地喝着茶,突然冲我叫道:“你是在审问我吗,本—霍林?”我忍俊不禁,大笑起来。显然,G只知道阅读报纸的文学版,也许是只阅读他自己的文章,竟然不知道我早已脱离警察部队。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有什么事见不得阳光和法律呢?

“上天不容,”我说,“我——我们只是想请你帮忙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

“我暂时还不便透露什么,只能这样说:我手头有一首诗,其中也许包含着解答某个疑案的线索。如果你愿意把它读一下,把你的看法告诉我,我将十分感激。”

G用叉子切下一块糕点,用手指送到嘴里。他的眼睛睁开了,但眼神中依然含有某种怀疑情绪。“许多大作家——”他开始给我上课,好像我就是他的班里的一个小学生。这是典型的教师作风。对一个教师来说,即使你在午夜把他叫醒,他也会马上给你讲课,好像他始终站在讲台上,尽力教育听众。“许多大作家都写过犯罪案件。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小说《罪与罚》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个杀人犯。他这部书的相当一部分章节是描写警察调查杀人案和大侦探彼得罗维奇的性格。你知道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吧?他写过一篇小说,叫《芸香停尸房里的谋杀案》。人们认为这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侦探小说。你肯定知道,他的著名诗篇《抢劫》,已被泽伊夫·雅博廷斯基译成漂亮的希伯来文……遗憾的是,他将大部分精力用到政治上了。”说到这里,他以锋利的目光盯着我。“难道这首诗也同犯罪事件有关吗?或者同政治事务有关?”G广博的学识当然使我受益匪浅。但他说这么多话,也是想弄清我要他谈这首诗的动机

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人犯罪。”

“这首诗是谁写的？”他冲着我问，一些糕点屑从牙缝里喷出来。

“我恐怕不能告诉你。”

“我不想对匿名诗进行分析。”他傲慢地说。但是，很明显，他随即就感到他这样说太过分。因此，他又带着歉意的微笑说：“如果你知道父亲是谁，你就会发现，要了解儿子更容易一些。”

“我请你做的，只不过是给我分析一下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我说，“这只限于我们俩知道。你看到了吧，我既没有带笔也没有带纸来。”

“那么，这首诗是怎么落到你手里的？”他又询问道。

“这暂时也是个秘密。”

我看到，G 在自我挣扎。于是，我就安慰他说：“谁都知道，你是位诗歌专家。而对我来说，这首诗简直是个谜。”

“那想必符合施隆斯基的风格，”他冷峻地说，“混乱不堪，文字横飞，莫名其妙……”

“就是这首诗。”我说着，将诗稿摆在他的面前。

G 打开稿纸，用两眼盯着，目光中是怀疑，甚至是仇恨的神色。“我可以再来一杯茶吗？”他问道。我走到柜台那边，为他又要了一杯茶，为自己要了一杯法国葡萄酒。待我回到桌旁，我发现 G 的脸上流溢着自得与自满的红光。他把眼镜往上一推，推到前额中间。他边喝茶边咂嘴，头探在诗稿上。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整首诗像白昼一样清楚。这是一首民族诗，以著名的风格写成。虽然比通常的诗有点猥亵，但运用色情写法也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

“我知道。”我说。

“这首诗描写的是，这个民族诗人返回故土以及这个民族同新旧祖国土地之间的关系，”他继续流利地向我讲述着，好像他在口授一篇课文，在构思一篇文章，“并非产于迦南，仙人掌——我们美丽多刺的仙人掌，尽管本来生长在以色列，却在犹太人散居的土地上扎了根。”

“但为什么说产于墨西哥？”

他把眼镜又拉回到鼻梁上，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如果我是他的学生，他无疑会将我赶到室外，或者，至少要罚我站在角落里，责令我写一篇文章，内容是：为什么学生不能打断老师的讲话。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讲解道：“因为仙人掌是一种原产于墨西哥的植物。诗人使用隐喻，他一定得忠实于它的内涵。如果说比亚利克在他的诗作《孤独》中描写的小鹅仔和它的妈妈，本意指的是以色列人和圣灵，那么，这首诗里的仙人掌，就像比亚利克的小鹅仔，代表的是以色列。”

“我懂了。”我说。

“很好。科尔特斯和他奔向沙场的骑兵，当然是象征宗教法庭和圣战，换句话说，象征基督教世界谋求摧毁仙人掌，而诗中的沙漠就是犹太人散居地的沙漠。我想你读过比亚利克的《沙漠中的死人》这首诗。他描写仙人掌从敌对世界撤退出来，依靠古时候储存的营养而生存。你从仙人掌的形象中可以发现那首诗的痕迹。”

“就这样，这个民族来到它的土地……”

“这个民族来到它的土地，这就是这首诗的核心，这首诗提出一个大问题：这个民族能否夺回两千年以前抛弃的土地。为了审视这个问题，作者——难道你不想改变主意，告诉我他是谁吗？或者，至少给我的杯子里倒一点法国葡萄酒好不好？”

“很乐意。”我说。我去拿来酒瓶，给他杯子里倒了一点酒。

他呷了一口说：“作者用的是《旧约：士师记》中的约泰姆寓言，你可能熟悉。”

“我的确熟悉。”我说。

G接着说：“有些人不知道怎么保卫这块土地，抛弃了这块土地，使这块土地沦为可怕的沙漠和荒蛮之地。为了表达这块土地对这些人的不信任，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树木担心，如果同这个民族续签协定，把自己引向荒废……”

我有点迷惑，理解不了最后一句话的逻辑性。莫非是法国葡萄酒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

“那么，无花果树怎么解释？”我问道。

“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土及其同以色列人民密切关系的真正代表。正如《圣经》所说：‘无花果树一长出绿叶，我们的土地上就听到斑鸠的叫声。’斑鸠当然是暗指以色列甜蜜的赞美诗作者大卫王。大卫王征服了从哈马斯到阿拉拉海的以色列土地！”G越讲越激动。我真担心，在没有喝完这瓶酒之前，他可能会这样一直激动下去。

“那么，这首诗的结论是什么呢？”我打断他的话说。

这次，他没有用眼睛盯着我。“这首诗的结尾无比巧妙。民族同它的土地联结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从此，大地向耕耘者、播种者和栽培者敞开怀抱，生产成百倍增加。”

“那么最后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杜木兹，杜木兹？”

“如果我知道这位诗人是谁，他的出生地的景色，影响他的人物、时间和方式，我就一定能回答你的问题。”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露出胜利者的微笑。“现在，我已做了任何其他文学批评家都做不到的事。如果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疑案，”他边说话边轻轻地打嗝儿，“难道你不感恩知报，到我们班上来，把此事告诉我的学生……让那些小家伙们知道文学也有重要的用途……”突

然,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急忙补充说:“且不要把这首诗带去!泛泛而谈就行了。”

“我再把这首诗琢磨琢磨。”我谢过他,带上诗,回寓所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我感觉到新的五旬风又要来到以色列。我走出家门。海水像天鹅绒般的平坦,上空飘浮着羽毛般的云朵,薄薄的像肚皮舞演员的面纱。我将鲜美的干燥空气吸到体内,同时,也将柑橘盛开的花香吸进来。这在我身上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它使我感到愉悦;另一方面,它在我体内打开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又必须填满。今晚看来是没法工作了。

我向米里亚姆的住处走去。我漫步在纳哈拉特-本亚明大街上。大街左右两旁的房屋是东西方兼容式建筑。显然,当年的建筑师们没能在东方和西方两种建筑风格之间作出选择,于是就将两种风格结合起来。结果是,房屋都用瓷瓦装饰,而瓷瓦是由贝扎莱尔派的艺术家用烧制的。在哈绍梅尔大街对面那所房子的四周,骆驼商队看上去好像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房顶的蓝瓦和黄瓦上。那些骆驼看上去好像在穿过无边无际的沙漠。

走近格鲁赞伯格大街时,诗人 AP 隐约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像通常一样,穿着黑色的俄罗斯衬衫,漂亮而挺实,像座希腊神像。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用他那俄国腔大声说:“现在,我们的警官好像在用诗歌抓罪犯?你会问,我怎么知道这个?法国葡萄酒一下肚,秘密就泄露出来了!你找谁去讨情报?找那个爱唠叨的小学校长 G?把那首诗交给我,本-霍林。只要交给我,你就会听到郑重的回答!”他说话像咆哮一样。我在这里逐字引用了他的话,包括错误的地方。

为什么不可以给他看看呢？我问自己。也许，诗人确实是最懂诗的人，如果说懂的不是他自己的诗，就是他同行的诗。这正如裁缝。一个裁缝对其他裁缝做的衣服，比普通人更识货。一个裁缝只需瞥一眼你穿的衣服，他就知道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值多少钱，是由名师还是庸匠剪裁和缝制的。AP也是个很特殊的人。在我们的文学圈中，他不属于任何相互敌对的集团。他不仅是女人们的宠儿，也是比亚利克和施隆斯基这两个人的宠儿。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着的诗稿。AP并没有从我手中接过去，而是冲我吼道：“我难道就不该喝点伏特加吗？”于是，我们走进沙巴兹大街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但是，那里既没有伏特加酒，也没有红葡萄酒。AP只好喝了满满一杯亚力酒。这种酒闻起来像阿拉伯城镇的气味。

他急匆匆把这首诗浏览了一遍说：“那么，G对你胡说了些什么？我猜测，他会说这是一首民族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诗，民族返回大地，等等。像比亚利克门徒中的所有门徒一样，你可立刻将这首诗卖给犹太国民基金会。但需稍加改动，不要吓着那些处女秘书们。”

“那么，你到底认为这首诗怎么样？”

“像一锅荞麦粥。他从这里拿一点，从那里拿一点，也从我这儿拿一点，然后就开始煮——你说怎么样？——煮成一锅粥，一半是政治诗，一半是爱情诗。也许你在几个月前读过我在《凯图维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同诗歌分开，天哪，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问道。

“会发生什么事？”他叫道，“会发生像我写的那种事：作家将通过诗歌和小说从事政治活动。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见到

眼前这首诗。不然,我是会把它当作很好的例证的。说得太容易了,只用几滴墨水,就能化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历史冲突!真是个……白痴!”

“你看出这里说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我反问道,语气中充满惊讶,也许是某种希冀。

“呵,当然……犹太人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阿拉伯人反抗,害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手拿地契而来的,地契就是《圣经》。”

“那么,无花果树呢?”

“呵,像我说的一样,无花果树属于第二个因素,性爱因素。民族与土地之间的罗曼史。‘在我熔化在你双臂的拥抱之中时/你不要从沉重的罪恶感中退缩。’我是这样写的。而在他笔下,熔化的却是祖国,”他说话的语调缓和下来,“如果我们撇开政治含义不说,诗的结尾还是不坏的。还含有某些真理……也许这个家伙是在做爱之后写的诗。或者,像人们用经典的希伯来语所说的那样,是在‘享受爱情之后’。对犹太人以外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感到羞耻——你上床,你给女人欢乐,也给自己欢乐——就这样直接写好了,不必兜圈子……而对希伯来诗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样写太粗俗。因此,他们爬到树上,爬到带刺的仙人掌上,把政治带到床上。”

我一时语塞。AP的直觉,一个诗人和情人的直觉,没有使他受骗上当。一时间,我甚至想带他同本-拉菲尔面对面去对质。但转面一想,我感到,这只能以一场丑闻而告终。甚至会打起来。AP来到这个国家之前,毕竟是当过拳击手的。这时,他喝着亚力酒,继续研读那首诗。“果汁,”他突然情绪激昂地说,“不坏,一点儿也不坏……不要卢日班恩科卖的半个皮亚斯特一杯的果汁。”拿到果汁,他又仔细研读那首诗。“诗的结尾怎么这

样写？”他问，“希伯来文字中有‘杜木兹’这样的字吗？”

“你是知道的，”我回答说，“‘杜’的意思是二……”

“那么，‘木兹’的意思呢？”他又问。

“意思是香蕉。”我说。

“香蕉？你说是香蕉？”他惊异地盯着我。他的脸上慢慢展现出笑容，最后“噗哧”一声大笑起来。

“该是埃利泽·本－耶胡达新造的字，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是从阿拉伯文造出来的。”^⑥

“香蕉，”他吼道，“并且不是一只香蕉。是两只香蕉。”他用激动的声调朗读起这首诗的结尾：“‘那时，我的汁液将从内心喷涌而出，将向你喃喃低语：杜木兹，杜木兹。’两个香蕉，两个香蕉！他以她的名义在讲话，他在女人内心深处讲话！”

我难以说清事情的原委，但我感觉到，AP已经发现一个重要之点，而我已经从他说的话中领悟到某种东西。但我还不知道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向他告辞，决定把这首诗拿给米里亚姆看。如果这首诗确实是发自一个女人内心最深处的声音——AP在这件事上是可以信赖的——也许我的朋友凭她女性的直觉，就能发现我用男性的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

注释：

①希勒尔(约公元前70—公元10)，生于巴比伦境内，后到耶路撒冷学习，着重研究犹太教口传律法，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他创立的希勒尔学派主张灵活解释犹太教经典。约于公元前30年，他被选为犹太教公会两议长之一，与另一位议长沙马伊共同主持公会的活动。沙马伊(约公元前50—公元30)，生于巴勒斯坦，自幼钻研《圣经》，后成为这方面的著名学者。他创立的沙马伊学派主张严格按照词义解释犹太教经典。这两派在解释经典上的分歧和争执促进了犹太教口传法规的研究。

②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

③圣殿是犹太人崇拜上帝的中心场所,也是民族的象征。犹太民族历史上前后有两座圣殿,均被异族焚毁。一些犹太人认为,圣殿被毁,常人受辱,预言的才能就只能属于傻瓜了。

④约瑟夫·格达里亚·克劳兹内尔(1874—1958),希伯来语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以色列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⑤一百个格鲁什等于一镑。

⑥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恢复和发展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日常口语的积极倡导者,被称为“现代希伯来语之父”。

六

我发现米里亚姆政治热情高涨。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她的工友中又有一些人加入她发起的运动。她甚至还收到来自其他工厂的一些申请。自打我进入她的房间，除了飞快地吻了一下之外，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谈论的尽是工时、工资和失业问题。我问她，我们是否没有足够的劳工积极分子、劳工组织者以及专门照顾失业者的官员。“我们有很多那样的人，”她反驳说，“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凭自己的双手在装配线和建设工地工作呢？就拿果尔达·梅耶森来说吧。^①她在黑暗而又令人窒息的工厂里工作过一天吗？本－古里安又怎么样呢？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他在葡萄酒厂工作过一阵。从此之后，弄脏他白嫩双手的惟一东西就是墨水。我还能给你举出许多人的名字来。这些人的工资有保障，还经常到国外参加各种会议。”说到这里，她向我伸出她的手：“而这些手，你知道……我缺少的是教育！我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希望你帮助我。”

“我一定尽力。”我说。

“好极了！这正是我要爱的人！”她说着热情地吻我。然后，她打开柜橱门，拿出一包印刷品，其中有些我是熟悉的。印刷这些东西的都是左翼政党：左翼锡安工人党、包罗霍夫工人党、青年卫士运动和无产阶级党。^②“也许你能给我说清这些政党之间

的区别？”她问道。

“它们都是左翼政党，”我说，“其中有些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些是半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些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你认为搞清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那你为什么不读一读它们写的小册子呢？至少可以读一读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些。”

“但是，我简直读不懂那些小册子。里边所有那些很长的外国字……我连小学最后一年都没有读完，我十四岁时不得不去工作，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运动领导人教给我的是不同的东西。”

我独自思忖，她这样说看来是要我帮她弥补过去的损失。“如果你真诚对待我的话，”她说，“你就必须同我一起承担起我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责任。”她拉起我的手，使劲拽我，直到我们俩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我必须在当选人议会选举之前作出决定，要参加哪个党。”

“可是，离选举还有几个月，也许还有整整一年时间呀！”我喊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用冷淡的语调说，从我身边缩了回去。

“日程上还有更紧急的事情……”

“比如说，和你一起上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我脑子里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在说话，而你却连听都不听！”

“我也有重要和紧急的事情要对你讲。”我说。

“同你谈话就像对牛弹琴，一头死牛！”

“我脑子里装的，纯粹是一些精神的东西。我这里有一首诗，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我把那首诗递给她。她读了一行又一行，脸颊渐渐涨得通红。“你把这玩艺儿叫做诗？简直是一堆垃圾！我……我……”

我想她指的是诗里写性爱的那部分。只见她用力猛地把头发往后一撩，接着说：“一个没有社会意识的诗人，一个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可怕世界熟视无睹的诗人，一个对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剥削的人无动于衷的诗人。这种人对妇女遭受的苦痛漠不关心，不知她们为挣一片面包来养活孩子而被迫卖身。这种人对童工遭受的沉重苦难充耳不闻，不知他们在煤矿干活只能使一些人致富，而这些富人生活的惟一考虑，就是用工人们以汗水和痛苦挣来的许多钱来换取什么样的享受……”米里亚姆深深吸了一口气，慨叹道：“令人作呕，简直令人作呕！”

“可是，这首诗也许却充满社会的和民族的内容？也许它表现了以色列人民同以色列土地之间的关系？也许它是一首充满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诗？”

“犹太复国主义，”她咕哝道，“我为什么要做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的家已经有七代人生活在这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最早来到这里。只有他知道赫茨尔多少岁开始留胡子。^③最近，我发觉我自己越来越同意这里边所写的东西。”她指着一本名为《前进》的意第绪文小册子说。

“你认识意第绪文？”

“莱伯勒为我翻译的。”

“莱伯勒是谁，我可以问一下吗？”

“制鞋厂的一个工人，就在隔壁的大院里。午餐休息时我们在一起。”

“那是共产党——巴勒斯坦共产主义派的机关报。”

“我知道。如果他们参加选举，他们就会自称‘无产阶级派’。莱伯勒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因此,我痛心地注意到,现在我要和这个莱伯勒竞争了。

“不久,你就会说我剥削你的。”

米里亚姆没有回答。也许就是从这时起,我无意识地、不情愿地开始允许自己去做我后来要做的事情。也就在这时,我拿起这些传单和小册子,砰的一声关上门,走到大街上。

夜晚,五旬风渐渐刮起来。我知道,我不能独自呆在家里。我本来是喜欢同那些开拓者们一起跳霍拉舞的。但是,留在特拉维夫的那些开拓者,近来都不怎么跳了。只有在假日或特别的场合,他们才有兴致蹦跶蹦跶。在其他的夜晚,他们喜欢坐在各种俱乐部里喝茶;如果有人给他们开后门,他们也许去剧场;如果累死累活干完一天活后还有劲儿,他们也许去做爱。

今天晚上,赌场南边的海滩上尽是拥抱在一起的一对对情人。他们也许是些失业者。我把那些政治文件放在办公室,走到雅康大街上,沿街闲逛。我边走边努力调整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做,正如我的侦察部上司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压住“那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假设我写诗,我会把它比作在活动镜子中可以瞥得见、抓不着的一个彩色光点。当然,一个真正的诗人肯定还会找到比过去更确切的比喻。

走到博格拉肖夫大街的拐弯处,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去拜访女诗人雷切尔,让她看看这首诗。^④但是,我立刻又恢复了理智。这位卧病的女诗人,是喜欢接待来访者的。人们总是把她的声音比作柳林中沙沙低语的风声。但是,她现在身体虚弱,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躺在床上。人们说,任何刺激都容易对她有病的肺脏产生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我还不知道在她那里会遇上什么人。我们所有的劳工领袖都喜欢顺道去看望她。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 N 委托我承担

的这项调查的幕后人物。又走过三四栋房子之后,我改变主意,决定去女诗人 A 那儿。她不属于任何集团或政党,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我第一次遇见 A 大约是在九个月之前。她和几个诗人一起坐在拉兹基咖啡馆,讨论诗人们写作时的精神状态。说实话,当得知他们这些诗人只使用普通的日常词汇,而不用诸如“灵感”或“诗神”等大词,我简直吓了一跳。他们之中一个人说,德国诗人席勒总是把一个烂苹果放在他的桌子抽屉里,下笔之前总是先闻闻它。A 听这样一说就板起面孔。“放一个苹果,我理解,但为什么放个烂苹果呢?”她一边发问,一边将她那金色发辫向后再一甩。这个动作使我心旷神怡。

“我要送给你一个新鲜的红苹果,刚从果园里摘下来的,”我欲笑非笑着说,“我希望它给你带来灵感。”A 闪烁着一双碧眼对我说:“如果别人在那儿,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接着,他们围绕这个主题争论起来。这些人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声称,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只有独自一个人时,他们才能写作;而另一些人则声称,其他人在场不会打搅他们,反而会有助于他们取得内心精神集中的效果。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精神不集中,创作是不可能的。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打了一个比方说,从咖啡馆里传出的人群的喧哗声,就好像构成某种隔板,把他和外部世界隔开来。因此,每当他感到创作精灵降临时,他就离开家而去坐咖啡馆。他这番话使听众隐含在内心的笑展现在脸上。我后来得知,说这话的这个人,每当他的妻子想同她的情人——一位有名的希伯来诗人幽会时,他就躲到咖啡馆去写日记。“那么你呢,”有人问 A 道,“每当兴致到来时,你是不是也打发你的丈夫离开家?”她回答道:“首先,你说的那个人不是我丈夫。其次,他经常

离家外出,因为职业的需要,他把很多时间花在到全国各地旅行上。”

我希望,A 今晚一个人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那个狭窄小巷的小屋里。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答应过给她什么。但是,在当前这个季节,就是有爱情,有金钱,也买不到苹果。而且,所有商店都打烊了。因此,我从莫格拉比歌剧院旁边苏丹人摆的小摊上买了两盎司栗子,从鲜花店买了一束麝香石竹花,就向 A 的住宅走去。

她的小房子四周是厚厚的篱笆墙,我绕着房子转了一圈,谛听百叶窗后边的说话声。然而,我所能听到的,只有蟋蟀的叫声和蝉的鸣声。在花园里的树上和灌木丛中,只有萤火虫的火光在闪烁。我敲门。

A 的声音喊道:“谁敲门呢?”

我回答:“警察。”

门开了。A 出现在门口,迷惑不解地盯着我。

我把栗子袋和鲜花藏在身后。A 认出了我。她的双唇咧开,犹豫地一笑。她向我伸出手。为了握手,我不得不把提在右手里的栗子换到左手里。结果,在我的手握住她的手之前,出现了几分钟的尴尬场面。

“你背后藏着什么? 手铐? 你是来抓我的吗?”她笑着说,“我惟一的罪行不过是写了几首歪诗,但都是我自己写的。就我所知,我从没有剽窃过别人一行诗。”

我拿出栗子和麝香石竹花:“我曾答应给你苹果,但我等不到夏天有苹果的时候才来看你。我希望这些栗子和鲜花称你的心。你最好把花儿插到水里。”

“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总是遵照警察的指示行事。”她边说边从我手里接过栗子和麝香石竹花。“这花真好看。”她又

补充道。

“我已经不当警察了。可是，我还在搞案件调查。我这次来找你，还是想请你帮我一把，”我说，“为了搞这次调查，我必须刨根问底，查明一首诗。”

“难道这首诗里有侦探所说的线索吗？”她惊喜地眉毛一扬，“多有意思。”

她的脸上展露出热情的微笑。我们之间的那点儿尴尬之情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请进里边来。我们到厨房里坐吧。我来沏点茶，我们边喝茶边吃栗子。栗子还热乎呢。只是我的煤油炉近来一直冒烟。”

确实，天花板上烟熏的痕迹。

“你来看这首诗，我来检查一下炉子。”

“那么，我可以修改吗？”她笑着说。

“只求弄明白它的内容。”我说着，把那首诗递给她。

“你怀疑这首诗是剽窃的吗？”她问道。随后，她又神情严肃地说：“大部分诗作，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都含有其他诗作的痕迹。即使有人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创新的时候也要对照旧的风格。”

我拆开那个小炉子，仔细观察其内部。“你有新的炉芯吗？”我问道，“这个已快烧完了。”

“把炉芯头剪掉一段怎么样？”

“那也无济于事。剪不剪都一样，这个炉芯早已烧完了。”

A 拍拍额头，把辫子向后再一甩。“我思想多么不集中呀！我已经准备了新炉芯！我可当不了教授，我缺心眼儿。”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新炉芯，我把它安装在灶具上。“我来给炉子灌上油，”我说，“烧起来就会和新的一样。”

我从罐子里抽出一点煤油，点着炉芯。A 把壶放在锅圈上，

开始烧开水。

“欢闹俱乐部的人邀请我参加普珥节晚会，”她突然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化装呢。”^⑤

“我可以教你骑马。”我说。

“像以斯帖王后那样？”她耷拉下脸来，“我皮肤太白了，以斯帖的皮肤黝黑。有那么多漂亮的也门姑娘可以扮她。”

“你可以扮成戈黛娃夫人去参加。”^⑥

A 惊奇地看着我。她的双眼变得细长，她的表情变得冷峻。我感到好像打了自己一记耳光。我竟脱口说出这种白痴一样粗俗的话，就是在五旬节之夜也是说不过去的。

“你想了解这首诗的什么东西？”她冷冰冰地问道。

“如果你给我解释一下这首诗的主题，”我温顺地说，“我将非常感激。”

“因为你已经不当警察，你也不能抓我，我就不必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既然你不辞劳苦来向我请教——”她用安抚的声调补充说。她把那首诗读了一遍，断然说：“这首诗讲述的是诗人和诗歌的结合，或者说灵感。”

说到这里，她突然向我嘴里扔进一个栗子。我没有料到这一手，吓得我的下巴差点儿要掉下来。这时，开心的笑容又出现在她的嘴角。

惊骇之下，栗子卡在我的气管里，我几乎要窒息。A 则开心地为我捶背。

“讲述的是诗歌吗？”我使劲喘着气说。

“当然了。诗中的仙人掌就是诗人……”

“仙人掌就是诗人，”我像一只愚蠢的鹦鹉一样重复道，“缩回去了的仙人掌？”

“只要你把这首诗多读几遍，我想，你就会把诗人看成一个

向所有读者表明其心意、敞开其心扉的人。正如雷切尔在她的《诗作集》中所写的……”

“但是，比亚利克也——”我想求助于更高的权威人士。

“就比亚利克来讲，我没有把握。有时，我觉得他在蒙骗读者。施隆斯基那帮人，受俄国诗歌的影响，信奉的当然是那种主张。那是当今这里诗坛上的主调。但是，在西方，人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写另一种不同的诗歌。你懂英文，当然知道。你听说过艾略特这个名字吗？”

“乔治·艾略特吗？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她是位女士。”

“不是乔治，而是托马斯·斯特恩斯，托·斯·艾略特，一位美国出生的诗人，多年生活在英国。二次大战之后，或者说大战期间，他开始写诗。他的诗同先前写的诗根本不同。如果你的英文过了关，你应该读读他的《荒原》。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艾略特。但是，在讲英语的国家，他早已被认为是诗歌的一代宗师。我的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同乡写信告诉我，艾略特的诗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打算把艾略特的诗也译成希伯来文。我这位同乡叫诺阿·斯特恩。这是诗歌中发生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我担心，我们诗坛上两派的泰斗们，从中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是冷漠无聊的词句的堆积。无聊！”她激愤而又不满地喊道。

“壶里的水就开了。”我说。

“你说得对，”她说着将火熄掉，“我恐怕是走神了，因为——”她说到这里犹豫起来，很明显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肚子里的话都倒给我。“因为这正是我现在着迷的东西。我是多么想写那样的诗呀！不要像在绳子上晒衣服那样亮出我的苦恼，也不要像摇动旗子那样挥舞我的苦痛。另一方面，词句，所有那些富丽堂皇而有魅力的词句。你知道雷切尔的诗《成语》

吗？她早就意识到那些词句中隐含的危险，那些歪曲她的真正感情的词句的危险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在这些词句面前无能为力。‘一个男人不过是他祖国景色的模型’，切尔尼科夫斯基这样写道。^⑦我认为，一个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读过的那些诗歌中所描绘的风景造就而成。同其文化没有任何联系的纯粹诗人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神话故事，就像遥远的河畔上的一个牧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笛子的声音，竟学会了吹笛子。”

她先把小茶壶里的浓茶倒在两个杯子里，再向杯子里加满开水。她又在每个茶碟里放上一片柠檬，打开装着方糖的瓷罐的盖子。我把一块方糖放到嘴里，呷了一口茶。我虽然喜欢喝更浓的茶，但没有开口。

“我怎么能这样浪费你的时间呢，”她突然说道，“你又不是来这儿听我讲解诗学的。”

“我来这儿是想听你讲解一首诗。”

“请原谅。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跟你谈论这些东西，总比同其他人谈论容易些。”

尽管她这样说只不过是恭维我，我的心还是飞向她。我难以集中全力把她拉回到本－拉菲尔那首诗的主题上来。她呷了一两口茶，又吃了一个栗子，举目望着黑暗的窗口说：“枯燥无味的诗歌。上帝啊，给我一些格律严谨的诗歌，一些内容蕴藉的诗歌吧！这首诗就像大洋中的冰山，只有十分之一的内容肉眼可见，其余全部沉入海底深处。这首诗的每个字都重如黄金……”

“犹如加倍的沉默。”我接着说，但说后又立刻感到很后悔。但是，A显然只是在听她自己说的话。她神秘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些土生土长的诗人，沙漠中的仙人掌。”她说到这里停顿下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写这样的

诗。也许他们会用希伯来文创作这样的诗。这毕竟是他们在使用的贫乏的语言。他们厌恶那些大的、华丽的辞藻。我们领导人的夸夸其谈使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总是嘲笑那些大人物。那些人的心中总是激情澎湃不已，显然是忘却了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听说过扎尔曼·卢巴肖夫的故事吧。他总是滔滔不绝地演说，讲到最激动的时候，他的衣服袖子，也许是他的裤子，突然就掉了下来。而那些沙漠中的仙人掌，他们的每个措词是多么小心谨慎啊！这表现了强烈的情感，具有俄罗斯风格……也许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过分了。但是，当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念英文的时候，当他们逐渐熟悉现代诗歌，认识到没有必要区分什么口头语言和诗歌语言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会来到我们这里！”A 看着里屋墙上挂的钟表，又神秘地微笑了。她使我联想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那么，这首诗里的仙人掌到底该怎么解释？”我小心翼翼地问。

A 笑了。“这首诗里的仙人掌就是土生土长的诗人。他匍匐在诗神脚下，诗神就服从于他。也许，这是因为诗神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情人，至少在地中海的天空下还没有。”

“那无花果树就是诗神吗？”我冒昧地问。

“当然是。诗神是夏娃的无花果树，也就是香蕉树的拉丁文名字，在拉丁文中叫‘天堂中的缪斯’……和我同居的那个男子是位植物学家。顺便告诉你，再过几分钟他就来这儿。我相信，你是愿意结识他的。”

“对不起，”我说，“既然你给我提供了如此有用的线索，我就决不允许自己晚一分钟去利用。多谢你了。夏天一到，我就去黎巴嫩，给你带回鲜脆多汁的苹果。也许，那种苹果会使你创作出你希望的那种乏味的诗来。”

我为什么用嘲讽的语调结束同 A 的会见呢？鬼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从她那儿接受了关于现代英文诗歌的说教。现代英国诗歌，据我理解，是用英国人所说的“委婉”的口气表述的。这就使我说话使用了嘲讽的语调。这种语调在英文中也是非常典型的。也许，还另有原因。五旬风无疑是责无旁贷的。在北非，西洛可风甚至在法律上也经常被视为法国人所说的“激情犯罪”的充足借口。^⑧但我的过错，只不过是一些不纯洁的念头。

我再一次随手关上门，空着双手走出去，进入五旬风吹拂的夜晚。在米里亚姆那儿早就产生的紧张感，至今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强烈。我内心嘀咕着，是去喝点威士忌酒，还是到沃洛津大街去逛妓院。我走向罗斯柴尔德大街，向“黎巴嫩之雪”咖啡馆内窥视。在一个角落里，我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诗人，换句话说，是雅科夫·本－拉菲尔本人。他同一个小姑娘坐得很近。他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挥手，好像是在邀请我进去。但是，我现在不想进去同拥挤在咖啡馆里的那些诗人鬼混。对于诗人和诗歌，我已经腻味透了。我示意他出来。他站起身，同那位女郎一起走出来。自从上次带着诗找我以来，这家伙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背直起来了，他的脸鼓起来了。他那满脸忧郁、愁苦的表情，变成了自信的神色。他已不再穿那旧的打着补丁并略带臭味的衣服。他现在穿的是白衬衣和灰华达呢裤子。

“恕我向你介绍，”他说，“泽艾娃，这是本－霍林，一位地道的私人侦探。”

泽艾娃伸出手，我握了一下。“把你的诗卖给犹太国民基金会了没有？”我问道。

“我什么都不欠他们的。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的恩主不

是别人，正是你的朋友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

“比亚利克买了你的诗？”

“比亚利克对我的诗很感兴趣，”他骄傲地说，“他答应一有机会就考虑出版。”

“你让他看过你给我的那首诗吗？”

我看他有点窘迫不安。“我手头没有备份，”他说，“我把它送给你，纯粹是个礼物。我已告诉比亚利克，我们曾在火车站上相遇。他听后很高兴，并马上给我写了张条子，把我介绍给修建‘奥海尔·舍姆’大厅的承包商。直到今天，他还在感谢你给他找到小狗。”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他那首折叠着的诗作，“比亚利克也许能够给我解释这首诗的主题，并指出隐藏在里边的线索。我相信，既然他对你的诗已经很熟悉，他做到这些就不会有任何困难。”

“先让我看看吧！”泽艾娃说。

“当然可以，”我说，“你的诗人朋友会告诉你，这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如果他忘掉一两个细节，我很乐意作补充。”

“不行！”他喊道，然后改用抚慰的声调说：“这只是一份粗糙的草稿，我是从不拿草稿示人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现在，请你回到里边去几分钟。我想，服务生早已把我们要求的冰激凌端上来了。天气这么热，很快会化的。”

“扬克尔，”泽艾娃叫道，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难道你参与了某种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

“我已答应这位侦探，帮他进行一项秘密调查。如果你是个好姑娘，总有一天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

她耷拉着脸转身走了。“我不想久等。”她冷冰冰地说着走进咖啡店。

我把那首诗亮出来。“我已经询问了一些诗人和诗歌专家，”我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他们发现，这首诗好大部分是剽窃他人的。作家协会有个道德委员会。普珥节大游行时，他们将给你浑身涂上柏油，再粘上羽毛，在你的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这就是抄袭别人诗句的诗人应得的下场’。”

“你想必是开玩笑，”他说，“让我郑重地告诉你，作为一个诗人，不受别人影响的事儿根本就不会有。施隆斯基自己就说过，每个真正的诗人，总会从其他诗人的诗作中得到滋养，正如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一样。有些事儿是相似的……”

“因此，你从比亚利克那里得到滋养，又从施隆斯基的餐桌上捡了些面包渣儿？”我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用威胁的语调说。

我这次对他的威吓得手了。“你想要我干什么？”他说。

“这首诗——”

“我已经告诉你，”他回答说，“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并非……我仍然没有醒酒。我拿给你的是第一稿。因此，后来的修改就不会将你需要的痕迹弄模糊了。不动任何东西，或者说不改任何东西，这不就是警察进行调查的第一要义吗？！”

“而你却在极力将你剽窃来的诗行弄模糊！”我反驳他说，“你躲藏在一个心灵纯洁的诗人的光环后边！我打算撕下你脸上戴的那张面具！”

他的脸红了。“诗中只有一个词不是我的。至于其余的，我准备对簿公堂！这就是——”他指着最后一行说。

“两只香蕉？”我询问。

“你在哪里看到两只香蕉？”诗人惊奇地问道。

“这不是吗，‘杜木兹，杜木兹。’”

“扬克尔，”从咖啡馆里传来泽艾娃的叫声，“你的冰激凌已经变成水啦！如果你还不来，我就要回家了。”

“再过一分钟，”他回答道，“再过一分钟！”

我对他说：“我能听见那个叹息声。你是明白的。”

他压低声音说：“那是艾里舍娃的咕哝声。当……之后……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当时，它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撕裂了我那糊涂的脑袋。我意识到，和她睡在一起的不是我。那天晚上，我不是占有她的那个人。”

我也像被闪电击中：“这难道是一个男子的名字或绰号吗？”

“艾里舍娃当时呼唤：杜木兹，杜木兹。随后，她看着我，好像她不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不知道我是如何爬上她的床的。”

就在那个时刻，闪电好像从吹拂着五旬风的夜晚，从充溢着柑橘花香的夜晚直劈过来，把全部力量打在我的身上。这时，诗人正向咖啡馆的大门走去。我一把抓住他的衬衣，几乎是喊道：“你是说杜木兹？杜木兹？！”

“是的，我是说杜木兹。”

“但是，你写的却是杜莫泽。”

“我写杜莫泽是为了押韵。这难道就是你想要了解的东西吗？”

我没有回答。我抓着他衬衣的手松开了。他向泽艾娃走去。她满脸是早已掩饰不住的怒容。对这个意外的发现，我非常高兴。我真想跟着他到咖啡馆里去，邀请坐在那儿的所有诗人和作家喝杯酒，吃点冰激凌。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属于“凯图维姆”集团，我也不在乎。但是，就在这时，我听见施隆斯基吼道：“我们的桂冠诗人总是保护一些别人难以容忍的诗人！”闻此，人们突然大笑起来。有一个人，也许是伊扎克·诺曼，说道：“比亚利克做得太过分了，对每个找上门来学写诗的人和想当诗人的人，他都提携帮助……”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朝着本—拉

菲尔的方向看呢？从我站着的地方，我难以看清楚。

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准备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我也不能强使自己走进咖啡馆，因为施隆斯基在羞辱比亚利克，他的追随者在吼叫，在大笑。我截住一辆正在缓缓行驶的马车，让车夫送我回家。我付给他十个皮亚斯特的硬币，他一再低头哈腰地对我表示感谢。我打了一声尖厉的口哨，他的马就甩头而去。车铃在欢快地响着。我走进家门，打开窗子和百叶窗，给自己倒了一点儿威士忌酒，对着街灯举起酒杯，两口就全部喝完。之后，我和衣而卧，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睡得很香，舒服得就像裹着一块中国丝绸。我知道，今天晚上，在解开扎哈利亚·犹林神秘故事的道路上，我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注释：

①果尔达·梅耶森(1898—1978)，即果尔达·梅厄，以色列政治家、外交家。早年积极从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工和妇女活动。从1969年到1974年任以色列政府总理。人们通称她为“梅厄夫人”。

②多夫·伯尔·包罗霍夫(1881—1917)，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和领袖，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同犹太民族纲领相结合的思想。

③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奥地利记者和作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缔造者。

④雷切尔·布卢沃斯基(1890—1931)，现代希伯来诗歌奠基人之一。

⑤欢闹俱乐部是一个青年团体，成员主要是工人。他们通过饮酒、晚会、打球等活动寻欢作乐。

⑥戈黛娃是公元十一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贵妇。传说她因裸体骑马通过考文垂市而使该市居民减免重税，因而以此闻名于世。

⑦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1875—1943)，现代希伯来文重要诗人。

⑧西洛可风是从北非的利比亚沙漠向南欧吹来的一种热风，常携带沙尘，间或携带暴雨。

七

早在几年前,我就听到过“杜木兹”这个名字。当时,我受派遣去哈瓦利斯谷地处理犹太国民基金会同贝都因人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前者的代表汉金已经拥有这片谷地,但贝都因人却仍在那里放牧。贝都因人本来已经同意转移,但伊斯兰教的穆夫提的支持者来到这里,却鼓动他们留下来不要走。^①一天,形势恶化,发生激烈争吵,差点儿发展成流血冲突。当时,我正在齐科伦-雅科夫附近,就奉上级警官之命火速奔赴就要发生危险的地点。我跳上汽车,驶往赫德拉。到那里之后,我获悉,主要的煽动者并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当地的犹太人——“共产主义派”的成员。在伊斯堪德伦河谷的岸边,我确实还遇到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他们把一包包阿拉伯文的宣言,藏在自己人中间,打算在贝都因人中间散发。我奉命没收了他们的宣传材料。这些,好在贝都因人都无法读懂。我还告诉那些犹太人,如果不立刻回到赫德拉去,他们会被投入图尔卡拉姆的监狱的。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我审问过贝都因人的族长。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杜木兹”这个名字。由于这位老族长的牙齿都掉光了,他说到这个词时,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达穆萨”。我当时猜想,他说的就是那个共产主义派成员拉杜安·埃尔·希卢,又叫穆萨。

在发生动乱之前的那个夏天,有关另一个人的情报引起警方的注意。这个人的名字或绰号叫“杜木兹”。秘密警察说,一个叫这个名字的阿拉伯人,他的眼珠的颜色很淡,走村串乡,煽动农民起来与政府作对,攻击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个秘密警察甚至还听说,就是这个叫“杜木兹”的人,还曾答应给阿拉伯人提供武器,也许早已兑现了。但是,这种流言蜚语当时到处都有,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特定的煽动者。有一个人在有关“杜木兹”材料的空白处写道:“他可能是个叙利亚人,也许是阿拉维人。”据说,阿拉维人是蓝眼睛。我不记得有谁发布过逮捕他的命令。也许这是因为,据说他想要伤害的,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当时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一些高级警官是不反对他这样做的。

对他态度的变化发生在动乱期间。那时,“杜木兹”向驻守在萨马里亚山区的英国骑警部队的一个军官开了枪。于是,当即发布命令,不管是死还是活,都要把他抓起来。有一连警察和士兵向努尔-沙姆兹地区开去。他们在那里挨村挨乡搜寻了好几天,找遍了山洞和水巷。但是,“杜木兹”却无影无踪,犹如大地把他吞噬了一样。他们对一些农夫和牧民进行了严厉的审问,但一无所获。只是在“杜木兹”的案卷中加了一张便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是个犹太共产党人。”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道:犹林就是“杜木兹”?^②现有线索是否指向巴勒斯坦共产主义派?还有什么线索没有?犹林(如果这是他的真名)可能就是(曾经是?)拒不同意取消1929年5月1日“五一节”大游行的那个“极端分子”吗?他不是还拒不接受所谓“巴勒斯坦共产主义派中的犹太党员从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阿拉伯人在反帝起义中可能进行大屠杀表示反感”这样一种观点吗?在这个派别遭到压制之后,还说他在起义之前

和期间实际上执行了这个派别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可能的吗?

纨绔子弟犹林到底是谁?他也许是特拉维夫那位穿着最考究的男子,也许是传言中靠女人生活的那个人。而要证实他就是身穿长袍,在萨马里亚山中煽动一些农夫闹事的杜木兹,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又一想,我就不禁自言自语说:相反,犹林很可能进行了英国人所说的“巧妙包装”。

在那张纸上的抬头下边,我又写道:

- 一、找出一切有关杜木兹的材料。
- 二、结识那个派别中还没有转入地下的成员。
- 三、关于后者要竭力打进他们的秘密组织或巢穴。

我稍微吃了一些早点。十一点钟,我穿着游泳衣去海边。五旬风有点变小了。到傍晚或者下午,东南风就会变成西北风,甚至会变成西南风。这在五旬风刮过之后是经常发生的。空气中的尘埃,那些来自阿拉伯和埃及沙漠中的尘埃,将会逐渐消散。笼罩在薄雾中的雅法塔,将重现天日。我跳进水中,奋力而游,游出几百米远。在那里,我翻过身来,仰面朝天。一段时间以来,我已学会躺在水面上,双手放在头下边。这样可以坚持好长时间。我逐渐认识到,采取这个姿势,我的脑海中就会产生一些最新奇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在这种地方采取这样一个姿势,我肯定就会完全静下心来,与世隔绝,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能打断我的思绪。而我身下和身旁有韵律波动的浪花,则有助我思想的车轮顺利转动,就像加足了润滑油的齿轮那样。现在的问题是,在我游回岸边,直到拿起笔和纸的时候,还要把当时进入我脑海的想法保持住。

我在凉爽清新的水中漂游了大约半个小时。在此期间,我

的脑子一直在想,如何着手执行我给自己确定的第二项,特别是第三项任务。我想到各种答案,但每一种答案都有其自身的困难。我想,毫无疑问,如果说共产党人的某些活动在暴乱之前是秘密进行的,那么,暴乱之后,在他们遭到伊休夫和英国刑事调查局的追捕和迫害时,他们肯定早已转入地下。然而,他们的出版物,有意第绪文的,也有阿拉伯文的,仍然在印刷出版。我想化装成阿拉伯人,设法打进他们的组织。我也曾考虑,能不能冒充一个来自国外执行秘密使命的间谍。但是,踏上海岸之前,我就自言自语说,这些荒诞无稽的想法,无疑是受到普珥节的影响,因为节日将至,我们将举行各种化装晚会。这样,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公开宣布我已经“看见曙光”,懊悔过去对共产党采取的态度,现在希望同他们站在一起。我这样说,但愿他们会相信。不过,他们当然很了解我退出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原因。

午餐时间已到,我有点饥肠辘辘。我冲掉身上的咸水,去梅亚·谢阿利姆大街一家工人餐馆用午餐。我知道,一些左翼人士憎恨犹太工人总工会,因此不愿意到布伦纳大厦用餐,而总是到这里来吃饭。当然,他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因为餐馆老板费维尔制作的咸鲱鱼。这种咸鲱鱼很合顾客的口味,他们因而也就不在乎这个餐馆比较差的卫生条件了。每当我从这个餐馆的门口走过,我总会听到里边的人高声叫骂,通常是用鲜活、通俗的意第绪语,指责犹太工人总工会、犹太代办处以及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今天,餐馆几乎无人光顾。只有两三个顾客坐在那里,低着头吃鲱鱼,嘴里塞满了面包。除通常的气味,即好多天也不通一次风的那种低档餐馆的气味之外,这里又多了一阵阵强烈的煤

油气味。在我的眼睛渐渐适应里边的昏暗之后,我才找到这种气味的根源:煤油小贩希梅克穿着深蓝色的衬衣,坐在一张桌子旁,手拿汤匙在喝盘子里热气腾腾的汤。他的马和车停在隔壁空旷的地方。马在那里大嚼春草和野花。我饿得心里发慌。我羡慕那匹马及其露天的美餐。我转身离开,向曼什耶方向走去。我走进哈桑贝克清真寺隔壁的一家阿拉伯餐馆,叫了美味的羊肉,还有松仁拌米饭,饱餐了一顿。我一连打了三个饱嗝儿,而后就回到办公室。

后来的几个钟头,我都用来仔细研读从米里亚姆那里拿来的传单和小册子。我在一些段落和句子下面划了横线。傍晚时分,我把这些材料收起来,塞进一个大信封里,向卡里舍大街方向走去。

我敲门之后等了一会儿,米里亚姆才把门打开。她带着一种阴沉、敌意的表情让我走进门。“噢,是你。”她噘着嘴说。

“还是我。”我回答道。

“你是来还材料的吧?”

“也许还要喝一杯茶。”

“很好。我给你沏杯茶。”她冷淡地说。

“你难道对我关于这些小册子的看法不感兴趣吗?”

“我听说你像个警犬一样围着费维尔餐馆四处闻。”

什么人告诉她的,我真纳闷。也许是煤油小贩吧?

“凭什么说像个警犬?”我愤愤不平地反驳道。“我所要做的是找到写这篇文章的人——”我在空中挥舞着一本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小册子说,“目的是要告诉他,这本书说得很有道理。”

“确实是那样吗?”她说话的声调里既含有不相信的成分,也

含有发自内心的惊奇。

“确确实实是如此。有关英国人那段论述,我更是完全赞同。”

“也许……”米里亚姆神情犹豫地说,“你有希望了。”

“有希望喝一杯热茶?”

她把水壶放在普利姆斯汽化炉上烧水。我靠得更近一些,帮她点炉芯。她的身体依偎在我身上。

“小册子中论及的一些事情,为我澄清了某些问题。”

她的脸转过去避开我,但她的身体却越来越有劲地贴在我身上。

“你自己知道,在暴乱期间,我亲眼看到我们英国主子的所作所为。在此之前,我同阿拉伯人、农夫、贝都因人,还有农村的阿拉伯人,不光是点头之交……”

她的双手停止备茶。我继续说:“如果《共产主义运动》九月号这样写:暴乱实际上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占领者的正义的、正确的暴动,只是由于英国人玩弄阴谋诡计,暴动才变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认为,这就说出了事情的内在本质。那也许比作者自己想像的还要深刻。”

米里亚姆转过脸来对着我。她紧紧地拥抱我,抱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她把头贴在我的脖子上,突然又离开,拉着我的手说:“我下班后还没有洗澡。”

“我帮你把澡盆灌满水,然后给你搓背。”我说。

米里亚姆拿来澡盆,放在屋子中间。她把壶里的水倒在澡盆里。屋里顿时弥漫了蒸汽。然后,她又兑上凉水,拿来肥皂和丝瓜筋,脱掉衣服,坐在澡盆里。我脱下衬衣,往她的肩膀、胳膊和胸前撩水。一着水,她奶头四周的黑圈就皱起来。我把她的背弄湿,然后在丝瓜筋上打肥皂,直到泡沫四起,才开始轻轻地

给她搓手和脚。在她的腋下，茂密的黑毛丛生。我用手指和手掌轻轻地将它们擦洗。米里亚姆闭着眼睛，发出惬意的笑声。在背上打完肥皂之后，我转到她那柔软的胸部，继而向下转到她的小腹部。我特别留神她的肚脐。在那布满皱褶的肚脐眼里，积存着一点烟叶。这使我不只一次地同她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肚脐眼当作水烟袋。

在她膝盖和股沟之间的大腿上，长出一撮柔软的黑茸毛。这种黑毛在她的腿肚子上长得更密。我从来不赞成某些资产阶级女士剃腿毛的习惯。我一直认为，她们这样做，就剥夺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一部分天然的热情。这不禁使我想起阿拉伯妓女，她们总是将自己的阴毛剃掉。

我的手指碰到她的阴部，她发出呻吟声。突然，她在澡盆里站起来，向四处撩水。她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毛毯，把我向她拉过去。不一会儿，她就喘起粗气，浑身发抖。我从她温暖而湿润的体内抽出我的那个东西，放在她肚子上的水珠间，以免使她受孕。她紧紧地抱着我，悄声说：“你同我好了，阿夫纳尔，你同我好了。”

我们擦干身子，穿上衣服。米里亚姆开始准备晚餐：沙拉、黑面包和乳酪。我们默默地吃着。直到我们喝茶时，她才说话：“我原以为你已将这些小册子全部扔进垃圾箱了。”“我险些那样做，”我说，“这一本起初还真把我气坏了。”我从那一大堆小册子中拣了一本薄的，是儿童读物：《穆夫提马提亚和两千年前的农民起义：巴勒斯坦共产主义青年团出版的光明节故事》。^⑤“从事物的表面看，这是一个使人血液沸腾的比喻。莫顶城祭司马提亚即犹大·玛咯比的父亲，而阿明·侯赛尼即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小册子看来是将这两个人合二为一了吧？可是，回头一想，”我用坦诚的眼神盯着她的双眼说，“我认为只要克服了你的

狭隘、偏狭的观点，你就一定会承认，客观地讲，小册子讲的还有一定道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被压迫的农民，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总是奋起反抗外国占领者及其代理人。我早就对你说过，米里亚姆，我是愿意同那些写作和编辑这些出版物的人们接触的。但是，如果费维尔的顾客对我抱那样的怀疑态度，我恐怕，事实上我很肯定，他们之中是没有人愿意同我讲话的，更不用说把他的消息来源透露给我了。哦，甚至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会成为他们的肉中之刺！”我之所以造了上边这样一个长而难解的句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是一种风格，她异常珍视的那些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利用这种风格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你的话很对。”米里亚姆内心充满热情地说。她是指我讲话的第一部分。“一切取决于你的观点。如果你把国际冲突看成不同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对抗，那是一回事。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一直存在着，只有资产阶级的、教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才歪曲它……”她停下来，喘口气。大概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句话说完。她第一次无疑是从制鞋工人莱伯勒那儿听到这种话的。而他今天不在场，不能帮她把这句话说完。

“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要往哪里发展。”我帮她把话说完。她感激地向我丢了个热情的眼色，然后继续说：“你知道，阿夫纳尔，如果你正确地理解《以斯帖记》，你就会立刻认识到，它也是讲阶级斗争的！”^④

“《以斯帖记》？”我对她这种说法毫无思想准备。

“就这个问题，我们要在普珥节上演一出戏，”她说，“作为一种因特——因特——”^⑤

“国际的？”

“不是。”

“干涉？”

“不是！因特普若……”

“因特普若特伊申——解释？”

“对，就是它，”米里亚姆擦着额头说，“作为对当前事件的一种解释。同今天发生在德国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很有意思，”我说，“那么，哈曼宰相将暗指德国国家社会党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了？”

“希特勒只是个工具。资本家——重工业家和其他实业家手中的傀儡，”米里亚姆背诵道，“那些大鲤鱼，大鱼，巨头，是幕后操纵者。”她显然是指克虏伯家族，鲁尔区实业家，但我没有给她纠正。我只是说：“还有亚哈随鲁——”

“亚哈随鲁是波斯国王，暗示德国国王。”

“德国现在没有国王。你是说德国总统兴登堡吧？”

“我是说亚哈随鲁！”她的话音里带点儿愤怒。我赶快问道：“你要扮演以斯帖王后吗？”

“我演瓦实提。”

“瓦实提也很漂亮，看上去很美。”

“你嘴真甜，”她说，吻了我一下，“我们并不是举行选美比赛。我们演出的是政治剧。”她用严肃的口气继续说：“瓦实提象征德国共产党。他们不愿意和那位富有的首相一起进入政府。”

米里亚姆神经质地看着我，但我一言未发。我知道，她所说的“富有的首相”，肯定是指帝国首相。^⑥“我有个想法，”她稍微停顿之后说，这时，经过左思右想，她已经醒悟过来，“明天晚上，这出戏的所有演员都化上装，戴上面具，集合在一起。扮演犹太人末底改的演员是这方面的著名专家、剧本的作者，他来给我们说戏。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听呢？”

“我？犹太人末底改看见我，就会变成煤油小贩的马匹！”

“他不会看见你！他会看见太监！希该！”

“我是太监吗？！”逻辑推理告诉我，她是在取笑我，但她脸上的表情却十分严肃。

“太监希该，是为国王掌管女人的侍从。你瞧，”她拿起一本《圣经》，翻到《以斯帖记》，“我们的太监在最后时刻不见了。我知道他的戏装在哪里。你穿起来是非常合身的！”

“太监出了什么事？他长出了睾丸？”

“我说话是严肃的。”米里亚姆用责备的口气说。

“那么，太监希该象征什么呢？”我问道。

“民主的无能，”她背诵起来，“千万不要忘记，到时候说话要大声点。明天七点到这儿来。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

注释：

①穆夫提为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②“杜木兹”是巴比伦神坦木兹在苏美尔语中的名字。坦木兹在格鲁吉亚年历中是个月份，即阳历中的“July”（7月），希伯来文称“Juli”（犹里）。

③马提亚是希腊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耶路撒冷西北莫顶城耶和雅利家族的祭司。公元前168年，希腊官员在莫顶城设希腊祭坛，强迫犹太人按异教礼仪祭献，遭到马提亚及其儿子们的反对。从此，马提亚举起义旗，率领犹太民众进入深山丛林，进行抗击希腊统治者的斗争。公元前166年，马提亚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玛喀比继续领导这场斗争，并于公元前165年攻克圣城耶路撒冷。阿明·侯赛尼（1897—1974）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曾多次领导阿拉伯人进行反对英国托管统治、反对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斗争。

④据《旧约·以斯帖记》记载，波斯国王亚哈随鲁在公元前486年登基。登基后第三年，他设盛宴招待百官，并乘酒兴吩咐太监请王后瓦实提前来，使臣民一瞻其国色天姿，但王后拒命。亚哈随鲁大怒，随将她废弃，改

立一直由太监希该照料的以斯帖为后。以斯帖是犹太人末底改的养女，深得国王宠爱。在宫中做侍从的末底改从此也自视不凡。朝中百官见到国王宠信的宰相哈曼均叩拜，惟末底改不拜。哈曼十分恼火，遂设计报复，要在1月30日杀死住在首都书珊的所有犹太人。末底改得悉，遂同以斯帖王后制定了对付哈曼之计。最后，他们当着国王的面揭穿了哈曼要杀死所有犹太人的计划。国王遂下令将哈曼绞死。以斯帖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拯救了犹太族人，在希伯来历史上被誉为女人的楷模。

⑤米里亚姆只知字头“inter”，想不起要说的字是“interpretation”（解释）。而“我”就只好猜是“international”（国际的）或“intervention”（干涉）。

⑥帝国首相（Reichskanzler）指希特勒。米里亚姆误将德文中的“帝国”（Reich）说成英语中的“富有”（rich）。

八

第二天六点四十分,我走出家门口。迎面而来的是强劲的西南风。地平线上布满云团。夕阳躲在云层后面,把云团的边缘映照得绯红。眼前的浪涛还不高,拍打着海岸。但在几百公里的远方,地中海上的狂涛巨浪无疑在汹涌澎湃。如果没有风从东方逆向吹来,今年普珥节的庆祝活动就会在阴天、甚或在雨天进行。

假如我不知道卡里舍大街上这个房子是米里亚姆住的,我也许会认为,我来到的是某个东方后宫的一座闺房。米里亚姆穿着一件半露胸的红天鹅绒罩衫。她的腰下穿着一条也门妇女常穿的那种裤子。不同的是,裤子是用很薄的料子做的。她的眼睛上涂着眼影,嘴唇抹得鲜红。她的头发也做成了我从未见过的样式。如果工友见到她,她们无疑会指责她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

“晚上好,陛下,”我说,“你有何吩咐?难道你不想让太监给你脱掉衣服吗?”

“说话声音大点,”她斥责我说,“否则,禁卫军士就要逮捕你,把你处死!”

我情不自禁浑身发抖。我打量她一眼,发现她的表情和通常没有什么不同,依然充满热情和天真。“穿上吧。时间晚了。”

她说着，递给我一件红色的长袍。这使我不禁想起被判死刑的人穿的那种衣服。不同的是，这件衣服的边上带有穗饰，而穗饰的末端则挂着铃铛。

“这铃铛是给王后提醒用的，”米里亚姆说，“这样，来人时，她就不会毫无精神准备了。”

“假如当时怀里正抱着某个黑奴？”我开玩笑说，有点心不在焉。

“戴上面具，让我们走吧。”她说着，在我的脸上挂了一个怪模怪样的面具。

我在镜子里一瞧，看到的是一个既像个猴子，又像个中国古代穿官服的玩偶。

“你现在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后宫太监。”她说。

“我们就这样去上街？离普珥节还有一周呢！”

“我们坐上马车，以你习惯的方式出游。”

“这几条大街上一般找不到等待出租的马车。”

“王后门口总是有马车等候的。”

的确如此，有辆马车等在门外，车夫是犹太人。顿时，又有一种恐惧之感传遍全身。肯定那就是煤油小贩吗？我想起那种叫合掌螳螂的虫子。母虫在性交之后就把伙伴杀死。现在打退堂鼓已经太晚了。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

“去哈－亚沃达大街，”她回答道，“但我们要在谢因肯大街下车。”

“上车，上车吧。”车夫用他那种粗暴的方式催促我们。我们登上马车，身子向后退，靠在柔软的座背上。马车出发，沿着纳哈拉斯－本杰明大街向前走去。我对化装成瓦实提的米里亚姆说：“一般公众的看法是，一个人喜欢穿什么化装服，就表明这

个人内心暗藏着什么愿望。”

“你对我了解得很透彻，”米里亚姆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本想说，她说的是真话，但那只是在她同那个鞋匠一起午餐和休息之前。可是，我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话说出来。

她也沉默下来。我们离谢因肯大街越来越近。她在房间里的时候眼中闪现的那种愉快神情，变得越来越淡薄。在我们拐弯走进谢因肯大街时，我感到她的精神有些紧张。

“如果你后悔，不该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可以在这里下车。”我说。

“不！”她惊叹道，几乎是在喊叫。车夫回过头，看了我们一眼，向左转到约哈南－哈桑德拉尔大街。

“我们在这里下车。”米里亚姆说，几乎是耳语。我让车夫停下来，给了他整整一个先令。他对我表示感谢，表情乖戾，突然又使了个眼色。这个眼色是丢给我的，还是丢给她的？我不禁再一次心生疑惧：一路上，这个人怎么一直不开口？在普珥节前几天，像我们这样打扮的两个人，肯定是会招惹得任何普通车夫都开口说话的！

我们走上哈－亚沃达大街。街上阒无一人。走到这条大街尽头的一所房子附近，米里亚姆才停下来，说：“就是这儿。”

这是一所很小的房子，四周长满灌木。从外边看去，房子里很黑，给人的印象是，里边没有人住。

我打开矮篱笆墙中间的大门。米里亚姆抢先几步，从我身边走过去，小声说：“记住，要大声说话！”她递给我一块小手绢，接着说：“把你的嘴盖住，在面具下边！”她走到门前，敲了几下。这也许就是莫尔斯电码中使用的暗号。

一个男子打开门。他身穿蓝色的阿拉伯长袍，头戴罕见的

黑色缠头巾。他留着一副长胡子，胡子直垂到他的袍子上。他大概就是犹太人末底改的扮演者吧。他的眼睛透过他戴的面具上的圆眼镜审视着我。“你是米母干？”他问。^①

“你怎么了，末底改，”米里亚姆很快打断他说，“米母干很久以前就从剧本中给删掉了。这是太监希该。”

“这样，我们就用希该代替米母干了。”他说话用的是也门口音。这样，“希该”听起来就像“赫各”，意思是“方向盘”。因此，他开玩笑说：“车走左行道还是右行道？”

“这里是英国殖民地，”我说，我说话的声音连我自己都难以辨认了，“我们的主子命令本地人在道路的右边开车……”

“哈哈，哈哈，”末底改傻笑着说，“我们的太监也能扮个丑角。”

我们走进屋。百叶窗关着。只有通向后廊的门开着。在走廊那边，我看到有一个栽着果树的花园。

屋子里有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女的是以斯帖王后。但是，她不是波斯的以斯帖，而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瑞典的以斯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米里亚姆用胳膊肘戳我的肋骨。她悄声说：“别忘记你是太监！盯着哈曼这个坏蛋！”她把脸转向其中的一个男子。此人看上去好像是从德国艺术家格罗茨的一幅漫画中走出来的：^②面具盖着他的整个脸，包括前额，而面具上面则是浓密突出的眉毛，嘴里叼着一支很大的哈瓦那雪茄烟。他穿着一套带条纹的衣服，而上衣竟盖不住他那鼓起来的肚子。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工人阶级的真正阶级敌人。他用锐利的目光打探着我，但没有说话。

另外一个男子显然就是亚哈随鲁国王了。他没有戴王冠，坐在一个很高的座位上。那座位就像理发师的椅子。他手里拿着用金纸包起来的权杖。

犹太人末底改拍着手说：“请坐下，同志们。”之后，他转过脸对以斯帖王后说：“把脚本分给同志们。”

以斯帖把油印的稿本分递给我们大家。当她递给我时，我压低声音惊呼道：“艾里舍娃！”她很快转过身，走过去站在门口。

“印刷得很不好。”哈曼说。的确是如此。一些字的字母断裂了，每页上都有不少黑点。

“我们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你们也许都知道。”末底改说。他说话的口气没有表现出多么喜欢对话者，但这也许正是剧情的需要。

以斯帖真的就是艾里舍娃吗？如果有人告诉我，犹林就在这屋里，我很可能会指向哈曼。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特拉维夫，没有一个女人会和这个怪物一起坠入情网的。但是，正是他奇怪的装束，引起我对他的怀疑。

“末底改，”瓦实提说，“你曾答应把你写的剧本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会守信用的。”末底改说。他捋一下胡子，开始讲起来：“从《以斯帖记》中，我们可以学到夺取政权的另一种策略。这个策略适合所谓的民主政权，让我们抛弃武装革命的道路，利用民主提供给人民的方法，从内部夺取政权。正像以斯帖王后那样，打入古波斯的王宫。”他满怀期望地环顾四周，好像在盼望听众鼓掌，至少咕哝着表示赞许。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容。末底改接着说：“现在，亚哈随鲁的政府即将落到重工业家和大资本家手中。这些人首先要屠杀群众，继而将用铁腕制服他们，压迫他们。”

“群众会造反的。”哈曼粗暴地打断他。

“造反不总是成功的，”末底改反驳道，“比如，贝拉·库恩在匈牙利失败了，他领导的政变遭到血腥镇压。^③再回到我们的话

题上来吧。亚哈随鲁想通过任用代表共产党的瓦实提来加强他的政府。但是,瓦实提拒不合作。这时,末底改就采取主动,同以斯帖密谋,控制了这个王国,拯救了犹太人。换句话说,拯救了劳苦大众,给热衷于发动战争的资本家以致命的打击。”

“这真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天堂!”哈曼嘲笑道。

“这是第一幕,”末底改说,他的话语中已失去一些信心,“当所有的权力落到工人们手里,他们也会打倒亚哈随鲁的。”

“那瓦实提怎么办?”我尖声喊道。

哈曼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说:“同志们,你们犯了个大错误。”他从坐椅上站起来,把他手里的剧本撕成四条。“关于《以斯帖记》,我们有了一条新的路线,一条革命的路线,不是改良主义的路线。”

“从什么时候起?”末底改问,口气里也许有一点恐慌情绪。

“哈曼是革命的领袖,哈曼是真正的无产者!犹太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末底改则是哈伊姆·魏茨曼同首席拉比合二为一……”^④

“哈曼同志是正确的。”亚哈随鲁突然用意第绪语说。房间里沉默了一两分钟。而后,末底改神经质地捋着胡子说:“我错了。我本应提高警惕。”

“我从不喜欢《以斯帖记》。”以斯帖王后说。她说话的声调使我想起小提琴奏出的旋律。“我从小就不喜欢。对女人采取诬蔑与贬低的态度,令人作呕!有整整一年时间,她为取悦那位男人陛下,不得不洗澡、打扮、洒香水,直到他宠幸于她,邀她共度良宵。”

“我们只是把《以斯帖记》作为一种政治讽喻的框架。”末底改说,话音里带有歉意。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那种讽喻?”瓦实提说。

“要为普珥节准备点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就来不及了。”末底改咕噜道。

“难道你对我们的方针有怀疑?”哈曼粗暴地打断他。

“当然不是,”末底改回答说,“我同意这个方针。此外,我理解……”

“不必要总是把一切都理解。”哈曼又打断他。这时,末底改态度缓和下来,继续说:“你们是对的,同志们。当今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去年10月,资本主义制度遭到决定性打击。你们会期望饥饿的劳苦大众加入他们自己的党,投他们自己阶级的票。但是,现实表明,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产党没有当选的机会。”

“他在喋喋不休地讲什么?”亚哈随鲁打着鼻息说。

“我想说的是,只要美国共产党走布尔什维克道路——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剧本改编一下,适合美国的情势呢?那样,亚哈随鲁就会成为愚蠢的胡佛总统。”

这时,亚哈随鲁心满意足地又打起鼻息,声音比前一次响好几倍。末底改缩进椅子上。以斯帖说:“我听过一首歌,描写美国可怕的状况。这首歌讲一个失业工人,身无分文。他坐在纽约的大街上,看见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老战友从身边走过。他向他们乞求怜悯。我一听到这首歌,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如果你们喜欢,我就给你们唱一下。”

“你为什么不用小提琴伴奏?”我的这句话刚到嘴边,不料就咳嗽起来。哈曼又瞪了我一眼。而末底改受到以斯帖那番话的鼓舞,站起身来,开始满怀激情地高谈阔论:“我们将表现资本主义的奴仆奋起反抗他们的主人!剥削工人的人从银行的窗子里跳出来。然后,工厂和血汗车间里的工人们奋然而起,控制机器和装配线!”

“那么谁将是瓦实提？”瓦实提问。

“瓦实提可以是埃玛·戈尔德曼。”哈曼说。^④

“她穿什么衣服？”

“她曾和一些男人同时搞自由恋爱。”末底改说，奇怪地看了哈曼一眼。

“她戴大帽子，穿有带子的衣服，”以斯帖说，“我有她的照片。”

亚哈随鲁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不屑一顾地说：“无政府主义者！”

“在她的情人中，”哈曼说，“有一个警方的间谍，但冒充是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又要来一个讽喻？”瓦实提不耐烦地脱口而出，“我腻味透了所有这些讽喻！”

“我们的太监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哈曼好像用刀子一样锐利的眼光把我看穿了似的。

“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个‘格泽哈尔’。”我尖着嗓子说。我在这里用了一个代表“微不足道”的词。这个词在波斯语中的意思则是“老鼠的性器官”。

“他在说什么？”亚哈随鲁耸起他的耳朵。

“没说什么！”哈曼盯着我，厉声催促道，“快讲！”

“《以斯帖记》中说，哈曼能克制自己。”我说道。我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对我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很反感。而这种反感情绪开始影响到我的身体。我同时意识到，即使米里亚姆把我带到这儿来，是出于真诚的动机，而她的同志们很快就会撕下我的假面具。这也许是“比喻的”说法，也许真的是如此。

“亚哈随鲁勃然大怒。”哈曼几乎是悄声说。随后，我竟脱口

而出道：“哈曼和末底改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屋里突然静下来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我。

“像皮亚斯特硬币一样，一面是树，一面是巴勒斯坦人？”米里亚姆说。她这样说也许是想尽力阻止一场风暴的来临。

“这倒是一种辩证的观点。”末底改说。我分辨不清他说这话是郑重其事，还是满怀讥讽。

“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哈曼粗暴地制止他说。而亚哈随鲁则举起他的权杖，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梆地敲了一下。

“一个绝妙的对比。”我说。“树是犹太人末底改，犹太复国主义者末底改。他抽干沼泽地里的积水，种上树木，消除沙漠。但是，他还有另一面，相反的一面，穷凶极恶的一面。就在同一个时间，他改换服装和面具，走出去煽动阿拉伯人砍树，坚持不离开他们卖给他的土地。当然，正像瓦实提同志说的那样，这是比喻的说法。”我赶快补充道。这样讲，更多的是代表她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

“我们的太监长出阴茎了！”亚哈随鲁说，从他坐的椅子上站起来。当他站直身子，我才看到，他比我想像的矮得多。就像哈曼和末底改一样，他冲着我走过来。瓦实提又绝望地喊起来：“这只是个比喻！”然而，谁对她都不屑一顾。以斯帖站在门旁，看着我，眼睛里含着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

我向后边走去，走向通往后廊的门口。亚哈随鲁猜到了我的打算，异常敏捷地拦在门口。哈曼和末底改各从一边冲我走来。我用一种习惯的轻松方式把手伸向衣服口袋。但是，太监的衣服上没有口袋，更谈不到手枪了。

随后，一阵刺耳的口哨声震天般响起来。以斯帖喊道：“警察！”人们一时惊呆了，开始是呆在原地不动，后来又转身就跑。瓦实提惊叫道：“我不知道！我向上帝起誓！”亚哈随鲁挥舞着他

的权杖喊道：“跑啊，同志们！”哈曼凶狠地看了我一眼，对我嘘了一声：“我们后会有期，奸细！”说完，他同其他人一道向前门跑去。这样，转眼之间，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整整一套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从脸上扯下面具，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听到特拉维夫警察局警监 S 的说话声。我估计，警察可能从前门进来了。我于是就转向后门，想通过花园逃走。但是，这所房子被包围了。如果说我不希望在这个地方，以这样滑稽可笑的打扮会见昔日的同事，那说得就未免太轻巧了。听到警察从这所房子的两个大门进来时，涌上我心头的惟一想法是，尽快换掉我穿的衣服。另一个房间里有个衣柜。我打开衣柜，把里边的东西很快查看一遍。我发现，里边装的衣服很少，而且都是女人穿的。只有柜顶下边的横杆上挂的一件雨衣，男女都能穿。我从挂杆上把雨衣拿下来。拿衣服的时候，我的胳膊肘碰到衣柜的后板。衣服虽然紧紧靠着墙壁，仍然发出空荡荡的声音。我伸出手指，很快把胶合板摸了一遍。胶合板滑到一边，露出一个像壁龛或者说像夹层那样的小房间。我的猜测得到证实。房间大小足以装一个人。我走进去，关上柜门，推上滑板。在壁龛里，我的手指碰到几件衣服。这次是男服，一件衬衣，一条裤子。

几秒钟之后，警察冲进房间，开始搜查。警监 S 用沙哑的声音指挥着这次行动。他们甚至打开衣柜，在里边乱翻一通，但没有发现这块秘密滑板。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的搜查，他们终于离开这个房间。这座房子最后又陷于一片沉寂。我等了一会儿，脱下太监衣服，把它和面具一起藏在壁龛里，穿上衬衣和裤子，从衣柜里走出来，开始查看警察们在这间屋子里留下的一片狼藉。

从警监向警察们高声发出的命令判断,我认为他搜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一台模板印刷机。印刷机没有找到。他就命令他们检查所有印刷品,书籍、报纸等等。我当然无从知道他们从书柜里拿走了什么。但是,留在书架上的书籍并没有暴露出房客的政治倾向。其中有维尔斯写的流行科幻小说,是由“米兹佩”和“施蒂伯尔”出版社出版的。^⑤还有几卷诗歌。我还发现新版的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作品全集。那是为纪念他五十诞辰出版的,在柏林印刷。出版单位是五十诞辰纪念委员会,协办单位是“施蒂伯尔”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书,漂亮的蓝色封面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心里想的是如何从这所房子里偷偷逃走。我翻看的那本书中有诗人的最新诗作,还有他翻译巴比伦文和希腊文的作品,包括悲剧《俄狄浦斯·雷克斯》。突然,一本练习本从这本书的一百零八页和一百零九页之间掉出来。我匆忙读了一下脚注。脚注说,坦木兹就是希腊的阿多尼斯,他是阿施托雷斯年轻的丈夫。阿施托雷斯每年下阴界,来年春天又回到人间。^⑥这个练习本的封面上写的名字是“艾里舍娃”。

我穿上衣柜里挂着的那件雨衣,偷偷溜出房门。我知道,从现在起,我就要提防在我之前从这所房子里逃走的那些人。

就我所见与所闻来看,街上阒无人迹,至少约哈南-哈桑德拉尔大街是这样。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走到花园的尽头,跳过篱笆,来到面对另一条大街的房子的花园。我考虑,是走依然喧闹的主要大街,还是就近穿过这时已空荡荡的开阔地。我最后决定,按后一种想法行事,因为我相信自己感官的警觉性,走开阔的空地比走喧闹的大街更安全。

在阿拉伯人聚居的苏梅尔村,我有些熟人,甚至可以说是朋

友。在如此晚的时候,通常是不便敲阿拉伯人的门的,但是在危险的情况下也是允许的。我一直走到卡梅尔大街尽头的梧桐树下,从那里穿过沙丘又一直往北走。一路之上,我遇到的惟一有生命的东西是豺和夜鸟。走近苏梅尔村时,狗开始大声叫起来。我感觉不到四周有任何危险。我又向西拐弯。走到穆斯林墓地时,我在一块墓碑上坐下来。我睁大眼睛看,竖起耳朵听,只有动物和鸟儿打破这里的平静,只有蝙蝠的翅膀在一幢无人居住的楼房里发出拍打的声音。四周尽是黄色的待宵草,招引着一群群萤火虫在黑暗中飞舞。

我走下海滩,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后边可能隐藏着人的岩石。突然,我看见两个人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向四周张望。我在一块岩石后边蹲下来。当他们走近时,我听到他们在讲阿拉伯语。我从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得出,那是阿贝德·埃尔·马吉德。他是雅法的一个歹徒,我不只一次审讯过他。我站起来,同他们打招呼,一只手仍插在雨衣的口袋里。他们相互惊奇地看了一眼。“您这位异乡人来到这里,身体还好吗?”马吉德恢复了正常的神态,客气地用阿拉伯语同我打招呼。我问他们在夜间这个时辰到特拉维夫海滩做什么。开始,他们说,只不过闲逛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后,他们瞎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赶骆驼的人在雅康湾附近的海滩上丢了什么东西。最后,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夜深,他们最好回到雅法的家里去上床睡觉。我让他们在我前面走。走近特拉姆佩多尔大街时,我悄悄溜走,直奔我的住所。我紧贴着住所的外墙转了两圈。一个人也没有发现。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在黑暗中侧耳细听,然后才开了灯。一切都和我傍晚离开时一样。我在手枪里装上子弹,放在我的头旁边,然后就在沙发上和衣而睡了。

注释：

①米母干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大臣。

②乔治·格罗茨(1893—1959),德国画家,尤以深刻揭露社会弊病的漫画闻名于世。

③贝拉·库恩(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他任主席。同年8月,苏维埃政权失败,他逃往维也纳。

④埃玛·戈尔德曼(1869—1940),立陶宛无政府主义者。1885年由俄国移居美国,在纽约州参加德国社会主义者会议,一直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

⑤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写有大量科幻小说和政治作品。

⑥坦木兹在阿卡德语中称杜木兹。他是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崇奉的生育之神,体现春季万物新生之力。阿施托雷斯也称阿斯塔特,古代近东地区崇拜的女神,专司爱情和战争。阿多尼斯则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深受阿佛罗狄忒女神的宠爱。阿佛罗狄忒受到阿多尼斯这个婴儿容貌的诱惑,把他放到一只箱子里,交给冥后珀耳塞福涅看护。后来,冥后拒绝将他交出。于是,她们两人向众神之王宙斯上诉。宙斯裁定,阿多尼斯一年分别同珀耳塞福涅和阿佛罗狄忒各呆四个月,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现代学者一般把他看成是植物的精灵,他的死亡和再生表示自然界的循环。

九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洗澡,听到房子外边有脚步声。我通过小窗子向外窥视,看见一个戴布帽子的人在向雅法方向走去。梳洗完毕,我走出门,四处张望。就在我要回来时,在我门廊的花盆里,我看见仙人掌的刺上挂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当心,你有危险。”经过一再仔细观察,我仍说不准纸条上的字究竟是男人的笔迹还是女人的笔迹。如果是米里亚姆写的,那我可就高兴了。但是,我过去从没有机会见她的笔迹,因而也就难以判断,那个认为需要警告我一下的人究竟是不是她了。

N毫无疑问很快会来拜访我,而我将不得不承认彻底失败。我难以完成我已经承担的任务。正如他们所说,“我的伪装暴露了。”还不仅如此。从现在起,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好像只这样还不够。我和米里亚姆的关系也给毁掉了,也许是永远不可挽回地毁掉了。

我从那个混乱的房间里拿出来的练习本,现在从我的雨衣口袋里露出来。我掏出来打开一看,每页上都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笔迹。我开始读下去。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头痛得很厉害,又感到恶心。

我病了吗？通过狭窄的窗户，一片低矮、灰暗的天空凝视着我，黑云压顶，倾盆大雨不停地向这狭窄的小巷泼来。如果我还在伊茨雷勒谷地，看到雨落到黑土地上，浇灌几周前播下的种子，我会高兴的。我会吸进这美好的气味，这大地复苏的气味，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那样，冲走那艰难苦涩的岁月，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来临。

而在这里，在也门人聚居区的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雨水在阿伦比大街上流淌，注入威海。

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我向外走去。但是，我还没有走到院子里的厕所里，就在门附近呕吐了。我大汗淋漓。我回到房间，又感到一阵恶心，比第一次更厉害。我开始回忆昨夜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扬克尔走进来，我高兴地迎接他。我们谈论我们对谷地共同的爱，只是我们被迫离开了那里。我们用令人不敢恭维的语言回忆 M 基布兹的成员们。后来，他出去买酒，买回后要我喝一口。我答应了，希望这样能消除从未停止折磨我的疼痛。

我记不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一个男人上了床。不，和两个男人。冲着扬克尔的耳朵，我真的喊“杜木兹”了吗？我在想，我内心里、我灵魂中的某些事，已经处于毫无希望、不可挽救的混乱状态。也许，我将在耶路撒冷的疯人院里了此残生。也许，比这更坏的事情还会在我身上发生。我要出去，到大街上去，去骂人。人们会诱骗我，对我为所欲为。

我能听到愤怒的大海在咆哮。我可以想像，大海现在是什么样子：狂涛巨浪从岸边向地平线翻卷而去。

一种巨大的力量从下面把浪涛向上托起。这些浪涛一撞着云彩,就四处飞溅,形成泡沫。有那么多泡沫。

我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要下海去,置身于海浪之中。海浪会撞击我,拍打我,然后紧紧拥抱我。这是最后一次拥抱,既有力,又轻柔。吃力地呼吸两三口,一切就都玩完了。我想,这是我现在要采取的最正确、最理智的举动。

如果我不久真的这样做了,上述文字就会成为一个年轻女子自杀的记录。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我把自己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历史写下来,把自己一次又一次掉进的陷阱写下来,对我来说,也许事情就变得清晰了。而现在,在包围着我和包含着我的昏暗画卷中,正如同在我眼前立起的一面镜子一样,这些事情是看不清楚的。已不知有多少次,我都想清理一下自己,评估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然而都失败了。我的思绪在没有任何秩序地到处漫游,同我迷惘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总是依然如故。很显然,那些指责我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的人是对的。把这些写下来,就不会像在头脑里那样,事情的脉络就清楚了。

我在心眼里,如果有心眼的话,审视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岁月。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以前做的所有决定都是错误的。如果我相信有上帝,我会指责他对我的命运不公。但是,可以这样说,我是个义务间谍。那些决定都是我作出的。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我没有作出自己的决定。决定是他们为我作出的。这很可能是我很大的、致命的缺点。

我和阿里耶堕入爱河。大约在两年半以前，我们初次在基布兹相识。那也许真是“天意”。他对我的爱的回报，简直是个奇迹。但是，我留在巴勒斯坦，没有同他和他的代表团成员一起回俄罗斯，这并不是我作出什么决定造成的，而是我办事犹豫不决和天真的结果。我应该明白，要阿里耶取消返回苏联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我还应该明白，我这方面任何怀疑的表示，哪怕是一点点，都会被他看作是不忠。当我敢于就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和平的阿拉伯农民进行残酷掠夺的论题提出质疑时，我早已注意到他对此作出反应的方式。我更应该意识到，深刻地、深刻地意识到，有一个伴随着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影子，即布鲁里娅的影子。我应该明白，一个女人要想取得一个男人的欢心，就要利用一切机会把他抓住。我回到基布兹时，看到阿里耶和布鲁里娅从克里米亚的集体农庄寄来的相片。他们抱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在幸福地微笑。那个孩子本应该是我儿子。

我没有作出离开这个基布兹的决定，但我不能留在那儿了。留下来的成员们，不仅对阿里耶的背叛感到吃惊，也对他把这个基布兹的漂亮女孩子带到俄国去感到震惊。我像个受伤的小鸟一样留下来，既招惹人们的敌意，也使人们对我悲惨的命运产生幸灾乐祸的感觉，我的那些女伴更是如此。

一个年轻女子来到特拉维夫，正如人们所说，她几乎一无所有，只有肩头披着的衣服。还有她那把小提

琴，这是我经过多次激烈争吵后从基布兹那里弄来的。她准备做任何工作。但是，没有工作可做。这个姑娘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确实，这里有大量失业者。但是，根据人们所说，几年前的形势比这更糟糕。也许我患了妄想狂症。我不禁想起，基布兹那儿的某个人，曾对城里这儿的某个人说过，说我是红色间谍、叛徒的情妇。把我留在巴勒斯坦是为了鼓动工人移居俄罗斯。也许某个人忽发奇想，说看见我穿过特拉维夫大街，在向停泊着一艘俄罗斯轮船的雅法港走去，像个穿着杂色服装的哈梅林吹笛手，边走边拉我的小提琴，而在我身后则是一长串希伯来工人。

最终结果是，这位姑娘付不起房租，几乎买不起吃的东西。她无可奈何，只好带上小提琴到大街上去演奏。大部分过路人是随便听几声，耸耸肩膀就走了。有一两个人用下流的眼神看着我，摇晃着手里的硬币。我闭上眼睛，继续弹奏。在我睁开眼时，我看见 M 在我的小提琴盒里放了一镑钱，他冲着我和蔼地微笑。我跟着他走了。

在上一段的中间部分，我改用第一人称。但谈到我和 M 结婚的问题，我必须用第三人称写。现在，对我来讲无疑再清楚不过的是：答应他求爱的不是我，同他一起去埃及的不是我，和他一起站在婚礼彩篷下的不是我，在豪华旅馆的大床上躺在他身边、被压在他身下的不是我。现在，整个情节对我来说就像一部毫无意义而又过时的电影。但我依然对他抱有强烈的负罪感。M 毕竟用他的方式爱过我，并想使我快活。我确

信，要不是杜木兹出现，我本来会继续住在雅法边上那座漂亮的房子里。世界上大部分男女毕竟不是为爱情而结合。习惯有其自身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力量比情感的力量还强大。

我不能描绘我遇到他时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这种状况。由于确切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将只叙述事实。全部事实。如果我决定按我的意图行事，我将把这个练习本烧掉。

他初次接近我是在纳哈拉斯—本杰明大街。我知道他叫犹林。我也知道他的名气。因此，我不感到惊奇。还不只如此。我早已注意到他，他从罗斯柴尔德大街的拐角处起就一直尾随着我。我知道他想勾引我。我早已作好回答各种问题的准备，以应付他可能施展的花招：如果他问我方向，我说什么；如果他问我时间，我说什么；如果他问我背着的小提琴盒子，我说什么。

他没有问这些问题。在蒙特费奥利大街拐弯处追上我时，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当时甚至并没有感到过于吃惊，因为我不知在哪儿听说过或读到过，像他那样的唐璜式的风流荡子，在接近他想勾引的女人之前，是先要准备好“家庭作业”的。我没有理他，继续用同样的步伐向前走。随后，他就喊我“耶莉”。

如果我说我对此感到吃惊，吓了一跳，非常惊讶，那我就等于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感到我的脸色变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胸腔里，也许是在我心中，颤抖得

很厉害。我的肚子在收缩。“耶莉”是爱称，是阿里耶在我们最亲昵的时刻在我耳边悄声呼唤的名字。

“你和……他有联系？”我装作结结巴巴地说。

“继续走吧，”他说，“我要让现在看见我们的人都认为，我在使劲追求你。”

“你并没有使劲追求我。”我愚蠢地低声说。

“我打你的主意远比这更……严肃。”他微笑着说。

我闻此吓了一跳，吓得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留在巴勒斯坦是件好事。”

我内心里有种傻里傻气的东西好像在说：自打发现他尾随我开始，我一直在期待着什么。而他最后这句，也许预示我期待的东西就要来了。现在，我相信，从他同我讲话那一刻起，也许比这还要早些，我就准备同他谈恋爱了。在他叫我“耶莉”时，他在我心灵深处就同阿里耶合二为一了，他们俩变成了一个男人。这也许只是一个借口。像我这样的女人，不能以被人爱为满足。我也要去爱。我爱别人和我被别人爱，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交叉，这难道就是我的命运吗？

“我知道，你留在巴勒斯坦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从政治上讲，你和我们是一起的。”

我点点头。犹林接着说：“我知道，你当初经历了一些磨难。我也知道你是如何、为什么结婚的……”

看来，整个这一时期我并不孤立！一方面，我感受到温情，也许是感激之情，而另一方面，我产生了一股子怒气。“如果你，你们的人，知道我像一条狗一样被丢弃在特拉维夫，你为什么不能伸手帮我一把？！即使不伸手，至少也该伸一个小手指头啊！”

“这是个策略问题，”他说道，冲我温柔地一笑，“至关重要的是，没有人把你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竟认为你对我们怀恨在心。但是，我希望你懂得，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们是会向你伸出手来的。”他拉住我的胳膊，热情地握着。

“我的婚姻……”我几乎说不出下边的话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你做的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是从历史的革命的观点出发看问题，”说到这里他又笑了，“我们都生活在困难的条件下。你也许知道，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个土耳其皇帝一样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什么都没说。他继续说：“你所知道的我的一切，你曾听说的我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面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个面具。如果你不想这样谈下去，我就要走了。我将永远不再接近你，而这次会面就当从没有发生过。”

“我在听着呢。”我说道，落入他的圈套。

“我简单说吧。在巴勒斯坦爆发一场大革命，扫尽帝国主义政权及其代理人，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他环顾四周，飞快地说：“我们不要求你登上街垒。你不必改变你的任何生活方式。相反，重要的是，你要继续像结婚以后那样生活。这样，你就能为我们的事业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你还有时间把这个问题思考一下。不久，有人会来拜访你。如果你决定拒绝按我说的办，你只需告诉他，回答是‘不’。我就不再打扰你了。”

突然，想到再也不能见到他，我感到难以忍受。

他向左拐，走进卡里舍大街。我则走进音乐学院。

当轮到我演奏时，我拿起小提琴，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的《传说》。^①这个曲子我过去从来没有演奏过。只要我能把演奏的音符配上歌词，就会忠实地表达我现在的感受。但是，歌词是一回事，声音是另一回事，而情感状态又是一回事。

回过头来再看事实吧。我演奏完毕，场内鸦雀无声。几秒钟后，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不是通常的礼节性鼓掌。我的老师拥抱我，热烈地吻我。

那个夜晚，我回报了丈夫的第一次暗示。我闭上眼睛，好像看见了犹林晒黑的面容和高高的颧骨。M的头几乎是全秃了，但我的脸还能感觉到他的毛发。事过之后，M温柔地亲吻我，建议喝杯酒表示祝贺。他从房间里拿来一瓶酒，我喝了些甜的和烈性的，味道很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许，这酒使我回到了现实。也许，就是这使我相信，本－拉菲尔给我喝的酒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一些天过去了。在夏季炎热的日子里，在特拉维夫大街上散步简直就像进入噩梦。每走一步，你浑身上下就大汗淋漓。尽管这样，我没有乘出租汽车和马车。我每天都沿着纳哈拉斯－本杰明大街同样的路线步行。每当我走到林荫大道拐弯处，我就陷入可怜的境地。他没有出现。对我来讲，我不会在那里遇见他，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事。我没有去音乐学院。用沾满汗水的手弹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从我遇到他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在上午还是在下午，在傍晚还是在夜间，我们都在一起。我在太阳下和他讨论各种问

题，从纯属私人的问题到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总是聚精会神和同情地倾听。当我讲到痛苦的、令人心烦的事时，他总是用胳膊搂着我，并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天早晨，我听到卖冰人的铃声在响。在通常情况下，艾哈迈德总是走出去，把他领到后门，肩上扛着两块冰。他把冰放在厨房里，打碎后把冰块放在冰盒里。

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艾哈迈德没有出去呢？我担心艾哈迈德不在家，我们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没有冰用了。我跑出去了。卖冰人依然停在房子外边。一看见我，他就把铃铛高举在头顶，好像在打招呼一样。然后，他又摇起来。他头戴皮帽子，身上围着红色的胶皮围裙。

当我站在他旁边时，我才发现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卖冰人。他站在我对面，手拿冰镐，眯着他那黄得发绿的无睫毛的眼睛盯着我。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原来那个卖冰人怎么啦？”我打破窘状问道。

“戴维到别处忙去了。今天，每家都会买两份冰。”他操着波兰的加利西亚口音说。

“是的，今天天气热，”我说，“就连我出生在本地的丈夫都说，他记不得有这样热的天气。”

“过几天会热得更厉害。”他一边说，一边发出令人奇怪的暗笑，两只眼睛变成了两道黄色裂缝。

我没有回话。我想，房间里要凉快得多，因为房子的墙壁很厚，这是阿拉伯的建筑风格。我等着他把冰

块从车上搬下来。

“最热的天气在8月中旬。”他说。他用拿着冰镐的手使劲一挥来加重他说话的语气。随后又是一阵沉默。他仍在盯着我。

“8月份一到，你所有的冰恐怕都会化。”我打趣说。虽然我的不安的感觉一直在增加，我还是鼓起勇气，叫他到屋里来。

“那么，耶莉同志，你要多少块冰呢？”啊，这就是那个人。“是的，是他派我来的，”他说，“要多少冰呢？”

我多么想在脑门上放块冰啊。在这当儿，我说：“要两块。”他把冰扛在肩上，我们就进屋了。在厨房里，他一用力，几镐头就把冰块打碎，把碎冰块储存在冰盒里。然后，他对我说：“有一套房子在伯思－哈绍埃瓦大街六号，一层，右边，褐色门，没有门牌。你要明天六点赶到那里。这是钥匙。”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冰凉、潮湿的钥匙，递给我。我急忙把它藏到安全的地方。

一小时之后，艾哈迈德兴致勃勃地回来了。他讲述了特拉维夫－雅法路上示威游行的情况。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事。当然，我也不关心这些事。

傍晚，我丈夫下班后回到家里。我们坐下吃晚饭。我们谈论炎热的天气。他也谈到雅法路和布斯特罗斯大街上发生的示威游行。突然，他说道：“明天，你就再也不会受这炎热天气的煎熬了。明天，我们到黎巴嫩舒夫山中的阿莱去吃饭。”他看着我，咧着大嘴一笑。

食物卡在嗓子里，我咳嗽起来。M给我捶背。我

假装由于咳嗽而不能说话。同时，我焦躁不安地在想取消这次旅行的好办法。“我已经订好车了，”他说，“你该相信吧，真不容易。许多阿拉伯人，相当多的犹太人，今年都要去黎巴嫩山中。”

“我觉得我肯定是感冒了，”我说，“这咳嗽……”

“那是因为你吃东西引起的，”他安慰我说，“食物卡在你的气管里，已经出来了。我好像已经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的阳台上，脚下小溪中清澈的流水在汨汨地流淌，凉爽的微风在茉莉树丛中吹拂，我们面前摆放着许多冰激凌……”

我于是想，只要我去过黎巴嫩纳凉避暑，在走向永恒凉爽的路途上，我最近也许就不必再去冰凉的海水中游泳了。

“可是，明天我去音乐学院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丈夫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们不是已经放暑假了！”

“是的。但是，从国外来了一位重要客人，一位音乐家。一些学生要去为他演奏。”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当时还没有肯定。今天上午才定下来。是有人来告诉我的。他还帮我把冰搬进来了。艾哈迈德当时不在。”

“我们可以推迟这次旅行，”M说，“无论如何，办公室也要关门。我要去听你演奏。”

“人家要求我们不要带任何人去。人家不要听众，只允许那位客人、我的老师和弹奏乐器的学生在场。”

我记得,在气管通畅之后,我还故意利用咳嗽来拖延时间,我曾考虑,是否以感到恶心为借口,取消这次旅行。但是,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也未免太残酷了。M可能会认为这是怀孕的第一个征兆,因为他急切要我为他生个孩子。我不能这样残酷地对待他。对只希望你得到幸福的那个男人,你的欺骗和不忠应该是有限度的。只要我以此为借口,M当然就会同意我那个晚上不跟他一起上床睡觉。而在第二天,他也许就不跟踪我、监视我。只要……只要……只要……我短暂生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像这样的“只要”。

第二天五点半,我离开家。M不在家。我先去伊甸园影院,然后租了一辆马车送我到阿伦比大街和格卢曾伯格大街拐弯处。下车之后,我走得很慢,一是为了不要到达那套住房太早,二是为了不要引起人们的怀疑。由于对地下工作和秘密约会没有经验,我感到,我的脸上和身上好像有些奇怪的东西在引起行人的注意。每过几秒钟,我就转过头来向四下看一看,以便弄清楚确实无人跟踪我。似乎没有人对我产生格外的兴趣。天气极度潮湿和炎热,连那些最不守礼法的人显然都难以忍受。实际上,我这种看法错了。至少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走的每一步路。

我的手颤抖着从手提包里拿出钥匙。钥匙在褐色门上的锁眼里转了两圈。我走进房间,里边几乎是空空如也。一间屋里支着一张床,另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人们在几英里之外想必就能听到我的心跳声。

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门打开，他来了。我所知道的是，一看到他那青铜色的脸膛，我简直就停止了呼吸。我是在盼望他拥抱我吗？我不记得了。他同我一握手，好像就把我的整个身子都抱住了。身上是真的在流汗？还只不过是我的想像？

我们坐在椅子上。他说：“我早就对你说过，犹太人的伊休夫只知道我的一面，不重要、不严肃的一面，但这一面却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我完全相信，在特拉维夫，谁也不知道，他们认识的那个叫扎哈利亚·犹林的轻浮男子，在使用另外一个名字，穿着不同的服装，在巴勒斯坦农夫和贝都因人中间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我想告诉他，我高兴的是，和他秘密同居的所有女人，只不过是得以不时消失的借口。我相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和这个或那个女人住在一起，也就没有人问他究竟住在哪里，他一直在干什么。现在，我感到，他那巨大的吸引力在增长，几乎已到令我无法控制的地步。同时，我对这个人很敬佩，因为他在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追求理想，而我也抱有同样的理想。

“我可以知道你的另一个名字吗？”我问道。闻此，他用锐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说：“杜木兹。”

杜木兹将属于我。整个都属于我。其他女人在杜木兹身上根本没有份儿。

杜木兹接着说：“最近，我有一种感觉，我必须更加谨慎。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我从一个阿拉伯人变成一个犹太人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那个肮脏的农夫脱下

他的阿拉伯长袍，穿上他那熨得笔挺的裤子和洁白无瑕的衬衣。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我一把。”

“我能帮你做什么？”我问道。

“你丈夫在雅法－特拉维夫路上有间办公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进出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后边有一间作为储藏室用的小屋。如果你给希梅克……”

“希梅克？”

“就是交给你这个房间钥匙的那个卖冰人。如果你能把雅法这间储藏室的钥匙交给他……”

“我会拿到的。”

“谢谢你。”他站起来要走。

“我们会……会再见面吗？”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美好的时光就在眼前。”他说完就走了。

我极为惬意地回到家里。但是，一看到丈夫脸上的表情，我就明白，一切都完了。他从不知道如何掩饰他对我的感情。他直冲着我的脸说道，他一直跟踪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否认，但是他不相信我说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说，那天晚上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我不在乎。在那个时刻，我所注重的是，我悲惨地失败了。杜木兹永远也别想再见我了。这时，忽然有一个想法提醒我：我丈夫也许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他会把谈话内容报告当局。我要设法使 M 告诉我，他打算怎么办。但是，他却变得像狮身人面像一样，沉默不语。

我要挽救我们的爱情。但是怎么挽救呢？通过卖

冰人挽救？但这个粗俗的家伙只会使我不寒而栗。一想到他听我讲话时用眯细的眼睛看我的那个样子，我的内心就变得冰凉。不！无论如何，我要去见杜木兹本人。在我们见面时，我要告诉他，对他来讲最好的办法是，促使我丈夫怀疑我们之间的接触纯粹是性爱关系，而和政治毫无关系。现在，我认为，我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决定，部分是出于一种幼稚的希望，即我的婚姻破裂，会使他改变对我的看法，认为我远不只是一个挽救人类悲惨命运的工具。

第二天早晨，我一听到远方的铃声就知道希梅克来了。我偷偷溜出家门，来到旁边的一条街上。我截住他，告诉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还告诉他我想紧急约见犹林。他眯着眼睛惊愕地看着我，将冰镐猛地砍在一大块冰上。他说，他第二天就给我带来消息。

翌日早上，我带上阳伞，跨过马路，走到隔壁那条街上去见他。他向四周张望一下，用眼睛盯住我，好像我是个坚硬的冰块。然后，他从他那翘起的牙齿的缝隙中挤出一句话：犹林当天晚上八点钟在穆斯林公墓旁的海滩同我相会。

海滩上挤满了一对对情侣。从罗森费尔德区到穆斯林公墓，到处都是谈恋爱的情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的躺在地上。我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一些男人，特别是一些阿拉伯男人，发现我后就冲我走来。走了一会儿停下来，然后又折了回去。我怀疑有人可能跟踪我。但是，一想到要同自己的心上人相会，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置之脑后了。

这时，犹林从一块岩石后边冒出来，冲我走过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拥抱他。我悄声告诉他，我丈夫在跟踪我，发现了我们相会。我还告诉他，我们必须假装是情人。他紧紧抱住我，吻我。那一吻，像过电一样，直通到我的脚趾尖上。我闭上双眼，准备躺下，就在沙滩上同他做爱。我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激情。突然，好像有些话通过薄雾传到我的耳边。我听他说：“什么人吹口哨？”他从我身边一跃而起。紧接着，我就落在一个黑人大汉像铁臂一样的怀抱中。同时，有个硬梆梆的东西塞进我的腹腔。杜木兹躺在沙滩上。我听到我丈夫在叫喊。这时，那个黑人把我放开了。我用尽平生的力气向杜木兹摔倒的沙滩上跑去。但是，他早已不在那里了。

我很害怕。我怕那个黑人，怕我的丈夫，还怕那个卖冰人。我没有回家。我去了雅康大街的一个旅馆。第二天，我回到基布兹。但是，那里有一种不同形式的死亡在等待着我。那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想到另一个基布兹去栖身。但是，经过一些不值一提的变故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月，很难离开我住的这个窝儿。也许，我本可以移居到其他城市。但是，对我来讲，惟一重要的事情是见到杜木兹，并且告诉他，我没有背叛他，我只是失败了。然而，他不见了。我不敢向人打问他的下落。我所能得到的回答，不过是一个淫荡的微笑。也没有地方去找希梅克。冬天来了，没有人需要买冰了。

我翻阅我写的这些东西,发现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并不比我以前知道的多多少。我只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把发生的事件记录了下来。我失去了我的第一次爱,我又失去了我的第二次爱,我失去了我的丈夫,这全都是我自己的过错。

现在,我所要做的事,就是烧掉这个练习本。但是,我诚心实意地希望,他能看到这个练习本,并从中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这个希望,也是一个垂死女人的最后一个希望,却没有机会变成现实了。

雨差不多快停了。狂暴的大风变成了轻柔的微风。我想像得到,大海看上去也肯定不一样了:浪涛想必在退去,白色的浪花想必渐趋平复,变成一圈又一圈蓝色的水纹。这使我更容易走进去。

那真的是熟悉的铃声吗?那是不可能的。铃就在我心中。我曾在书中读到,某种狂癲症的症状是:你听到的是本来不存在的声音,决定你生命历程的声音。

注释:

- ①亨利克·维尼亚夫斯基(1835—1880),波兰小提琴家、作曲家。

十

在阅读写在练习本上的这些东西时,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某种纠结在我脑海中的怀疑情绪。读完之后,我才知道这种怀疑情绪是什么:那些要自杀的人留下的遗言往往是简短的。这些遗言总是要说明,其写作者为什么不能继续活下去,并经常要求周围的人原谅他们。但是,摆在我面前的这份遗言却是个自传!此外,令我烦恼的还有一点:由于很明显的理由,写作者想把这本练习本烧掉。既然如此,它又怎么被丢到了哈-亚沃达大街上呢?

另一方面,她非常率直地谈到的那些事实,大部分已由 M 单方面所证实。很显然,M 不肯向我吐露,艾里舍娃离开他之后究竟出了什么事,更不会说她自杀的问题了。

关于这一点,我又想起一个不同的问题:我怎么没有听到这位年轻女子自杀的消息?经验告诉我,溺死者的尸体迟早会被冲到海滩上,最多需要一两天时间。如果她的尸体也被冲上来,报纸上一定会有报道,人们也会谈论。

一个资深警察总是这样想:他审问的对象在撒谎,或者说,至少是没有说实话。而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悄悄地说:我也要用一副怀疑主义的良药,尽力把这本练习本处置好。而怀疑情绪一旦进入你的脑海,在那里扎根,就会像细菌一

样,立刻开始分化和繁衍。我很快就发觉,自己已迷失在怀疑情绪的迷宫里。我开始这样想:是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差不多是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我引向花园的小径,而我看到和读到的一切,都是人们玩弄、欺骗我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才是在哈—亚沃达大街上举行的那场怪诞的狂欢活动。

我当时记得,同艾里舍娃的故事有关的某些情节,从我的记忆中一件件冒出来,但我没有其他消息来源加以证实。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在1929年雨季开始的时候,在艾里舍娃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天,我并不在特拉维夫,而是在内盖夫,正参观一个贝都因部落。这个部落的酋长有好几个妻子。几年前,其中一个妻子从营地里走失了。我曾帮助他将她找了回来。这次来参观,正值酋长许多儿子中的一个要结婚,他盛情邀请我参加婚礼。婚礼的庆祝活动延续了十天。庆祝活动结束后,我又受酋长之请,继续在按照我的要求搭建的帐篷里住下去。这不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冒犯主人,而且还因为,那时我刚刚被警察部队免职,留在这里,我就可以远远避开特拉维夫那些熟人们的眼睛,尤其是可以不听他们嚼舌头。另外,由于我计划搬进去住的特拉姆佩多尔大街和雅康大街拐弯处的公寓原来的房客还没有走,我留在这里就更方便了。

婚礼庆祝活动结束的那天,天开始下起雨来。贝都因人把雨水看成是吉祥的兆头,是上天对他们祈求的回答。因此,他们又宰了一些羊对雨水表示欢迎。婚礼的仪式对我来说很新鲜。部族的吟诵者唱起歌,歌词的内容我简直一点都不懂。女人们跟着嗥叫。酋长的一个儿子悄声对我说,有一个帐篷举行活动,部族里的一个女孩在里面跳舞,不允许男人观看。女孩跳的什么舞,他没有详谈。如果我仔细听,我倒能听见伴随她跳舞的音乐声。我询问他举办这种仪式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让他复活。”他用阿拉伯语说。

“谁要复活？”

“冬天，雨水。”

“他什么时候死的？”

“夏末死的。”

“他是怎么死的？”

“他们把他杀死了。”

“谁杀死他的？”

“他的哥哥和姐夫。”

“他们为什么杀死他？”

“这样，一切东西都会干枯。他是恶魔，是沙漠之王。”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赛提。”

我没有听清这个名字，有些吃惊地问道：“西塔？西克斯？你的意思是第六天，星期五？”^①

他看着我，好像没有必要向我解释这样的事。但是，我仍想刨根问底。

“他是怎么复活的？”

“靠那只鸟。那只大鸟。那是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是只鸟？”

“不是。”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竟一再询问那样最愚蠢的问题。“他的妻子是人。为了拯救他，她装扮成一只鸟。”

“那她怎么拯救他呢？”我继续追问。他告诉我，这个女人走到河中，发现上帝尸体的碎片。她用她的长喙将碎片从水中捞出来，又拼凑在一起。“看，我的好兄弟，”他指着那水流如柱的大雨说，“这是留在他身上的水。我们的羊群会有水的，羊群会生存下去。我们也会生存下去。”

我又在这个部落住了几天。在此期间,我的体重想必又增加了几公斤。最后,我对酋长一再表示感谢,对他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部族一再表示祝福。我请求他恩准,让我回家去。酋长一再恳求我多住几日。我向他保证,次年雨季开始的这个时节,我一定回来重新领略他的好客之情。直到这时,他才同意我离开。第二天早晨,他给我准备了一匹好马,我飞驰到加沙火车站。在此之前,我曾多次骑马穿过内盖夫沙漠。但是,我的坐骑奔驰的蹄子并没有扬起云状的沙尘,这还是第一次。

我回到特拉维夫时,雨仍下得很大。在火车站,我碰到警官 K。他曾在我的手下供职。那是在比亚利克大街警察所。他对我离开警察部队表示深切的、诚挚的惋惜。我问他当前有什么新闻。在内盖夫小住期间,我对国内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听到。他告诉我,在特拉维夫和其他地方,警察们主要忙于追捕共产党。凡是抓到的,二话不说就逮捕。有些共产党人已被遣送回原来的居住国。其余的都迅速地隐藏起来了。后来,他还告诉我,托管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来保证国家安定和警察部队重建。他说:“他们把锡兰警察部队的头头调来了。那是一个名叫 D 的警官。他以正派和公平著称。大家都希望他采取更均衡的方针,重新组建这支部队。天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回到我们这儿来?”我很同情 K,因为准备接替我的工作的 S 检察官总是欺负他。

“现在还不行。”我回答警官 K 说。我还婉转地提到我想当私人侦探的想法。

“想当夏洛克·福尔摩斯,嗯?”他吃吃地笑着说,“可是,他是个有钱的英国人。他不是靠做侦探来谋生。他干这一行只是一种爱好。到末了,你就会只限于探听通奸女人的秘密。你是不可能以此为生的。在这里的犹太人中间,更不可能。”

“我只能试试看。”我说。

“你为什么不从侦破漂浮上衣一案开始你的私人侦探生涯呢？”

“那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过的案子吗？”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发生在这里的漂浮上衣案件，那你想必一直住在无人的旷野里。我建议，你明天去食品店买鲱鱼的时候，请老板把鲱鱼包在前几天的报纸里。报纸上尽是这方面的报道。”

“你知道，我是不吃鲱鱼的。我喜欢吃香肠。”

于是，他就把这个案件当作故事给我讲述了一遍。前几天，一件褴褛不堪的上衣被海水冲到海滩上。这种上衣是劳工营成员或者是劳工营创建的基布兹成员爱穿的。上衣上挂着一片带有人名缩写字母的布条。上衣的口袋里还有一张字条。由于海水浸泡，字条上的大部分字母变得很模糊，字条的内容因此也就很难确认了。据调查人员推测，字条是自杀者的遗言。但是，至今也没有见到有尸体从海里漂上来。因此，案件一直悬而未决。

自从那次在火车站邂逅，我已有两个月没同警官 K 见面了。从漂浮上衣看来，这就是艾里舍娃人生故事终结的惟一佐证了。但是，现在又发生一件神秘的事，即尸体丢失之疑案。我决定去找警官 K 再谈一谈。

我住所外的大街上熙熙攘攘尽是人，特别是孩子。我记得，今天是学校为过普珥节放三天假的第一天。通向海边的大街上，特别是阿伦比大街上，挤满了化装的小丑和以斯帖王后。尽管禁止玩拿玩具枪射帽子的游戏，我听到四处还都是砰砰的射击声。不久，我发现有一个大家都蜂拥而去的地方，那就是去照相。

在阿伦比大街的尽头处，照相师凯普兰斯基在他的照相机

对面搭了一块很大的背景板，上面绘有以色列的风光：右上角是西墙，左上角是拉结墓，下端是一些拓荒者。^②其中，右边的人在锄地，左边的人在牧羊。背景板的中央是一个椭圆型的洞，照相的人可以把头从这个洞里伸出来。

然而，今天上午没有人需要凯普兰斯基的背景板。小孩们及其父母都涌向罗森费尔德区，因为那里的巴卢克照相馆老板搞了一种新花样，即用木头板当车身、彩纸板当车顶做成一辆汽车。这种车，用比亚利克新造的词儿来说，叫作“机动汽车”，是哈得孙敞篷车的仿制品，帆布车篷可以向后折叠。小孩子在车上操纵方向盘，得意的妈妈坐在孩子身边的木板上，巴卢克为他们拍照。

我穿过欢乐的人流，向博格拉绍夫大街拐弯处的药房走去。药房的室内有电话。我征得同意后给警察局打电话。我变换了自己讲话的声音，以防值班警官听出来是我。我要求同警官 K 讲话。警官 K 接过听筒后，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们曾在火车站相遇。K 没有回答。

“喂，”我说，“你还在那儿吗？”

“在。”他回答说。他说话的声调使人明显地听得出，他对我给他打电话感到很不高兴。

“我有个问题请教你，”我说，“是文学方面的问题。”

“我建议你去找作家协会。”他回答道。

“是关于俄国的一本书。我们曾谈到的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也许你还记得吧？”

“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说，在那部小说的某个版本里，果戈理曾提到，在外套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

“啊——”他终于明白了。

“你能帮我找到那本书吗？我听说锡安门图书馆有一本。”

“你是知道的，稀有版本是不让拿出去的。”

“这恰恰是我来找你帮忙的原因。即使不付押金，他们也不会拒绝一个犹太警察的请求的。”

“但是，他们可能索要借阅费。”

“如果他们要的话，给他们就是了。”

这次，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暗示。“我也许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他说，“只是借阅的时间要很短。”

“如果一小时内你能同我在‘啤酒桶’酒吧会面，我就招待你一盘腌鲱鱼和一杯啤酒。”

“我喜欢咖啡和糕点。不在今天上午，改在今晚七点钟。不在‘啤酒桶’，改在‘拉兹基’吧。那里是做文学交易的好去处。”我很快就明白了，K 掌握的情报，比我原先估计的还要多。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对此，他也许宁愿只字不提，因为担心检察官 S 对他更加怀恨在心。

当我要向药店老板付电话费时，他拒不收我的钱。“你最好买点这种新的治便秘的专利药品。”他说。

“治便秘？”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从你走路的样子和你双腿的状况看，很显然，我认为你骑马已经有不少年头。有许多时光在马鞍上度过的人，肯定大便干燥。这个瓶子里的药，只要用一勺，就保证你的症状会减轻。”

“我看很明显，”我反驳道，“你今年已经决定装扮成夏洛克·福尔摩斯了。那样的话，你就该将你的白大褂换成花格衣服，嘴里叼上个烟斗，头上戴顶猎帽。至于便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以斯帖记》中说过，要减轻症状和完全治愈，对犹太人来说，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办法。”

我情绪极好。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受到城里四处洋溢着

的节日气氛的影响。我在街上又逛了一两个小时。当太阳升到中天时,欢笑和叫喊的孩子们在街上越聚越多。今年的这个时节,天气格外晴朗,而在通常,普珥节期间总是下雨的。

戴面具和化装的人川流不息,越来越多。傍晚时分,孩子们要回家,而大人们则要穿上节日盛装去参加普珥节晚会。而仅仅在六个月之前,暴动的人们还聚集在哈桑-贝克清真寺,煽动者答应把犹太人的财产和妇女都分给他们。当时,这座白色海滨城市吓得像豪猪一样缩成一团。希伯伦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使每个人都不寒而栗。虽然多数人相信,希伯伦犹太人的命运决不会在特拉维夫重演,但社会上到处都充满担心和恐慌的气氛。现在,对那些时日的回忆似乎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毫无疑问,春天般的天气也助长了目前的节日气氛。这座城市及其居民蓬勃的活力,再次令我惊叹不已。特拉维夫的历史并不长。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全部从这里撤走了,这个城市的一些居民撤离后从未返回。在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大萧条年代里,又有许多人离开这里。现在,这座城市又繁荣起来了,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竞芳吐艳。

我在本-耶胡达大街最近开张的一家新餐馆用午餐。店主在人行道上摆了几张桌子。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新颖做法。我几口就喝完了一瓶美味啤酒,吃了一块叫“哈曼耳朵”的油酥糕点。这种糕点是女店主为过节特制的,既没有忘掉放罂粟籽,也没有忘掉加香料。只要口袋里有点钱,我总要到新开张的馆子先大吃一顿。不然,时间一长,顾客满意不满意,店老板就不关心了。

当我正考虑为酬谢这顿美餐该留下多少小费时,一只手拍在我的肩头。原来是 N。我请他坐下,给他叫了一大杯啤酒。“你为什么没有穿化装服?”我问道。

“对我们来说,今年的普珥节是5月1日。”他狡黠地笑着说。我还没有来得及领会他这话的意思——如果说他有什么意思的话——他又说道:“我看你今天情绪蛮好。我想,一定是解决疑案有望了。”

“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杯到嘴边还会失手。”我也采用他说话的那种方法,打哑谜似地回答说。很显然,N是只欣赏自己的俏皮话的那种人。他尖刻地说:“我想知道你到现在为止发现的一切材料。”毫无疑问,这是他的权力,因为我的花销都是由他支付的。

我告诉他,犹林还有一个名字,叫杜木兹。如果他还活着,还在这个国家,要想找到他,只有到剩余的共产党人中间找。我给他简单地描绘了一番哈-亚沃达大街那个夜晚的情景。但是,我没有告诉他那座房子的门牌号,也没有告诉他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

“在那三个到场的人中,有一个必定是他。”他说。我再次感觉到,N了解的情况比他告诉我的要多。我喝的啤酒太多了,春天般的阳光既舒服又温暖,我因而感觉迟钝,昏昏欲睡。“你必须在今后几天内找到他。”他站起来,冲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向雅康大街方向走去。

傍晚,我离开寓所,通过阿伦比大街去拉兹基咖啡馆。在那里,一些“欢闹俱乐部”成员围桌而坐,桌子上摆着一瓶瓶伏特加酒。从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我看得出,在这个普珥节,他们要搞一个恶作剧,一个空前热闹的恶作剧,把某人戏弄一番。这时,K穿着警服走进咖啡馆。他们都盯着他。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显然是要充当闹剧中对手方面的一员,早已把自己化装成警察,准备在演出时哄骗这伙人。这个人这时站起来,但脚跟没站

稳,向 K 那边倒去。他伸手要摸 K 的胡子,好像要把胡子扯下来。他宣称:“你不能愚弄我们!”但是,K 表情严肃,制止住了他伸在空中的手。他只好趑趄趑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K 向我走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一种阴沉的语调说:“在过普珥节,嗯?我不过普珥节。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吧。”他朝搞恶作剧的那帮子人瞧了一眼说。“那么,我就看守他们吧。”我匆忙叫了咖啡和糕点。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点什么东西,把手伸到桌子底下递给我。

我很快将他递给我的纸条塞进腰带里,走出咖啡馆,去后院的卫生间。我把纸条在手掌上展开。纸条上的字迹很模糊,大部分字母被水冲掉了。只有一个角上的两三个字依然可辨。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这是她的字迹。我回到 K 那儿。趁我不在,他已把糕点吃光,把咖啡喝光。我们走出咖啡馆,来到大街上。我悄悄将纸条还给他,问道:“尸体呢?”

“至今还没有找到尸体。”

“我很感激你。”我说。

“我想你知道,警察部队中有个人,他很想把你投入监狱。请你不必介意。”他说道。他说的那个人,也许是指监察官 S。

在每次案件调查中,都出现一种叫做“直觉”的要素。这一要素往往引导调查员采取某些步骤,但不知道为什么采取。侦探小说家通常不提这个要素,而总喜欢把主人公的行为放在推论的坚实基础之上。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直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推论或一般逻辑推理。还有某种直感,甚至能够把其占有者从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回到寓所时,我凭天性判断,趁我不在时,有人来过那儿。我绕着房子转了两圈,没有发现任何人。我走上通到大门廊的

台阶,看到门下塞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有字,是用一种奇怪的字体写的,好像是用右手写字的人改用左手写的。我念道:“到你以前去过的地方去。”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陷阱。我犹豫了许久。最后,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定按照纸条上所说的去做,换句话说,去回访哈-亚沃达大街上的那所房子。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我想,街上的狂欢气氛对我是会有帮助的。

我穿上褐色的阿拉伯长袍,裹上红色的阿拉伯头巾,戴上黑色的头箍。我把匕首别在皮带上,把装好子弹的左轮手枪藏在长袍里。

主要的大街上已挤满了狂欢者、工人和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先是成群结伙四处游逛,然后,各奔自己的目的地。资产阶级分子去巴拉蒂内饭店和其他正举行豪华的普珥节晚会的地方。工人们去俱乐部,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扫帚把”歌舞餐馆,去海滩和硅酸盐厂旁边的空地,一圈又一圈的人开始跳起霍拉圈舞。过一会儿,比亚利克肯定将在那里露面,发表风趣的讲话,并被一群群热情的崇拜者团团围住。

我想到米里亚姆。她出什么事了吗?根据共产国际发出的最新指示,她参加《以斯帖记》的演出没有?或许她被她的同志们赶走了。天知道她到底怎么啦?他们肯定怀疑她是蓄意将我带到那儿的,至少是指责她没有表现出共产党人足够的警惕性。就我来说,如果他们确实为我设下了陷阱的话,我的良心和我的情感都在催促我去看她。但是,我必须推迟到更适宜、更安全的时期再去。

从一些路人不友好的眼神判断,我认为,我的化装显然是成功的。我登上一辆犹太人赶的四轮马车。为使他放心,我用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讲的希伯来语向他道了一声“晚安”。他把我

拉到哈－亚沃达大街。

为提防各派人士可能保持警惕的“魔眼”，我把我的阿拉伯头巾拉到眉头，在脸的四周又围了一条红色的“流氓”头巾。我走下马车，小心翼翼地走近那所房子。房子里漆黑一片。我围着房子转了一圈，松开左轮手枪的安全制动器，走了进去。

我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房间里还是原来的样子。警察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但没有人整理。我把整座房子彻底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我进行调查的东西。像老鼠走进扑鼠器一样，我走进壁柜，进入那个小房间。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我用手电筒把各个角落照了一遍，我又一次感到，有人曾在这里躲藏过，或者有人曾极力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某人曾在这里躲藏过。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究竟什么时候有人来过，也没有迹象说明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曾来过的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把壁柜里的衣服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穿过这些衣服的那个女人，既不属于拓荒者，也不是来自工人阶层。这些衣服，很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太太进出人世间最高雅的场所时穿用的。

我从壁柜里走出来，开始清查书架上的书籍。我把书本拿起来，一本一本地把上面的尘土抖掉。其中有一本是画册，印的是凯特·科尔魏茨的摄影作品。有些画页已经被剪下来了，装上镜框，挂在墙上。我摘下其中一张照片仔细查看。整个画框很厚，即使把衬在照片后边极厚的胶合板考虑在内，也还是太厚了。我把画框翻过来，在后边捅了一个洞。我发现，在胶合板和照片之间夹着一叠纸，纸上写着一行行字。毫无疑问，那本练习本上的字迹和这些纸上的字迹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只不过这些纸上的字迹更整齐一些罢了。我把墙上的其他照片也摘下

来,去掉框子,将夹在里边的纸页收集在一起。我把这些纸页放到裤兜里,把头巾扎在脸上,扣紧左轮手枪的扳机,走出房子,来到大街上。突然,我停下来。两个“真正”的流氓,带着子弹顶上膛的手枪,从梅尔科特大街拐角处冲我走来。他们命令我举起手,我飞快地闪到一边,躲在拐角处石墙的后边。我也掏出了我的左轮手枪。“那是真枪!”他们之中的一个喊道。另一个则叫喊:“他是真正的阿拉伯人!”

“人不可貌相,”我说,“在普珥节期间尤其如此。”

他们撒腿就逃跑了。我没有追赶他们,而是进了谢恩金大街一座房子的大院。从那里,我径直穿过布伦纳大街、贝尔福大街和玛泽大街。没有我被跟踪的任何迹象。我从脸上拿下头巾,走进基姆科家庭旅馆。

基姆科夫人坐在柜台后边看报。我走上前去。她看到我吓了一跳,也许是有点大吃一惊。但是,她立刻镇静下来,用阿拉伯语说:“你好,先生!”我扯下我的假胡须说:“晚安,基姆科夫人。”她很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改用希伯来语抢着说:“这里没有普珥节晚会,先生。”我回答道:“我不想参加普珥节晚会。我需要一个房间。我自己用。”

“两镑十先令。”她说。“不会有人打搅你的。”她眨巴一下眼睛又补充一句。她也许是在给我使眼色。

虽然房价太高,我也没有再同她讨价还价。我拿了六号房间的钥匙,走上楼梯去二层。这个旅馆客人很少,这种情况太符合我的要求了。

房间很大,有四张床。我锁上门,搬了一张床顶住门。窗子对着庭院,那里有旅馆的库房。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可以从窗口跳下去,跳到库房顶上。但是,从周围情况看,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搅我。我坐在桌前,打开桌上的台灯,开始阅读带来的东

西。

我在这里发现了我的练习本。这是大奇迹中的一个小奇迹。我曾想烧掉它，但是火柴让雨水弄湿了。它同我一样得救了。现在，它和我都来到这座可爱的房子里。

我披阅我在练习本里就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写下的一切。说实话，将那一切都写下来，并没有把我并不懂得的东西都教会我。它所教给我的，是使我的思想有条不紊。从不只一种意义上来讲，这本身是重要而有价值的。我希望我这样讲并非不谦虚。无论如何，我现在要从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讲述我的故事。

我离开那个房间去海滩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个奇迹。那一切，没有别的语言能描述。我希望，我能准确地将那一切叙述出来，当然，如果我还能记起来的话。甚至在当时，在我坐在那本练习本面前时，我就下决心只把事实写下来。既然我现在披阅了我过去写下的东西，我认为，我一直没有将自己的决心实现。显然，实现是不可能的，也许确实没有必要。也许，决定人生进程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客观现实的内在反应，而不是外部情况。我这样说是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我希望同志们饶恕我。

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穿着褴褛的睡衣和木底鞋出去了。在睡衣外边，我又披上那件从基布兹带来的破旧的打补丁的外衣。我记得，我当时心中思量，在去

大海溺死的路上，还披上一件外套防止被雨水打湿，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当然，这也许是我确实不打算走这条路的一种征兆。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并且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小巷空旷无人。雨又大起来。如果不是不得已，这时无人出门。我听到身后有铃声，我不禁发起抖来。原来，走来的只有那个卖煤油的人。也许，所有赶车的人都有同样的车铃。我看到，他坐在位子上，身上裹着一种防雨披肩，头上顶着个麻袋。

我走在阿伦比大街上。这里倒是还有些人。一辆公共汽车驶过去，车轮下污水四溅。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些乘客在盯着我这个女人：赤着双脚，穿着无帮的木底鞋，正在雨中赶路。于是，我竖起外衣的领子，把脸遮住。我这样做不是为了防雨，而是在防人们的视线。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认得出我，知道我就是很久以前经常手拿小提琴步行去音乐学院的那个高雅女人。但不管怎样，把衣领竖起来，总可以挡一挡在身后一直丁冬作响的铃声。

我来到海边，走下海滩。海滩上空无一人。有谁会冒雨来这儿呢。我一步步走到水中。这时，我全身心集中到我呼吸的节奏上。我推测，或者说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推测，要呼吸多少次，海水才能灌满我的肺脏。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抵挡得住那极力阻止我在水中呼吸的生命本能。甚至在离开住处之前，我就决定，如果没有必要向大海游去，我就在两脚仍然站着的时候往肺里吸很咸的海水。

水已经到了我的腰部。我好像听到了奔驰的马蹄

声和丁冬不断的铃声。先是一声粗野的叫喊“站住”，随后就有一只大手落在我的肩头。我回头一看，是卖冰人希梅克。他把我从水中拉出来，说：“出来吧。他会回来同你住在一起的。”

我当时感到惊讶吗？出乎意料吗？如果在事情发生时我就把这些写下来，也许我能这样说。现在我就不会了。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周，就没有尝试的必要了。晦涩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一秒钟之后也不行。从那之后，我度过了一些轻松的日子。

根据我现在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在我看来，我心灵深处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最后时刻，“他”是会来的，就像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前出现一样。^③那时，我会听到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其实都是胡说八道。我一定是受了我读过的那些书的影响。那些书是我在那个房间里找到的。而那个房间是属于富裕而有教养的人，不属于像我们这些目前在国外的共产党。在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创作和翻译的诗集中，我发现一些使我很感动的东西，即献给伊莉尔的一些诗。我之所以感动，不仅因为这些诗是绝妙的爱情诗，而首先是因为诗人在想像中给他恋人起的名字，同我的两个恋人呼唤的我的名字很相似。虽然我的两个恋人有四五个名字，但对我来讲，他们两个人是一个人。我大声朗读切尔尼科夫斯基那些诗，我把“伊莉尔”读成“耶莉”。这组诗中的最后几首使我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过于烦恼。

他的诗集中还有翻译的巴比伦诗歌。其中一首叫《悼念坦木兹》。一个脚注解释说,坦木兹就是希腊的阿多尼斯。他每年下到阴界。他的母亲、妻子和妹妹哀悼他,直到他来年春天回到阳间。阿多尼斯—坦木兹在我心里同拉撒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同基督本人也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信上帝。我知道,宗教是群众的鸦片。但是,我感到,所有这些神话都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一个人就是自己的上帝的世界里亦如此。我喜欢这样想:我也是那些死而复活者中间的一个。因为事实是,希梅克从海浪中把我拉出来,坦木兹不久将把我带到生者之地,也是爱情之地。

希梅克把我抱到车夫的座位上,用麻袋盖上我的头。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希梅克随后也上了车,把鞭子甩得噼啪响。在雨后变硬的沙滩上,马突然朝北跑起来。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是,我当时坐在拉煤油车的座位上,一心只想着留在地上的那些马蹄印。留在沙地上那一个接一个马蹄的印记,弄得我昏昏欲睡。

虽然我蜷缩着坐在那里,我的惺忪的双眼却在盯着马腿和马尾巴的动作。我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掩映在多汁植物中的“红房”。这种植物的叶子像手指头。从房子坐落的悬岩到海滩,一路上生长的都是这种植物。希梅克拉着长音喊了一声“吁”,马就停下来了。他把马拴在一个木桩上,将我拖到一间盖着黑油毡的小屋。现在我可以想像,如果当时有人看见这个身体强壮的男人拖着一个湿漉漉的女人,随后又俯在她身上,他肯定会认为,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这个男人一

定在强奸她。但是，海滩上空无一人。对任何想溺水自杀的人来说，那个冬日可真是个理想的日子。

他坐在我身边，脱下我的外衣，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了我一些热乎乎的甜东西喝。他说：“你写一张条子吧。”他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你写在这儿，就说你要去死。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困倦开始向我袭来，像一条柔软的毯子一样团团将我包住。我写了两行字。然后，好像通过一层薄雾一样，我看见他把条子放在我的外衣兜儿里，向大海走去，将外衣扔到浪涛中。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躺在热水浴缸里，一个陌生的女人将我从浴缸里拉出来，为我擦干身体。然后，她帮我穿上本来不属于我的衣服，领我走进一个房间，让我坐在一个桌子旁。桌子上边放着一把茶壶。茶壶闪光锃亮，刺得我的眼睛很难受。她给我倒了一杯甜茶，送上蒜味香肠三明治和一碗汤。我不记得她同我是否说过话。

我吃饱喝足，感到我的生命又复苏了。一个已经下决心自杀并且走下海去的女人，只有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她才相信自己确实还活着。要动脑筋领会这场已经发生的变革，这段时间是需要的。这是一场一百八十度的变革，或许是一千零八十度的变革，或许是一场无限度的变革。

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房间。他用我从未见过的锐利的目光看着我，并同我讲话。但是，我的耳朵好像依然

留在我的内心深处，仍在倾听那海浪的声音和希梅克对我所说的那句动听的话。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事物像这样万古不变。我曾听说，人们精神恍惚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比如说，通过这种办法，施催眠术就能使人回到童年时代。也许，他真的也对我进行了催眠。

我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听到，我的名字是埃娃·埃利希。他交给我一本波兰护照，上边有一张照片，照片可能是我的，照片下边写着那个名字。他告诉我，两个月以前，我从波兰移民而来。我的身份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我有一张证明书，证明得到父母一笔钱，要在特拉维夫买一块地。他交给我一张打印好的纸，告诉我把上边写的东西背诵过来，然后再交给那个女人。我把纸放在桌子上，而他又把纸塞到我手里，并命令我立刻大声朗读。纸上写着我的家庭成员和我的生活史，还写着我来巴勒斯坦的路线：我在哪里上火车，在哪里倒车，谁来给我送行，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描绘我乘坐的轮船，我一路上遇到的旅客。当我读完抬起头时，他叫道：“埃娃·埃利希。”我答应道：“嗯。”他说：“好。”他把手放在我的下巴下面，托起我的脸。他的目光如炬，直穿我的心，好像要把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东西都要掏出来。“只有在你完全明白你的真实身份时，你才能离开这儿，去希梅克提到的那个地方。哪怕出一点微乎其微的差错，一切都要取消。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会通过这个考验。”他笑着说到这里，就离开了房间。

我想必是酣睡了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这时，有人走进屋里。因为百叶窗全都关着，我看不清来人的脸。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欧律狄刻。”

“你错了。”他说。

“看着我，”我说，“你自己再看看。”我撩开鸭绒被，把我的胴体袒露给他。他的那个玩艺儿显然也挺了起来。

“你瞧你在干什么！”他说。

“你爱我，”我说，“你来这里，想必是要把我弄出这死亡之地。”

“你又错了。这不是爱的表示。现在，埋伏着等待俄耳甫斯的亚马逊女战士就要来，要从我这儿拿走长笛。那时，你会怎么样呢？”^①

“不要让她们来！把长笛交给我！我也知道怎么吹笛子。”

“欧律狄刻是不懂得怎么吹长笛的。”

“我是埃娃·埃利希。”我说着睁开了眼睛。

门开了，一束黯淡的光线射进室内。我抬起眼皮，发现床边站着一个人。我直对其脸颊，发现那竟是个女人。“早晨好，埃娃，我看你盖着鸭绒被太热了。穿上衣服吧。”她对我说。她把内衣、裙子、套衫和毛衣放在床上。“先吃点东西，我们再重温你的故事。对你的考验今晚进行。”

我出色地通过了考验。对此，那个女人说：“如有人说她不是埃娃·埃利希，我此生再也不会相信。”他们给了我十镑钱，又把哈—亚沃达大街这所房子的钥匙

交给我。现在,我就坐在这所房子里,写这些文字。通过房间的窗子我能看到花园。花园里的树木,是修这座房子的人栽种的。而今,大部分树木,李子树、杏树和苹果树,都光秃秃的。惟独枇杷树绿叶挂满枝头。再过一个月,到2月初,树木和花坛就会长出枝叶。到春天,整个花园就会绿树葱茏,鲜花盛开。我不知道这些花的名字,只知其根茎正在地下十公分或二十公分处休眠。我也不知道玫瑰树上将盛开的那些玫瑰花是什么颜色,只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玫瑰花圃,花圃里也许有大批花色繁多的玫瑰品种。每样东西都会使我惊奇。

今天,希梅克来了。他一摇铃就等于告诉我,他要来了。我必须把房子里的布置检查、再检查一遍,包括壁柜的进口和出口。几个星期以来,我已经在餐室里堆满了各种食品罐头。他呆在这里,可以不出门,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见到的一些人,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埃娃·埃利希”这个名字。他们知道,这是来自波兰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她的父母让她来巴勒斯坦是为了在特拉维夫买一块地皮和一所房子。只有食品店老板那位爱管闲事的妻子,想从我口中套出个中的“真实原因”。我则让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来巴勒斯坦既有罗曼蒂克式的原由,也有一些实际的理由。一些小伙子时而想找我聊天,甚至就其严肃的或不那么严肃的心迹向我作了暗示。对这些求爱的行为,我也找到了拒绝的办法。我告诉他们,我买这所房子,是为我的未婚夫

准备的，他不久就会来到这里。这个托辞对我也会很有帮助。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也难免有人会看到他。因此，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从不让他在开着的窗子前坐着或站着。傍晚，打开电灯的时候，必须关上百叶窗。谢天谢地呀，亏得现在是冬天。希梅克给从奥地利进口的达蒙炉子带来许多煤油。我们在这儿不会受冻了。

不管是从编年的角度看还是从心理的角度看，我现在都已到坐下来、写出这些文字的时候了。从现在起，我每天要继续写作，把那天发生的事都记下来。这也是一种日记。

今天天气很好，是一个晴朗的冬日。这种天气，在巴勒斯坦只有在一年中的此时才会见到。天空如此清澈，如此湛蓝，坐在太阳下犹如坐在美妙的天堂里。但是，我今天的情绪无比的坏。我拿到这所房子的钥匙时，心中曾充满愉快的期待之情。但是，这种心情现在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经质的、忐忑不安的焦虑之感。几个星期以来，我满怀兴奋之情所沉迷的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幻景被一种恐惧情绪所取代。就我的理解，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我第一次开始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思考，这些墙壁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使我烦恼和痛苦的是，我担心他来这儿也许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个被追捕的人是不会有任何选择的。但是，我安慰自己说，在派希梅克救我一命之后，很可能是他自己主动作出这种安排的。不可思议的是，有时我根本不希望他来。我怎么会知道他

内心对我的真实态度呢。

他就在这儿，在壁柜后边。他是在街灯熄灭之后的深夜来的。敲门声是事先约定的。他走进来，这是我怀着真心实意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我这样说决不是一句空话。我看不见他，因为我没有开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把屋里弄得一片漆黑，只是为了便于密谋，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首先，我用嗅觉知道他的存在。他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任何其他人都会把这种气味叫做恶臭。我深深吸了一口这种气味，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我能区分出，其中有烂鱼的臭味和烟味。只有上帝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味道。滑稽的是，进入我脑海的第一件事，是怎么处理他的衣服问题。衬衣和裤子可以洗一下，在炉子上烘干。他那显然是用羊皮做的外套，看来不得不扔掉。

我拽住他的手。他毕竟不熟悉这个地方，在黑暗中不知往哪儿走。夜间很冷，而他的手却很热乎。我想起了祖母的话：手热，心寒。可是，他无疑一直在口袋里暖自己的手。

两人的手一碰，我就感到浑身发抖，浑身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没有任何语言能描绘它在我肉体上和精神上唤起的冲动。

我们一进屋，我就把灯打开。他脱下外套，那的确是用羊皮做的。他的脸庞比我记得的更黑、更消瘦。他看上去很疲惫。我心里当即产生一种希望，不，是一种渴望——肯定还有比“渴望”更强烈的词汇吗？无论怎么说，我是非常非常想拥抱他。我没有这样做，而是

说：“你看上去好像有几夜没有睡觉了。”他笑了。尽管满脸是疲惫的表情，他的笑容仍像过去一样，融化了那么多人的心。（白痴一样的话！）他的笑容中带点童稚气、天真气，这同他脸上透出来的经验和威严形成鲜明的对照。想拥抱他的念头在我心上涌动，来势凶猛。我真担心，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而他却用平静的声调问道：“我在哪儿睡觉，埃娃？”刹那之间，我没有想到他是在同我讲话。但是，我立刻恢复了常态，给他把壁柜的门打开。壁柜的夹层中容不下我们两人。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等待他的眼睛慢慢适应其中的黑暗。他说：“不坏，不坏。我以前从没有住过这么狭窄的地方，但我认为我并没有患幽闭恐惧症。现在，我终于能够睡觉了。晚安。别忘记关上壁柜的门。”

我写这些的时候就知道，今晚我是不会入睡的。我躺在床上，感到非常想他，想抚摸他，想感受他，想了解他。一种强烈的各种念头的混合物，各种念头和情感碎片的混合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把我的心潮比作大海，不过只是个平庸的比喻。实际上，我感到我心中好像有浪涛在翻滚，各种各样的浪涛，从夏季愉快拍打的微波细浪，到冬季要淹没你、吞噬你的狂涛巨浪。这些狂涛巨浪也同样使我感到高兴。在这一个浪涛和下一个浪涛之间，我发现我自己一直在思念爱情。我跳下床去，坐在桌子旁。以下的文字，就是在我脑海里闪过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同我刚才提到的主题有关。

我知道,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切关于爱情的言论,都是用情感来掩饰再生殖、繁衍后代这个基本本能的手段。恰恰是这同样的本能,使动物进行交配。它们交配得很成功,但并不谈情说爱,不唱情歌,也不做什么爱情之梦。在交配季节,雌性动物产生性冲动,或者说发情。但是,有些种类的动物和人类一样,并没有固定的交配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就是在这类动物中,也是雌性先发情,雄性再作出回应。

我肯定正处于情欲之期。我的肉体需要他,向往他,眷恋他。我从脚尖到头顶浑身上下都需要他。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我之所以需要他,是因为他是我想同他一道生儿育女的男性,他是同类中我最喜欢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感到可笑,但也必须承认,我并非是惟一喜欢他的女人。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一个女人不对他抱有想法,而有不少女人的这种欲望得到满足。这样,就出现一种恶性循环:一种品质,或者说几种品质的结合,使他得到女人们的垂青,而女人们对他这种垂青,又增加了他的吸引力……

难道这就是人类中的女性优于动物中的雌性之处吗?这就是“爱”与“恋爱”之间的区别吗?恋爱产生在对爱的对象真正认识之前。因此,男人的模样和女人在遇见他时的表现,常常在恋爱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女人逐渐熟悉她选择的男人之后,如果能形成爱的话,爱就成为一种逐渐形成的过程。

我读一下刚刚写下的这些文字,感到有些汗颜。对我钟情的这个男人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只知道他是个勇敢的人,一个忠诚而热忱的党员,已将其生命献给

改造世界和拯救人类的事业。我还知道,他在女性圈中的成功是异常显赫的。但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脾气和性格。我确实也不知道他对我的真正态度是什么。我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特性、需要和希望的特殊人造物完全为他而生存,还是只作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的手段为他而生存?我终于安下心来,因为我认为,他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派希梅克从大海里将我救出;他组织了那场复杂的活动,结果我才来到这儿,同他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换句话说,世界革命并不是他全部的希求,他还希望同我在一起。只是他的境况使他不得不压抑着对我的情感,一直到今天,到明天。

焦虑之箭又刺痛了我的心:也许我是在从我自身、从我自己的贫困中创造出一个男人来?在我同男人的一切交往失败之后,我必须从我伤痛的自身中解脱出来,同这个世界及其他人再建立一种热情而积极的联系。我希望,他能通过同我的关系证实,我自己有继续生活的能力。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要求得太多,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想像,如果他令我失望的话,我将怎么办。是不是我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脑子还能几近辩证地思考,但身体却只能用一个声音讲话,用一个强大的、能压倒一切的声音讲话。他把我卷入旋涡,直至将我打碎。我感到他在我体外,又感到他在我体内。有一股我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将我向前推呀,推呀,把我向他身边推去。我像一只小船

一样,被汹涌的浪涛冲向想像中的、据信是安全的港湾。但我没有这样想:安全的港湾到头来也许只是一峭壁,小船将在上边撞得粉身碎骨。

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同我做爱。一种深重的空寂感使我变成又深又圆的水坑,就像耶路撒冷那些水塘一样。到做爱时,这种空寂感就会消失。我就会更平静一些,也许更聪明一些。

水坑的底部感觉到一场及时雨来临。早在云彩出现在天空之前,水坑就湿了。他的嘴唇的亲吻,使我产生腾云驾雾之感。他的有力的拥抱,就像环绕着伊甸园的那些小河,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时而在我身上,时而在我身边,时而又在我身体之中。

当那一刹那过去时,我拼命想抓住它,但却没有抓住。我记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我仍记得的是,在他同我做爱时,我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感受:一是感到极端快活,同时又感到不安、焦虑、甚至恐惧。

我挖空心思,想弄懂这是什么道理。达到性高潮之后,我本应感到一股平静、缓慢的溪流轻柔地流过我的全身。像通常一样,我总是责备自己:他想引导我继续前进,向更高的巅峰继续前进,而我却在中途跌倒了。我不愿意向更高的巅峰攀援。我一心想的是,永远躺下来,在他怀抱中歇息。

在做爱当中刺痛我心的那种强烈感觉是从何而来呢?来自一个顿悟:同他做爱的不是我,而是某个女人。我认为,我这样想并非是他的什么缘故。也许是他的缘故。也许他的行为方式中有点什么问题。无论我怎样冥思苦想,怎样折磨自己,我仍然捉摸不透。但

是,只要他曾经对我说过,只要他曾经暗示过他爱我,那就行了。任何事物都是不会雷同的。我暗示他,我愿意和他一起睡在壁柜后边的床上。他却断然把我推开了,几乎有些粗暴。“你必须呆在屋里。这是命令。”我想,这是他今晚对我说的惟一一句话。

我夜以继日地竭尽全力,使尽浑身解数,想使他说出他和我在一起,并非只是由于情况所迫,而是还有其他原因。这样的话会使我信以为真,甚至会用以欺骗自己。我抓住一些暗示,我解读一些偶然联系的真意,我不以事物的真相,而是以事物的假象来安慰自己。我情愿不遗余力,使他感到他生活在天堂里。我能写下来的,并非我做的一切。就连让我自己看也如此。有些事,甚至在我做的时候都感到羞耻。

如果同一件事再次发生,我就会喊叫,不是愉快地喊叫,而是痛苦地喊叫。昨晚,我感到我好像是他的床垫,或者说是橡皮做的性玩偶。我再也不喜欢干那种事。但我仍将假装达到高潮。他怎么不会觉察到此中有假呢?在他看来,难道我就根本不存在吗?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讽刺:在我丈夫同我做爱时,我发现自己在某个时刻在做习惯做的事,自己假装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当时,他就是另外那个人。现在,他也是另外那个人,但并非我心中另外那个人。我这是发疯了吗?后来,他睡着了。早晨,他看着我,好像希望我对他给予的一切表示感谢。而我则假装确实对他很感激。当他再次想同我上床时,我的反应则是作出热情和渴望的

表示。我担心什么呢，怕失掉他吗？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将来也决不属于我。但是，我的担心显然是极为痛苦和可怕的东西。这是我所能作出解释的惟一方法，也许是我自圆其说的惟一方法。在我能够更冷静地思考问题时，我清楚地知道，我想像中的乐园是地狱。但是，我必须做到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地狱是我自己造的吗？我在内心要承受它，而且还要继续承受下去吗？

今天，我一醒来就预感到会过得愉快。也许，他对待我的态度有点变化，有某些暗示。我打开百叶窗，外边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也许这就是春季的开始。这里的春天到得很早。我出门去食品店，买了些好吃的东西和葡萄酒。商店的老板娘问我，我的未婚夫到了没有。我一笑置之。我回到家，他迎着我走来，差点儿要拥抱我。看来，我今天的直觉没有欺骗我。

我们用早餐时，他的情绪非常好。在我自己的想像中，我们像是一对已婚的夫妻。他开始谈论起世界政治。他满有把握地说，革命已不是遥远的事了。在同我谈到美国的情况时，他说，那里的资本主义遭到了再也无法恢复的打击。现在，中产阶级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将加入到千百万工人队伍中去。每一个头上长着眼睛的人都会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10月29日已经开始死亡。他唱起一支英文歌曲。这是一首由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唱的歌。这一支歌描述的是，一个人坐在纽约的马路上行乞。在过路人当中，他看见当年同他一起打过仗的一些老战友。他曾是带领连队在

战场上冲锋的鼓手。而今,他却再次为生存而战,为反对饥寒交迫这个真正的敌人而战。他令人感动地唱着,双眼含着泪水。而后,他谈到德国。他说,德国已经遭到华尔街经济大崩溃引发的沉重打击,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德国。当然,我们在德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组织严密的党。东方的革命力量同西方的革命力量相汇合,工人阶级在英国掌握政权,革命传播到整个帝国,这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千百万工人将登上街垒,整个腐朽的社会体制将垮台。“让我们为未来而干杯吧。”他说。我把我们俩的杯子都斟满葡萄酒。“稍等一下。”他说着钻进壁柜,拿出一瓶伏特加酒。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亲吻我时的那种气味来自何方。他倒了一杯那种透明的酒。“为我们干杯。”我说着呷了一口葡萄酒。他一边喝伏特加酒,一边眯着眼睛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他这种眼神是那种酒劲造成的。那瓶酒的标签上标着,所含纯酒精是五十度。

他又喝了些伏特加酒,而后站起来拥抱我。我像当初一样非常强烈地需要他。我用嘴吸吮着他的热吻。这些热吻流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生命之泉也开始涌流。在这涌动的水流中,所有坚硬、冰冷的石头都融化了。我脱掉衣服,也开始替他解开衣扣。但是,我的手指并不听使唤,一下子却抓住了他的那个玩艺儿。那个玩艺儿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正在勃起。我则像死海一样,经一根魔杖一点,变成了加利利海,一片甜美、波动的海。他那玩艺儿很快就要进入我的体内,就像落日缓慢、渐次沉入大海的怀抱一样。我是一片海

洋。一片随着满月出现开始涨潮和涌流的海洋。落潮时裸露出水面、随后被晒干的所有地方，一个又一个都又溢满了水。

我的奶头也涨起来。我把他的头按在我的左乳房上。他用嘴唇叨住我的奶头。他快活得咯咯发笑。

他进入我的子宫。我的儿子进入我的子宫。我的儿子缓慢地、缓慢地到达那里。一站又一站在等待他，都是空旷的车站。都是遥远的车站，以前从没有人去过。他在每一站都逗留。所有车站都奇迹般地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他奇迹般懂得在每一站要停留多长时间。他一步步在走向完美。这样，我就放松下来，放松我自己，放松我的身躯。这个身躯既给予也接受欢乐，既欢唱也哀叹，既呐喊也讲话。我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一切革命和斗争胜利之后人类将得到的那种解放。

但是，他没有到达最后一站。他准备后退，准备从我腹中撤出来。“在我里边再待一会儿吧。”我听到自己在喃喃低语。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我听到他用粗暴刺耳的声音喊道：“你已经疯了吗？！”

我已经完全清醒。我看见他站起来，冲我站着。我听见他生气地、也许是轻蔑地说：“你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你想占有我！你如此安排，是要把我关在这里，日日夜夜和你厮守在一起，使我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还想要我给你搞出个孩子来！”

“我爱你。”我咕咕哝哝地说道。

“我不鼓励你这样干，”他用严厉的、冷冰冰的口气说，“我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我想这是

非常明白的。刚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顺手牵羊,是这里的暂时形势的副产品,而这里的形势本身又是国际形势的副产品。但是,你也许认为,在那个黑人扑向你之前,我们在海滩上的拥抱是爱的表示。”

“那时,你抛弃了我,逃跑了。”我愚蠢地咕哝说。

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耸耸肩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当然就不值得你爱了。”他边说边去穿衣服。我也盖上我那不光彩的赤裸的身体。他转回身来,又开始向我大谈爱情问题。他说的一切,我都不明白。他所说的中心意思是,爱情属于殖民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所说的爱情,来源于用征服手段扩大自我的愿望,就是去占有。

“我所理解的爱情主要是给予。”我听到我自己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认为,你已经得到很好的报偿,”他用讥讽的口气说,“我的行为像个共产党人:我根据你的需要和我的能力给予你。我感到,你从我们的交合中得到的快感比我多。如果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尽到的义务问题。”说到这里,他可能感到说得太过分了,就改用平和的语气说:“我不能把自己系在一个女人身上,不管这个女人是多么出色和忠诚。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以地向门口走去。他挡住我的去路说:“你要去哪儿?”

“我还能去哪儿?”我低声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大海里呢?”

“我们认为,你受过足够的教育。”

“为了你的需要……为了党的需要……”

“现在十分清楚,你需要进一步受教育。”他说。这时,我们听到外边门铃在响。他去开门。“你千万别开门!”我喊道。但是,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

几分钟之后,他和希梅克一起走进来。希梅克用他那刽子手般的眼睛看着我说:“把房子的钥匙给我。”

我像个玩具娃娃那样,把钥匙交给他。他接过钥匙就走了。

弗里达走进来。她比我年长几岁,个子更高更壮些。她穿的是裤子和短皮夹克。她的头发也很短。希梅克跟着她也走进来,带着一个画架和两个包裹。“弗里达可以住在这儿。”他简要地说。“那我呢?”我结结巴巴地问。“你留下。”他放下带来的东西,走出去,过一会儿带着一瓶煤油又回来。我记得,他上次送煤油是在一切开始得很好的那个早晨。

希梅克走了。弗里达脱下皮夹克,挂在椅子上。

“这是弗里达同志,”扎哈利亚说,“她为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她也受过正确的教育。你要向她学习。她是德国著名的画家,她来这儿是为我画像的。”

我浑身发抖。“我看你有点冷。”弗里达说。“我们需要把另一个房间里的炉子拿来。”扎哈利亚说。弗里达拉下脸对我说:“这当儿,你可以穿上我的外衣。”我披上她的夹克,身上感到暖烘烘的。

“我给你画裸体像。”弗里达用浓重的德国腔说道。

“你只能画我的躯体。”他对她说。

“我要把你的脸画成希腊神祇的模样,”她笑了,

“我们在哪里画？”

“在另一个房间，”他说，“那里没人打搅我们。”

“当然，”她说，“我一定要绝对聚精会神。”

他搬着炉子，领着她去隔壁房间，随手把门锁上。我坐在椅子上，拽一拽夹克，把自己裹得更紧些。

门开了，弗里达走出来，穿着女裤，戴着乳罩。她的身体很健壮。她的大腿圆润丰满，但脚脖子很细。她的乳房比我的小。在她身上透露出某些使人放心的东西。

“那个房间里很热。你的炉子的确好极了。一个地道的恶棍。现在我一定要洗个澡。”难道他在她体内下种了？我内心里犯嘀咕。难道这就是他要给我上的课吗？这时，我的嘴好像不由自主似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必须烧点洗澡水。”

他也从房间走出来，穿好了衣服。“我要为弗里达烧水，”他对我说，“同时，你做点吃的。我已经像饿狼一样了。弗里达需要她的模特儿给她办许多事。”

他端着大锅，进了洗澡间。弗里达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看着我从卡特·科尔魏茨的画册上剪下来挂在墙上的画。看着画幅上削瘦的母亲和哭泣的婴儿，她说：“他们也很饿。”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我听到她说这句话的声调时，我感到她对扎哈利亚的行为有些讥讽，甚或是气愤。显然，她了解或者猜测到这里的形势。但在当时，我却像个带发条的玩具娃娃一样。我走进厨房，拿了些面包、奶酪和油橄榄。“我并不饿。”弗里达说。

他拿着壶走出来说：“水已经热了。”他坐下来吃东西。弗里达转过身对我说：“你也许愿意帮我弄点儿水，是不是？”我虽然感到很茫然，仍同她一起走进洗澡间。

她脱掉衣服。她的小乳房相当坚实，有一个乳头仍然是直挺挺的。我们把热水锅抬起来。她靠着我。也许我脸红了，因为她说：“水蒸汽会使你感到热的。你最好脱掉些衣服。”我脱下上衣。“我觉得巴勒斯坦这儿天气热。全年大部分时间都热。每当我去海滩的时候，我的脸立刻就变红了。你的皮肤比我的好得多。你的毛发不是浅黑色的，但是皮肤却像一个浅黑色的姑娘。这是很原始的肤色。我的手想……作画，抚摸。”她说着，抚摸起我的肩膀。

“我觉得，你的乳房很美。”

她开始洗澡，又加了些凉水。我犹豫了一下，转身对着门口。她说：“我非常想给你画一张像。”

“裸体的？”我脱口而出。

“当然，当然。你很有古典美。我已经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来自希腊神话。”

“维纳斯？”我讥讽地问道。

她用严肃而又惊奇的眼神看着我说：“维纳斯？啊，维纳斯是古罗马人。对希腊人来讲，她是爱神阿佛罗狄忒。而你是珀耳塞福涅。你知道珀耳塞福涅是谁吗？她是冥王哈得斯的王后。我认为，你的形体、容貌、肤色非常像她。”^⑤

“那个阴间的王后？”我反问道。我真不知道扎哈利亚对她是否谈过我，又谈了些什么。“就是她，”弗里

达边说边往肩膀和乳房上撩水，“珀耳塞福涅不只是个漂亮姑娘。她还具有极独特的个性。非常有趣。请脱下你的裙子好吗？从这个灰玻璃小窗子透进来的光线，可以用作理想的——下边这个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啊，我听说过这个新词：背景。”

“你就在这儿给我画像吗？”我愚蠢地问道。

“啊，不……我只是看看。”她用湿漉漉的手触摸我的身体，我的肚子，我的大腿，我的乳房。我静静地站着。“她真是个女神，不是雕像！”她说着触摸我的乳头。一种奇异的感觉立即传遍我的全身。这并非是不愉快的感觉。“这样，”她说，“这样一摸可以产生极美的感觉。现在，请你帮我洗洗背好吗？”

我给弗里达的背部打上肥皂。之后，她重新躺在浴缸里。她的双手在乳房、肚子、大腿和所有能触摸到的地方涂肥皂、揉搓。我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她的那双手。她给自己打肥皂的时候，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声。过了一会儿，我帮她冲洗掉肥皂沫，递给她浴巾。在我离开这个房间之前，她把她的地址给了我。那是城北沙丘中的一所阿拉伯房子。她说：“有空时来看我。”

我身处“阴间”，但我不是王后。我是个奴隶。有时，我打算逃走，但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从这里营救出去。奇迹是不会发生两次的。然而，我对弗里达仍抱有某种痛苦的希望。如果她再次来这儿，我一定要开口说话。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也许，她会同意我的意见。我几乎可以肯定，她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个男

人，一直得意洋洋地谈论什么他要拯救全人类，可是到现在，除了破坏之外，他却一事无成。让他离开这个壁柜难道还不应该吗？这种大胆的想法难道只是一个遭打击、受耻辱的女人的幻想吗？这个女人被一只粗鲁而残暴的手从“阴世”拉回到“阳间”，又从“阳间”拉回到“阴世”。

弗里达没有来。我想去找她。但是，毫无疑问，希梅克会抓住我。他经常来这所房子。他看我时的眼神，就像毒箭一样刺痛我的心。他和扎哈利亚关着门在房间里商量事时，他会这样说：我难道没有告诉你她有什么价值吗？我为什么从水中把她救出来呢？为了她这样的东西我难道需要被雨水和海水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吗？他们若谈论这些，我并不感到奇怪。希梅克一说话，就使我想起那只守护冥府大门的长着蛇尾和三头的狗的叫声。

希梅克给他带来许多伏特加酒。他喝呀，喝呀。他是在追求弗里达吗？有时，他变着法儿对我表示残酷。有时，他又对我表示友好。有时，我的身体又接受了他的要求。在这些时候，我真希望他死去。

很久很久以前，我曾把自己比作欧律狄刻，把他比作下到阴间要使欧律狄刻起死回生的俄耳甫斯。在我的名字叫艾里舍娃时，我有一把小提琴。我改名埃娃·埃利希后，就没有小提琴了。

注释：

①“西克斯”即“six”(六)。星期五是一周的第六天。

②据《圣经·创世记》，拉结是族长雅各的妻子。她生得容貌俊秀，与表兄雅各结为夫妻。她因难产而死，死后葬在以法他(即伯利恒)的大路边。

③据《新约全书》，伯大尼的拉撒路是耶稣的门徒及好友。他因病而死。死后第四天，耶稣来到他的墓前，仰天高呼：“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果然复活了。

④俄耳甫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太阳神阿波罗曾把自己的第一把七弦琴赠给他。他娶欧律狄刻为妻，但她不久被蛇咬死。他悲痛至极，前往阴间，想把她从那儿救回来，但没能成功。后来，他参加远征色雷斯，被该地区的亚马逊妇女杀死。

⑤根据希腊神话，珀耳塞福涅是主神宙斯的女儿。她在采花时，被冥王哈得斯劫往冥界。宙斯命他将女儿送还，但因她在冥界吃了一粒石榴籽，再也不能完全离开冥界。一年中，她有四个月同哈得斯在一起，其余时间才能回到父母身边。

十一

我翻阅了日记这一页，又翻阅其他各页，把日记全部都翻阅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钟。大街上传来嘈杂的人声。普珥节晚会和化装舞会散场了。人们要回家，笑声和喊声此起彼伏。我累得要死。我的眼睛熬红了。我躺下，想睡一会儿。但是，睡意并不降临到我的眼皮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古希腊人是把睡觉当作一种神祇来对待的。读这些日记时，我脑子里就想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接受日记的表面价值。换句话说，是否把这些东西视为艾里舍娃在那里居住时写的一种日记，或者……这里的東西太多了，我脑子里不能不产生疑问。而有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我问自己，这本“日记”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写成的。也许它是在我两次造访哈－亚沃达大街期间编造的，“藏”在画框的后边。然后，又故意派我到那儿去，去发现它。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么做只能有一个目的，即让我相信，在普珥节前一周，犹林和艾里舍娃并没有在那座房子里相聚……也许是想为艾里舍娃制造一个“托辞”，说明她对她青年时期的理想完全失去信心。甚至准备不遗余力去——等一下！——去摆脱犹林。难道这就是我应该从日记中领悟的重要暗示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文字就只能是美国人所说的“红鲱鱼”。“红鲱鱼”并不是一种红色鱼，而是为了使追逐者或调查者失去

线索而故意在某地放置的一件东西。而这次导致我言过其实的,无疑是我的自然怀疑主义和疑神疑鬼的情绪。每当我疲劳时,这种情绪总是占上风。

我决定第二天去拜访画家弗里达。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今天。我终有机会去同这个神秘案件有联系的人物之一面对面地去交谈,而不必戴什么面具了。

大约六个月以前,我曾有幸拜访过画家弗里达·阿尔特曼。当时,她的确住在诺达乌区和雅康河中间的一座阿拉伯式房子里。在我们准备对付阿拉伯人袭击特拉维夫那段时间,我在苏梅尔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贾穆辛村民正策划从北部突袭特拉维夫。他们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位德国女人住的孤零零的房子。

我和我的两个下属一起向弗里达住的地方出发了。路上,我们的汽车轮子陷进沙子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汽车拖出来。我们汗流浹背,疲惫不堪,终于到达那所孤零零的房子。我们从汽车上刚一下来,一只很凶狠的德国牧羊狗便向我们扑过来。紧随其后的还有两只叫做“迦南”种的阿拉伯野狗。这些狗团团把我们包围,不让我们移动。它们的狂叫传到苏梅尔的狗那里,那些狗也就叫起来,形成一种大合唱。但是,一听到这所房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喧嚣声就立即停止了。我们看见她出现在窗前。之后,她走出来,走到那些狗面前,抚摸它们的头。它们则摇摇尾巴,向后退去。

弗里达·阿尔特曼不想搬出这所房子,就连暂时搬走也没有考虑过。她是一个粗壮的女人,穿着睡衣。她站在我们面前,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口,用浓重的德国腔调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会伤害她,如果我们要她离开这所房子,我们就只有强制她

搬走。我们无计可施,只有用放在这所房子阴凉处的陶罐里的水来解渴,然后返回警察局。一路上,两个警察拉开了话匣子,嘲弄起弗里达·阿尔特曼来。他们说的话,一部分无疑是重复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一些流言蜚语,一部分则是他们凭借想像力编造的一些猥亵的故事。也许,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我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闭上了双眼。

我睁开眼,已经九点钟了。我来到阿伦比大街,走进哈芬斯坦先生的服装店,为自己买了一件成衣和一顶帽子。我把我的阿拉伯长袍和头巾折成一个包,将“日记”放在里边,叫店老板帮我保存好,等我回来再取走。在赫斯街拐弯处,我用了早点,然后去茅格拉比歌剧院前的广场,在那里随时可以租到车。但司机听说我要去的地方时,看上去不大高兴。我只好答应给他一笔可观的辛苦费。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到达那所阿拉伯房子。这次,我们没有像去年夏天那样,把车轮子陷进沙滩中。

这次同上次一样,我又受到德国牧羊狗的欢迎。这种狗,一般人叫它“狼狗”。它向我慢慢走来,用眼睛盯着我,但是没有吱声。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女主人很明显对这条猎狗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但是,平静的气氛还是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小哈巴狗从房间里蹿出来,气势汹汹地狂吠着冲我扑过来。那只大猎狗没有动。而这个小东西却突然停在我面前,用一种看上去很惊奇的眼神盯着我。我想,这只德国猎狗可能是认出了我。我去年夏天来过这里。我那时是一个浑身冒汗的警官。尽管我现在的的外表同那时大不相同,看样子它还记得我从它的女主人那里要过水喝。

弗里达来到院子里,穿着一件短袍,露着双腿和胸的上半部。“早晨好,夫人。”我一边问候,一边脱下帽子。

“早晨好。”她回答道，同时打量了我一眼。我不知道她向猎狗作过什么表示，却只见它从原来站着的那个地方往后走去。而那只小哈巴狗却一直往我身上扑。它跳得很高，几乎要抓到我的喉咙。“啊，普特兹，”弗里达说，“你怎么了？”小狗趴到地上，开始在尘土中打滚。“啊，你这个臭普特兹，”她责骂它，“你这样闹，警官先生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这只小狗是否懂得女主人的呵斥，但见它站起来，带着羞涩的神态溜走了。这时，那只德国猎狗也跟上去，两只狗相伴着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已经不在警察部队了。”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弗里达向我微笑着说，“好极了！你就再也不会要求我离开这所房子了！”

“我是代表一个家庭来造访的。他们希望得到小姐的几张画。”我说。

弗里达瞅了我好半天。她的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有好几分钟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尽管外边非常好，我们还是进屋去谈吧。”

她讲的是事实。那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晴朗的早晨。一个地道的春天的早晨。太阳下既不热，阴凉里也不冷，在太阳下和阴凉处同样都感到很舒服。这所房子坐落在小山上。从那里，越过石灰堆成的小山可以看到西边湛蓝的地中海，可以看到东边的犹地亚山仍隐现在浅蓝色的阴影之中。从南边，我能看到特拉维夫在渐渐向我站着的这座小山伸延。在诺达乌的北边，第一批大楼的脚手架已经搭起，而在另一边的雅康河岸，为建造低矮房屋的住宅小区正在清理地面。在弗里达的住宅周围，从苏梅尔村到海边，是一片黄沙。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大片黄沙上生长着上千株野花：黄色的千里红、红色的虞美人、白头翁、野

菊花以及几十种我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卉。到处生长着陈年的葡萄藤。粗糙的藤蔓弯弯曲曲地匍匐在沙子上。它们的根从沙子深处吸收水分。不久,葡萄藤就会长出五指形的叶子,一串串葡萄就会从枝叶间探出头来。但是无人采摘。这片土地的主人,雅法的阿拉伯人,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他们知道,如果把葡萄园卖给建筑商,他们就会赚成千倍的钱。

画家领着我来到建在楼房外边的楼梯上,从那里我们爬到二楼。这所房子不是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窗子不是拱形的,而是方形的。墙壁很薄。只有房子的颜色为以实玛利人的子孙们所喜爱:粉色、紫色、绿色和蓝色。^①

“你觉得住在这所房子里方便吗?”我们进入一个小房间后,我才问她。刚从外边明亮的阳光下走进来,这个小房间显得异常幽暗。

“你的意思是,我这里的水龙头没有水,没有洗澡设备,去洗手间要到院子里,对不对?”她反问道。“但是,在德国,我是一个‘候鸟’。你是知道‘候鸟’的活动的,就是喜欢在大自然中生活。就像你们希伯来文中那种奇幻的说法,太妙了,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如果你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用希伯来语说的这些话,我想你也会像我一样根本听不懂。对你不大注意的这些东西,我在慢慢理解。是的,新的语言总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奢望。在我这里,四周都没有邻居。我上哪儿能找到这么大的房子呢?独门独院,还这么便宜!在特拉维夫,你会发现两个家庭挤在一个小小的单元里!”

我们走进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这是我的画室。”她说。里边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两把椅子,一把有靠背,另一把是普通的木凳,一个小桌子,墙角放着一个画架。墙上挂着几幅水彩

画，画的是她从窗口看到的景物。

“画得真好。”我说。

“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这些画吧。”她瞅着我说。我不知道她这样说是出于幼稚还是狡猾。

“我，也就是说，我所代表的人们，听说你绘画的题材是希腊神话。”

“可是，所有欧洲画家，从文艺复兴时期起，都画这些题材。请吧，你感兴趣的画在另一个房间里。”

她领我来到隔壁房间。这个房间是她的卧室兼储藏室。房间的一边放着一张大床，靠着另一面墙是几幅画，用布盖着。弗里达站得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热烘烘的气息。如果她的乳房再大一点的话，我的胳膊就会触到它们。如果她的头发长而密的话，就会拂到我的面颊。“我们这就揭掉罩布。”她说。她走到面对窗子的墙边，揭下画上面的罩布。

根据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神祇的照片或者雕像，我能辨认出画中的一些人物。我认出了阿波罗、赫耳墨斯和雅典娜。他们的身躯当然不是大理石做的，而是用很生动、很强烈的色彩绘制的。

“也许你要看的就是这样的画？”她说。我的眼神落在一幅绘有三个人物的画幅上。那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男人站在一个开着门的壁柜前。他的体格很健壮，画得很细腻。紧挨着他的人，腰有点弯，是一个窈窕淑女的侧面像。画的边上是第二个女人，是阿佛罗狄忒，洗完澡正要站起来。这三个人物的脸型像神祇的雕像，眼睛是盲的。这三人的两侧还有其他人物。右边是一群少女躺在地上，一个色鬼站在她们的左边。色鬼的头上长着角，他的腿像山羊的腿，其蹄子使我想起亚司马提或撒旦的蹄子。^②他的脸膛也使我想起我从前看见过的一张脸。“那么，

你认为我的画怎么样？”弗里达带着奇怪的微笑询问我。

我又把画审视了一番，用天真的声调说：“从壁柜里出来这个人是……”

“这是阿多尼斯，他和从壁柜里把他拉出来的珀耳塞福涅在一起。”

“你当然是指……”我用冷峻、锐利的眼光盯着她。这种目光无疑会使许多嫌疑犯感到，我已掌握了全部情况。这种目光在农夫身上从不会失灵，总是使他们立刻、全部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位画家像个老师一样冲着我微笑。老师知道，她的学生正极力找她的破绽，但她决不改变她的课程。“你不知道这个神话吗？”她问道。“阿多尼斯和他的两个女人的神话？一个很有趣的神话。其中还有寓意。故事是这样的：爱与美女神阿佛罗狄忒寻找阿多尼斯，但阿多尼斯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她见到他时发现，他会长成一个美少年。她自己想独占这个男孩。她该怎么办呢？她将他放在一个壁柜里，不让任何人看到他。但是，她担心奥林匹斯山上的其他女人会打开柜门，将他带走据为己有。于是，她就去找珀耳塞福涅……”

“那个阴间王后。”我打断她说，像个小女生一样，极力卖弄自己所具有的贫乏的知识。同时，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这个典故的来源，反正我是从那里得知这则神话故事的。

“是的，是哈得斯，冥府之王的……阿佛罗狄忒对她说，我把这个壁柜交给你，请代我保存。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别打开。”

“我想，她坐着的时候，在捻弄自己的拇指。”我说。

“捻弄拇指？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希伯来语吗？这是个俚语，和性交一样？”

我平生还从没有听见过一个女人说这种话，就是许多男人

也没有说过这种话。我感到有点尴尬,就解释说,“捻弄拇指”的意思是“没事可做”。

现在轮到弗里达惊讶了。“噢,不!”她惊诧道,“阿佛洛狄忒一生中从来没有男人是从不上床睡觉的。”

“壁柜后来怎么了?那个藏人的地方?”我用锐利的眼光又盯着她。

“是的,珀耳塞福涅当然打开了壁柜,发现那个男孩,把他抱上她的床,躺在她同哈得斯经常躺的地方。”

“她没有杀死他?”

“那是以后的事。后来,阿佛洛狄忒来到哈得斯家,看到这个男孩长大成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他不在壁柜里,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于是,她勃然大怒。她去找宙斯说:这真是欺人太甚。我把壁柜里的阿多尼斯交给珀耳塞福涅为我保管,而她却干出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宙斯闻此进行审理,最后作出判决:阿佛洛狄忒和珀耳塞福涅要——你怎么说?——要像工厂一样轮班倒……阿多尼斯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同阿佛洛狄忒在一起,三分之一的时间同珀耳塞福涅在一起。”

“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我说。

“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留给他自己。他要为这些女人积蓄力量,也许还要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阿佛洛狄忒耍了珀耳塞福涅一把。她弄了个神奇的腰带,呃,怎么说?对,是皮带。当她解开皮带的时候,就——”她边说边将系在腰上的皮带松开,“就没有一个男人能——你该怎么说?”

“能抵挡住她的诱惑。”我补充说,再一次感到自己就像个并不聪明的小学生受到老师的鼓励一样。

“这样,阿多尼斯就整年同阿佛洛狄忒在一起了。”她总结说。

“他走出壁柜只是为了再回到壁柜里去吗？”我询问道。但这个暗示并没有给弗里达留下什么印象。

“啊，”她轻蔑地挥挥手，“这个壁柜现在不起任何作用了。但是，珀耳塞福涅很生气，她想杀人。因此，她去找阿瑞斯，他是战神。她让他嫉妒阿多尼斯，因为阿多尼斯把所有的少女都占有了。阿瑞斯于是变成一头野猪……”

“是的，很大一头野猪，像大象一样大。他把阿多尼斯撕成了小碎片。”说到这里，她沉默下来。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她又说：“如果我为你画像，就把你画成阿瑞斯那样。”

“我像头野猪吗？”

“啊，不像……但是你有——”她把手插在我的裤子和夹克之间，摸我的左轮手枪。然后，她说：“如果你脱下夹克，我就会弄清你的轮廓。”

我脱下夹克。弗里达向我走来，离我很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了。她开始解我衬衣的扣子。我的那个玩艺儿硬起来。她悄声说：“我看阿瑞斯为他的阿佛罗狄忒或珀耳塞福涅激动起来了，对不对？”

平心而论，我这时正忙于作比较，看她刚刚讲述给我的希腊神话故事同艾里舍娃所描述的罗曼蒂克三角关系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弗里达早已脱下她的紧身外衣。我们不由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她用奶头摩擦我的胸膛。几分钟之后，我们像一些希腊神祇那样赤身裸体，在床上翻滚起来。我留心看了一下，发现艾里舍娃对她躯体的描写是准确的。当然，如果那描写确实是艾里舍娃之所为。

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没有经历过像随后发生的这种做爱方式。几乎所有的招数和动作都是弗里达主动采取的。我渐渐失去了全部的时间和地点观念。每当欢悦的云雨一消散，我就看

着她的脸。这张脸很别致,也可以说很美丽,特别是当她的眼睛转向墙壁时。她并不知道我在观察她。她时而喘气和呻吟,然后又停下来。一两分钟之后,又用不同的方式重新交合。她又呻吟又喊叫,还断断续续发出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声音。

也许她是在喊那只狗,因为门在这时突然开了,那只德国猎狗站在那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们。弗里达注意到狗进来了,就对它说:“啊,凯撒,你这个调皮的小家伙!你不敲门就这样进来了?”凯撒轻轻叫了一声,溜到屋角,趴在那里。弗里达把凳子拉到床边,坐起来。

这时,我记起来了,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做爱。在我们俩交合之前,我曾朦胧地感觉到的那种矛盾,在传说故事和一男两女身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那种矛盾,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早已意识到,在这种时候,没有必要直接询问弗里达,而必须运用巧妙和耐心的手段。“啊,阿佛罗狄忒。”我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她笑了。我抬起头,弯一下胳膊,将头放在手上。我把她那细眯的眼睛,盯了好一会儿,才说:“有一件事我不清楚。希腊人把阿佛罗狄忒称作爱神。爱在哪里?说真的,阿佛罗狄忒不爱阿多尼斯,珀耳塞福涅也不爱阿多尼斯,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弗里达问。

“根据他们的故事、传奇、神话,她们追逐他只是出于贪欲。她们需要他只是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欲,满足她们独自占有和贪得无厌的本能。她们自己付出了什么呢?”

“啊。”弗里达又用教师一样的声调说。对我这个听不懂她的讲课内容的小学生来说,这种声调是既亲切又带点指责。“他年龄小,阿佛罗狄忒把他放到壁柜里,他就不会受到伤害。而珀耳塞福涅是让他冥府里活下去!这可不容易呀!”

“但是……”我刚开始说话,而弗里达就用手捂住我的嘴巴。

她说：“我们以后继续谈。我现在要洗澡。罐子里的水很好。”要不要主动帮她去洗澡，我有些犹豫。欢悦之后产生的倦怠情绪，使我懒得开口。我蜷缩在被单里睡着了。

我醒来时，弗里达站在我旁边，洗过澡，梳理好，情绪饱满。“那么，”她说，“你所说的是爱情的概念。你一定明白，这个概念完全是中世纪的发明。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在《所罗门的雅歌》中……”^③

“你说的是《雅歌》吗？”

“啊，当然。所罗门在那儿是怎么写的？你是多么漂亮，多么可爱呀。啊，爱，愉悦之爱。写得多美呀！所罗门王和他的女孩，他所描写的我们现在已经做过了，至少是做了他所描写的一部分。因此，在耶稣会会士带着对女人的恨到来之后，一切都做完了。耶稣会会士认为，女人像撒旦，像女妖……所以，必须压迫撒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男人害怕我们的性欲。在非洲，在贝都因人中，他们对小女孩实行割礼。他们知道，我们的性欲在逐渐增强，而他们的性欲……一晚上你能做爱几次？每次间隔多长时间？我们能够没完没了地做下去。我认为，我们得到的快感可能是你们的十倍以上，无论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如此。你能多少次达到性高潮？只一次。我不想告诉你，我能多少次达到性高潮，因为你会产生嫉妒，你怎么说？啊，妒火中烧……因此，在中世纪，骑士们进行圣战时，怎么处置妻子呢？他们将她们绑在铁链上，用大锁锁上，他们带上钥匙去巴勒斯坦了。这样，这些妻子就只能想念他们，想了许多年……这就叫爱情，等呀，等呀。后来，这些吟游诗人带着他们的歌回来了。这些歌是怎样唱的？那个男人，他寻找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纯洁的处女！”

她尽管说，我没有回答。她脸上表情严肃。她还在说：“现

在你一定要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谁写的所有那些歌和所有那些文学作品？只有男人们。也就是说，不仅他们手上有物质的力量，而且有更重要的力量——语言的力量！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你读的那些书，那些浪漫故事，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来了一个男人，那个可怜的女人就同他坠入爱河。她想他想要死。最后，他征服了她，她向他屈服，像战斗中的连队，像被包围的城镇！所以说爱情就是战争？！而后，为了表现自负，他们还让女人说，在她同他们上床时，她爱他们！这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重要，就像国王拿着他那根小棍。你怎么称呼那根小棍？”

“权杖。”我回答说。

“很遗憾，那不是我手中的拦车棒！”她叹息道。

“但是，就连女人写的书中，她们……”我开始争辩道。

弗里达打断我的话头。“噢，”她生气地挥着手说，“那是惯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只能按惯例写作。如果有某个女人要如实写作，谁都会说，她是个妓女，或者说，她是个巫婆！”

“如果一个女人写私人日记，也是这样吗？”我突然向她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像在她腰间的皮带下边打了一拳。

弗里达看了我一眼，眼光逼人。我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被单下面的两条腿交叉起来，好像在做自我保护。“如果那是私人日记，你就不能读。”她郑重地说。之后，她既像结束她的说教，又像进一步重申她的观点似地补充说：“就连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他们也知道，一个女人追逐一个男人是为了欢乐，而他同时也得到了一点儿欢乐。”

“非常感谢你，也给了我一点儿欢乐，就像给了狗一点儿面包渣。”

弗里达猛地站起来，指责我说：“你说什么？我的狗吃面包渣？！我给它们吃最好的东西！”然后，她用一种假装比较平静的

声音补充道：“你要是狗就好了！那样，我们就会有个很好的天地！没有人会受罪！”然后，她又发怒道：“你读过福楼拜的作品吗？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好极了！多么高贵！但是，贫穷的爱玛永远不会说：‘我不能与查理一起生活，因为他不会使我感到满足。’而罗道耳弗，他是个下流货，他一直在利用她。她爱他。因此，当他感觉到有点儿冒险，或者有点儿高兴时，他就吹口哨，像这样——”说到这里，她吹起口哨来。“她一听到口哨，就跑过来，直奔他的床上，穿过大街，越过篱笆……”狗站起来了，显然是因为她吹口哨的缘故。“不是叫你，我亲爱的凯撒，”她抚摸着它的头说，“你是个国王！”这条狗汪汪地叫起来，冲我龇着牙。“沃伦斯基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样！”

“你想必写过不同内容的书。”我说。

“啊！如果我懂得怎么写就好了！我若写阿多尼斯同珀耳塞福涅及阿佛洛狄忒的神话，又该怎么写呢！我写……这两个女人相互爱慕。最后，她们签订协议，她们亲手杀死了阿多尼斯。”

讲到这儿，她沉默下来。也许，她感到这样说太过分了。她改用一种讲求实际的声调说：“现在，我必须去屠宰场。他们把人不吃的东西都给我留下了，喂凯撒和普茨。你想穿衣服吗？”

我蜷缩在被单里，主要是为了回避狗的眼睛，而不是回避其女主人的眼睛。我走到衣服那儿，开始穿衣服。就在我穿衣服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看法从我的头脑中闪过。这些看法与弗里达的世界观相左，当然，如果那确实是她的世界观。我的看法主要是：难道没有男人全身心地屈从于一个女人的爱吗？我记得，那些行吟诗人曾崇拜女人，为她们歌唱，把她们当做心中的皇后。最重要的是，在人类生活中，还有什么比真正的相互爱慕更美妙？正是这种情感，将两个人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他们

不仅肉体上合二为一,而且在灵魂上也合二为一。

弗里达继续抚摸凯撒的头。好像在揣摩我的心思似的,她说话了。但是,是对着我说的,还是对着狗说的,我就分辨不清了。“爱情必备的东西是平等。平等也是所有的人在处理所有的事务中必备的东西。要废除剥削! 废除剥削!”

我已经穿好裤子。我把手枪放好。她最终能否给我泄露一点政治秘密呢? 我心中嘀咕。我大声说:“我的就是你的,而你的就是我的吗?”

“啊! 多愚蠢呀!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快乐,就像我们刚刚做的那样。因此,正如阿拉伯人所说,我们俩都很快活。”

她这样说着,向门边走去。狗紧紧跟随在她后边。我打好领带,戴上帽子,开始下楼。狗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弗里达则闪到我的后面。

走到庭院里,想到还没有得到真实的情况,我内心感到很压抑。我好像被一种华而不实的小玩意所蛊惑。就像非洲和美洲的土著人那样,从白人那里得到一些光彩夺目的玻璃球,喜笑颜开,眼花缭乱,但却毫无用处。我得到了极为快活的性体验,还上了一堂爱情和文学课。但是,这并不是我所索要的代价。N给我的预付款快用完了,如果我对这个疑案不能尽快提出个解决办法,他不但会拒绝支付给我剩余的款项,而且他肯定还会散布谣言,说我本—霍林不可靠。想到这些,我心中的忧郁不禁又增加几分。我很快地总结了形势。我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这些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环扣一环的问题,惟一的办法是再次回到弗里达的住宅来。“你让她牵着鼻子走得够远了。”我责备自己说。我对弗里达说:“我可以再来拜访你吗?”

弗里达没有马上回答。那只小狗正使劲地朝我们摇尾巴,然后走到我的鞋子旁边,抬起后腿,看来是想撒尿。弗里达高兴

地对小狗说：“快走，普茨！你就这样对待我们的私人侦探吗？”然后，她转向我，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说：“那位福尔摩斯总用可卡因。人们说，这样可以使脑子敏锐。因此，他解决了所有的奇案和疑案。可卡因对做爱也有好处，原谅我，对性交有好处。”

她伸出手，话语中也许暗含着一点儿嘲弄似地说：“请再来。我的狗已经认识你了。我想，我可以把你画成西绪福斯。那是最合适不过了。”^④

我来到沙丘中。从这里到我的住宅有二三公里的路程。大部分路程，我要在沙漠中跋涉。我脱下夹克，搭在胳膊上，开始朝西南方向走去。不多会儿，我就觉得饿了。于是，我改变主意，向左转，朝苏梅尔村方向走去。

我改变走路的方向不只是因为饥饿和疲倦。突然，我产生一个强烈愿望，想到一个同文学无关的地方去。我冲着山峦走去，山峦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这时，我想到，从这次调查一开始，我就沉浸在明净的文学世界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本－拉菲尔的诗以及现在弗里达关于文学和爱情的讲座。艾里舍娃的日记也可看作是文学。此外，在拜访女诗人 A 之后，我又不惮其烦地研究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我想找个借口，到夏天再去拜访她，并且带上我许诺给她的苹果。

我不大懂艾略特那首诗，那倒不是因为其语言太华丽。相反，那首诗的大部分篇幅是用很简单、甚至是口语化的英文写作的。虽然 A 的话已经暗示过这个问题，我还是感到很奇怪，我们的诗人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用这种语言写作，甚至连写商业广告词都用的那种押韵手法也不用。我发现整个作品都很朦胧。当然，我脑子里还记得那么几行。现在，我听到的构成一整

行的两个词,还在我脑子里回响。这两个词是:不现实的——城市。虽然诗人在这里是指烟雾笼罩的伦敦城,我可以说,特拉维夫也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在文学和生活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我还不如另选职业。另一位英国诗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的一行诗突然跳进我的脑海:“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复杂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指的是现实的世界。但是,把它写进诗里之后,他就把它变成了认识上的世界。

走了几百米之后,我来到村庄的住家。村上的狗迎着我汪汪叫,听起来好像是一场迎宾大合唱。在一些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聚居地的房前屋后,跑着一些阿拉伯人养的家禽。家禽的羽毛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羽毛的颜色有紫色、绿色、粉红色、蓝色和褐色,好像是某位艺术家用画笔点染的一样。但是,那确实是鸡,有肉、有皮、有羽毛。

随着一片狗吠鸡鸣声,几个妇女和一大堆小孩走出家门和树丛。走在他们后边的是阿布-迈哈默德。他以传统的东方待客时那种特有的热情欢迎我。四杯美味咖啡下肚,使我精神大振。同时,他叫他的几个妻子在户外的炉子里给我们烤新鲜的阿拉伯大饼。我们又吃又喝,谈东论西,折腾了一个小时。之后,阿布-迈哈默德又花了半个小时劝我多留一会儿,说至少要等到他的表弟到来。他告诉我,他的表弟很快要从贾姆津驱车经过这里,他要去沙诺纳的德国人那里卖东西。他劝我看在真主的面上赏个光,让他表弟用车把我送回家。下午两点钟,在特拉姆波尔德大街的公墓门前,我走下他的马车。

今天的这个时辰,大街上空荡荡的。我脑子里忽生奇想:到比亚利克家去,同他一起讨论他在《爱情是什么?》这首著名的诗

歌中提出的问题。但是,每天的这个时辰,比亚利克无疑要躺着睡午觉。于是,我继续沿着特拉姆波尔德大街走去。快走到我的寓所时,我扣上我的左轮手枪的扳机。那里阒无一人。一切都像大海和沙滩一样的平静。

我走进寓所。房间的门窗关着,里面凉爽舒适。我是一天一夜前离开这里的。当时空气中的各种气味还依然存在。我当时担心不速之客来访,做了些记号,但这些记号一个也没有动过。我将帽子挂在帽架上,将夹克挂在椅子靠背上。我把一大锅水放在普利姆斯汽化炉上,打开火,而后躺在长沙发椅上。水烧开,我把水倒在澡盆里,舒口气,泡在其中。

我一面撩水,一面设法撕破那谎言、欺骗和圈套之网,同时打破我自己根深蒂固的疑神疑鬼的链条,以便切入现实的核心。弗里达说的话,难道真的只是哈—亚沃达大街上普珥节表演的一个延续?或许也是“艾里舍娃日记”的一个延续?所有这一切,难道只是个蓄意迷惑我的阴谋,想使我失掉追踪扎哈利亚·犹林·杜木兹的线索吗?胡扯,我严厉斥责自己。有一种理论或信仰,认为一些国际事件是由某种魔鬼般的阴谋制造的,而这种阴谋是由一个才智出众的人策划,由其代理人执行的。难道你真的相信这种理论或信仰吗?过去的例子是《犹太人贤士议定书》^⑤。人们起初相信多神论,然后又相信一神论,而今又相信科学法则,认为偶发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明显的偶然事件背后有人在指挥。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人们的需要,而事情的真相可能远非简单和偶然。

我从浴缸里爬出来,决定尽快返回弗里达家,在那儿准备采取行动,多种意义上的行动,以搞清事情的真相。作出这一决定后,我沉浸在今天早晨做爱时的愉快回忆之中,沉浸在尽快从N那儿得到另一笔预付款的希冀之中。这时,我就酣然入睡了。

门铃声将我唤醒。我走过去,通过窥视孔向外看,发现 N 同志站在那儿,还是穿着那件皮上衣。我请他进来,去给他准备浓咖啡。

“那么,你找到破案的办法没有?”他咄咄逼人地问。我的脑子还没有完全理清楚,我叫他等煮好咖啡再谈。

但是,N 很着急,他甚至比平时还急切。“时间紧迫,”他说,“你不能边煮边谈吗?”

我偷着瞥了他一眼。通过依然笼罩在我脑海里的残雾,一个火花突然闪现:在弗里达的一幅画中,我不是看到过他的面孔……那个长着山羊腿的色鬼?这个想法异常强烈地震撼了我,我几乎使煮开的咖啡溢出咖啡壶。N 冲我走来。走近了一看,我发现,他究竟像不像那个色鬼,似乎还很难说。

在小杯子里斟上咖啡,我又递给他一张薄饼。此后,我向他说声抱歉,走向浴室。一时间,我觉得他好像也要跟我去那儿似的。我用凉水洗过脸,但我脑子里千头万绪,仍然很乱。要完全将思绪理清楚,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要多喝几杯咖啡。我回到写字台边,端起杯子想喝点咖啡。但是,N 却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喝下去。这时,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怀旧情感,思念起我的贝都因朋友们那种好客之情。在他们那儿,总是在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谈论实际问题。“那么,”他说,“我们找的那个人还活着,活蹦乱跳的,对不对?”他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不敢肯定,”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根据我掌握的材料,很明显,他可能不在人世间了。”

“如果是那样,他又还阳了。”

“谁,阿多尼斯?”我失口说漏了嘴。

“那是他的一个化名吧?”N 一边问,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

折叠着的《话报》。“好好看看这张照片。”他命令道。

我看了一下，立刻说：“这是弗吕赫林，奥斯卡·弗吕赫林！”

几个月之前，奥斯卡·弗吕赫林已经从奥地利来到这个国家。他已经制造了很大的影响。他已经加入新成立的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他在劳工运动中的前途似乎已有保证。他以哈伊姆·斯普林菲尔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受到《话报》读者的热烈欢迎，受到修正主义分子的忌恨。^⑥

“难道说他没有使你想起某个人？”N问道。

我惊异地看着他。他不可能意指……

“是的，是的。他是我们的人，”N说，几乎是在耳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获得了新生——有了一张新的面孔，还有一个新的名字。”

我看着他，想弄明白他是否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在“拿我开涮”。“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说。

“去掉眼镜和胡子再看看，”N说，“然后给他换上不同的头发。你在这方面毕竟是专家。”

“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我坚持说，“这个人不可能化着装到处走……”

“我感到你这个人很奇怪，本－霍林。在巴勒斯坦警察局，难道他们没有告诉过你，人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来改变他们的面容？连我这样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也曾读过美国一两个强盗化装的故事。他们改装得很成功，连他们的妻子在大街上碰见也辨认不出来！他们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躲避警察，”他冷笑一声，总结道，“而是为了防范对手。你为什么不通过放大镜来看看他呢？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没有放大镜是寸步难行的！”

一些巧妙的回答涌上我的心头，但是我没有说出口。我现在需要的是思考的时间。只要N同志威胁我，我就不可能进行

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摆脱他。

我决定,最好的办法如同美国人所说,是同他“一起泡”。我拿起我的放大镜,装着查看那张照片。自然,除了一团黑点和灰点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你看!”N 得理不让人似地喊道。

“你怎么会……怀疑他?”我天真地问道。

“谢谢你,功劳属于你!”

“如果我的工作是由别人代做的,功劳就很难属于我了。”

“只有干到底,”N 谦虚地说,“大部分工作是你做的。你发现犹林就是杜木兹,他是共产党派别中的一个极端分子……我们从这里接着干下去,终于挖出了这个人物!”他得胜似地总结着,用手指头敲打着报纸。“对你说句实话,”他用信任的声调继续说,“在那个方面,我们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怀疑。当我初次同你接触时,难道你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对那个私通者感兴趣?”

“我问了。”

“那时,我不想向你透露我们的怀疑,免得使你从一开始就抱有偏见。我想使这次调查完全不偏不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以忠诚和独立人格著称的人来干这件事,以便防止坏人摇唇鼓舌。”

“多谢你了。”我说。

“给你添了麻烦,当然要给你可观的回报。我们一定要做到,将你出色的工作知会适当的方面。”

“弗吕赫林坦白了吗?”

“你说这话真令我吃惊,”N 说,“像他这样一个人,肯定能顶得住那些最严厉的审问……”

“既然是那样,你怎么知道弗吕赫林就是犹林?”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看:在英国人想插手他的事之前,即去年夏末,犹林·杜木兹就悄然溜出了这个国家,可能是化装成一个阿拉伯人,或者更巧妙一点,化装成一个阿拉伯妇女。在维也纳,他改名换姓,变换面孔,然后又通过合法的或其他方式回到这里。虽然,这最后一点尚需进一步核实,但核实与否其实已无关紧要。”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初冬时节,犹林——弗吕赫林参加了劳工运动,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还是弄不懂他讲的故事。据艾里舍娃说,犹林一直躲藏在壁柜里,几乎藏到冬末。否则,当然……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行踪的?”我问道。

“是你发现了他的行踪。”他耐心地重复道。“我们只是跟踪追击。”他咧着嘴笑道。

“如果你有根据怀疑他,那么你就把他叫来见你,审问他好了。或者,换个更好的办法,告诉特拉维夫警察局的S警官。他会很乐意逮捕这个地下共产党人的。啊,他甚至还怀疑他自己手下的某个人也是秘密共产党员哪!”

N脸色苍白,看着我,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我们可经不起这种丑闻的折腾。”

“是不是怕修正主义分子在户外集会,幸灾乐祸地嘲弄你?”

“那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他说到这里停下来,显然是想选择合适的用语,“因为这肯定会损害我们的一个女同志的声誉。”

“我想,你的意思是……”

他用手捂住我的嘴,环视四周,走到窗户那儿,向外窥视。最后,他俯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们就是这样发现他的:当他

感到落入圈套，身份快要暴露时，他就选择了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行事：在一个女人那儿找到藏身之地……”

“在壁柜里？”我天真地问。

“不一定是壁柜……而是一件更隐秘的家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当然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知道。”他有点担忧地补充道。

“我认为，你比那个人更了解我。”我用假装生气的口气说。

“当然，当然，”N急忙劝慰我。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她是我们运动中很重要、很宝贵的一员。在一段时间里，那些接近她的人感到她有变化……她平素是相当严肃的，甚至有些冷酷，可她最近突然变得欢快而意气风发。同时，她开始颂扬奥斯卡同志。另一个女同志赢得她的信任后， she就把一切都对那个女同志说了，包括某些最隐秘的细节。后来发现，另外那个女人曾和犹林有染。这些迹象是不会有错的。这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人。”

现在N算击中了要害。“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说，“这位同志是个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她很可能有一天会升到最高的职位上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她以最微不足道的痛苦方式经受了打击。如果我们把一个完全客观的报告放在她面前，报告由像你这样的男子签名……你是知道会怎么样的。”他继续用歉意的声调说：“如果她自己党内的一个党员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她可能认为这是个政治阴谋。这个党员无疑将竭尽全力在她的头脑中散布怀疑情绪。一个热恋中的女子，身心愉快，充满活力……好了，我不必告诉你结果可能会怎么样。”

“到那时，”我自言自语道，“你也就会摆脱所有的怀疑了。”随后，我大声说：“对不起。对我个人不能百分之百负责的东西，我是不能签字的。我准备跟踪弗吕赫林。如果我发现他同他们

之间有任何联系,我就写下来,签上字,封好后交给你。我所要求的是再预付我一笔款。”

N用同情的目光看了我一眼。“首先,”他说,“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其次,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职业侦探怎么能想像,一个像犹林那样有经验的秘密间谍竟会同他的真正同志进行联络!他们最后一次碰头时都戴着面具!你自己当时也在那儿,他们三个人全见到了!”

“我从没有对你说过,当时有三个人。”我很平静、冷淡地说。

N没有表露出窘迫的样子。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记忆力显然已不像原来那样好了。你知道,我是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待你的。”

“滚蛋吧!”我说。

“遗憾哪,”N说,“我一直想推荐你,把你列入我们的职业人员名单。如你所知,明年,当选人议会要进行选举,第十八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将在瑞士召开。但是,正如你希望的那样,本-霍林先生。”他站起来走出房间。

难道N自己就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形迹,竟牵着我的鼻子让我替他办案?或许,他实际上是同情修正主义分子,而那些修正主义分子害怕新成立的工党要把大多数“伊休夫”成员连同他们一起清洗掉?害怕工党不屈不挠,要把他们的计划都破坏掉?或者,N也许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修正主义派的同情者,而只是工党中这一个或另一个派别的成员,对弗吕赫林的声望极为嫉妒?

我拿所有这些怀疑和困惑怎么办呢?难道我应该去找工党中的熟人去说一说?去找本-古里安?或者,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新闻界?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一个私人侦探的双唇紧闭着。他的客户的机密之神圣,并不亚于一个医生或一个律

师的机密之神圣。

我走下海滩,想轻松一下,振作一下精神。太阳已经接近水天的分界线处,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海浪小了,海水平静下来。

我返回寓所,穿上泳装。我迎着太阳游泳,不得不闭上眼睛。这一次,我没有仰面朝天安详地游。我的脑子被那些烦人的问题纠缠着。在我向海岸回游时,我睁开眼睛,看到特拉维夫在飞速扩展。这时,一股宁静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我感到,这座城市无疑很实在。事实上,从存在的观点来看,在人类的所有工程中,最实在的是城市。即使居民抛弃它,即使它的建筑化为废墟,它也肯定还会重建。

我踏上海岸时,太阳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直到明天才能再见。我明天要干什么呢?去找弗里达已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了。就我和我的客户之间的联系而言,这次的案件调查总算结束了。

在我办公室发生的那次令人感到丢脸的冲突,忽而又栩栩如生地回到我的记忆里,令我热血沸腾。在N及其主子们的心目中,难道我真的就那么一钱不值,我只能按他们的旨意行事,只能像个牵线木偶一样任他们摆布?从我内心说,我确实看清了N在我面前的嘴脸,色鬼的嘴脸……稍等一下!我完全有理由再回到弗里达那儿去!首先,去审视那幅画。我看到的那些相似之处,也许不是我自己凭想像虚构的。否则,我就得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如果我发现了我想要发现的东西,只要我确实抓住了关键人物,我肯定会找到人给我付费的。

弗里达是想把我画成西绪福斯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或在什么书中读到过,西绪福斯被判无休

止、无目的地服苦役，有些人因此而同情他。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西绪福斯正是因为这种无目的无休止的劳役，他才尝到了劳动的愉快。现在，同样性质的东西显然在我身上也出现了。

在一阵接一阵的导弹警报声中，我用打字机打完了这份手稿，并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这位本－霍林是谁？我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的老伊休夫历史档案中查找他的名字，我询问各种人，包括我的邻居贝扎利尔·蒂德哈，他是特拉维夫第一个私人侦探的儿子。查找的结果是个大零蛋。从没有人听说过艾弗尔·本－霍林这个人。换句话说，这本书不是一本日记，也不是一篇“自白”，这个讲故事的主人公显然是虚构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匿名作者出于什么动机才写下那些东西呢？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他要写一部小说，他就要以某种侦探小说的形式来撰写。如果他给的日期是对的，那么，他一定是在“侦探图书馆”收藏的那些小册子在特拉维夫开始发行时才撰写这部小说的。本－霍林写的那些小册子，尽管遭到教师和作家的激烈反对，公众或多或少还是能容忍的。而他写的这本书，显然就超过了希伯来读者接受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它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缘故。

如果作者确实想把这本书出版的话，手稿被退回可能还另有原因。这本书不符合常规的形式。最明显的不合常规之处是结尾：谜团还悬而未解，读者的好奇心只满足了一半，也许连一半也没有。如果硬要说这本书是用不同形式撰写的，那么，问题不是更大的话，也同样是问题。

事实上，作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生活”的过度模仿。

在拼字谜游戏中,我们把一些字母进行排列组合,就能拼出有一定含义的字型。而在生活中,构成生命的分子的运动,并不会将这些分子拼连在一起。这正如陆地的运动。陆地曾是地球内部的一个个板块,当它们相互对撞运动时,就引起地震和火山爆发。这时,连一些好像从不受时间的破坏的建筑也都倒塌了。在同样的过程中,历史也会因动乱而把观念、感知和思想打得粉碎。

2月28日是我长孙女的生日。她叫阿维芙,也叫斯普林。这一天恰逢今年普珥节的头一天。上午九点钟,“以色列之声”电台宣布战争结束了。今后再也不打“飞毛腿”导弹了,密封的房间打开了,防毒面具摘掉了。从特拉维夫和A地带其他地方来的难民可以安全回家了。

今天的特拉维夫也会有狂欢的气氛吗?我记得,本-霍林在六十一年前的今天对这座城市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全城的人,无论孩子还是大人,都穿着化装服,戴着面具。自从我能把看到的景象记住以来,我还不记得在特拉维夫出现过他描述的那种气氛。我的童年被1936—1939年间发生的骚乱所笼罩。当时,人们没有心思去庆祝普珥节。此后,限制犹太移民的“白皮书”出笼,继而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和独立战争。^⑦从那时起,好像只有孩子们才继承了过普珥节搞群众性狂欢这种传统。当然,也许不只是他们。

几周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又驱车去特拉维夫,想去走完由于发现那个笔记本而没有走完的那段路程。这次,我在阿勒佐罗夫和林荫大道之间的什洛莫-哈梅莱希大街上没能找到停车处。但是,在什洛莫-哈梅莱希大街和阿达姆·哈-科亨大街之

间的一个小巷中却发现了一些空地。

在迪津戈夫大街上,肖利文具店已开办好几年。大街拐角处的咖啡店里,人坐得满满的。

我经过赫谢尔的小书摊,继续向本-耶胡达大街方向走去。半路上,我碰到一辆古老的汽车。这辆车在三个月前也许就停在这同一个地方。汽车上有厚厚的一层尘土。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们把车窗变成了广告牌,上边写着“埃兰爱艾迪”,下边写着“艾迪也爱埃兰”。

在本-古里安故居的对面,停着一辆从阿福拉开来的公共汽车。从车上下来的那些男人和女人,看上去像是些老年退休人员。除他们之外,这条林荫大道上没有什么人走动。

我带着一座城市到现在仍没有住满人的那种感觉,一直走到阿塔林广场,然后又走向修建在马赫卢尔老城区的那些高大的旅馆。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一些住房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人家,仍然还住在这些旅馆里。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泰尔射击场当年所在的地方。五十年前,在我爬上木楼梯来到射击场的入口时,我还以为“泰尔”是射击场主人的名字。今天,这座老射击场的所在地,已成为新的散步场所北端的标界。

天气很晴朗。从大海的颜色中,从湛蓝的天空中,你能预感到夏季的来临。但是,夏天的浓重气息依然囿于春天的残迹之中。在西北风吹拂之下,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在有风的地方,即使在太阳底下,散步是一种享受。

新的散步场很引人注目。石头铺的地面,棕榈树栽在硕大的水泥盆中,花坛中有红色和紫色的牵牛花。向左看,是雅康大街。一些老房子依然存在,墙壁脱落,钢筋外露。但是,正在开花的那些肉质植物,依然爬满石灰石构成的悬崖。悬崖上面的

红房子已有不少年头。那些肉质植物的绿色好像比以前更为青翠。

在石头铺地的散步场上建有一些亭榭。在这些亭榭中，人们坐在花荫下的水泥座位上。在我看来，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像是些老人。这也许是因为我这样一路走来，就像穿过时间的隧道一样，回到过去，又回到童年时代。

在过去曾是赌场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牌子上写着“耶路撒冷海滩”。道路另一边的建设工地用木板围着。“凯塞姆”电影院原来就建在那儿，后边则是以色列的第一座议会大厦。大厦的后边是歌剧院大楼。今天，起重机在繁忙地工作，无疑这里不久就会又建成一个旅馆，或者其他什么建筑，任凭今天的人们去称呼吧。

我走到通向雅法的这条马路的东侧，来到拉夫·库克大街。六十年前，这条大街叫哈－雅姆大街，或者叫海滨大道。在我四岁之前，我家住在这里的五号。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给我讲三岁时发生的事。那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失踪了，她心里害怕极了。最后，他们在离家一段距离的曼什耶交界处找到我。我当时说，我要去雅法，去看修建在伸向海中的岩石上的雅法塔和其他建筑。

这座红瓦顶两层楼房的门面已不再使用。前门已经用木板和钉子封上。但从后面一看，在我们家和另一家合住过的那一套房子里，我看到洗过的衣服挂在门廊里晾晒。就在这同一个地方，我妈妈总是晾晒她从洗衣桶里拿出来衣物。

我转身向北，沿雅康大街走去。海风吹不到这里，这里夏日的气息很浓。沿着雅康、特拉姆波尔德和本－耶胡达这些大街走下去，走着走着，我不由沉浸在对不愉快往事的回忆之中。

当西北风连位于老市政厅和比亚利克住宅之间的小山顶都吹不到的时候，7、8月间的天气尤为炎热。那些建筑物，无论老

的还是新的,正在修建的还是正在坍塌的,都挡住风的去路,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街道都变得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这种情况往往要一直延续到秋天。

我再次想到过去:为躲避特拉维夫的夏天,我们全家总是到耶路撒冷去,去清风吹拂的地方。每年8月,我们都搭乘公共汽车,经过拉姆雷、谢尔·哈盖和蜿蜒通向卡斯泰尔的那条公路,去爬犹地亚山。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乘火车旅游了几次,曾途经大交通枢纽利达。经历过1936年至1939年间发生的动乱之后,人们不再害怕乘火车,也不再害怕坐在阿拉伯人的身边。

我父亲的姐妹们都住在耶路撒冷。她们姊妹三人。我当时以为她们都是老姑娘。我感到沮丧的是,她们都没有孩子,我也就没有表兄弟一起玩耍,一起散步。几年前,我发现我最小的姑妈曾有个未婚夫。但是,他在三十年代之初就被驱逐出国境。

他的名字叫迈尔·威森格伦,意思是“绿草地”。他是个共产党员。英国人把他投入监狱,关在耶路撒冷的俄国人聚居区。不久,他被驱逐到波兰。他是从波兰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一直从波兰的几个城市给我姑妈写信。到1939年秋天,信件才中断。

我们全家人都认为他在大屠杀中死去了。可是,他却从比利时寄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设法逃脱了纳粹的魔爪,先到法国,然后到了比利时。在比利时,他参加了反纳粹地下组织的犹太人支部,不久就要回到巴勒斯坦。

1946年,他回来了,改名为迪希,或叫“绿草地”,和我小姑妈住在一起。他是一个粗壮的男子。五十年代初,我在希伯来大学读书时,我就住在他们家。我经常要他给我讲他的经历。只有一次,他暗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迈尔姑父平时很少提

及他一生的经历。相反,他却经常给我大讲政治思想课,讲资本主义的压迫者和寄生的资产阶级,讲共产主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了世界,并且总有一天会把整个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即使在斯大林死后,在部分正统的共产党人面对一些逐渐变化的情况而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他笃信的信条。

在他旅居欧洲的那些岁月,我小姑妈对任何其他男人都不屑一顾。他回来之后,她却再也不能生育了。

注释:

①据《圣经》记载,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埃及女子夏甲所生的混血后代。以实玛利人属游牧部落,居住在阿拉伯北部的沙漠中,经常迁徙。现今的阿拉伯人宣称自己就是以实玛利人的后裔。

②亚司马提同撒旦一样是传说中的魔鬼。

③《雅歌》为《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因曾经有人认为它为所罗门所作,故又称《所罗门雅歌》。《雅歌》是一部大胆描述男女爱情的歌剧。

④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是个骗子,由于欺骗死神,在冥界遭到惩罚,被迫无休止地从事毫无意义的劳役。

⑤《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从中世纪以来就流传的一个伪造的文件,声称犹太人要使非犹太人沦为奴隶,要毁灭基督教文明。

⑥《话报》是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的机关报。“修正主义分子”系指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联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主张“修正”对阿拉伯人的“温和”态度,采取强硬立场。

⑦1930年,在巴勒斯坦发生阿拉伯人骚乱后,英国政府发表一份“白皮书”,限制过多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1935年5月,英国政府又发表一份“白皮书”,规定了五年内向巴勒斯坦移居犹太人的数量。这两个“白皮书”均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General Information]

$\mu = 1111$

$\sigma = 1111111111 \cdot 111$

$\mu = 209$

$SS = 12177899$

$\mu = 2000.08$
